

新加坡唯一的华文文化双月刊

# YUAN 新华文化

# 源

2024年·第1期·总期: 167 + S\$5.00



## 携手为文 比翼双飞

### 何乃强 冯焕好夫妻专访

- ◆ 与黄祖耀主席面对面
- ◆ 烟云无际 散谈成空——画家翁文光
- ◆ 对合唱艺术锲而不舍的齐文洋
- ◆ 少儿演艺的开拓者马业仙
- ◆ 刘太格：塑造新加坡华族文化

# 宗乡总会奖学金

## SFCCA Scholarship

### 奖学金金额

每学年最多可获得1万5000新元

### 申请条件

- 必须是新加坡公民或永久居民
- 具有初院学历或其他相等资格的学历
- 已获得本奖学金认可的中国高校录取资格

### Value of Scholarship

- Up to S\$15,000 per academic year

### Eligibility

- Singapore Citizen or Permanent Resident
- Possess 'A' Levels or other equivalent qualifications
- Admitted into selected Chinese Universities approved by SFCCA

### 申请时间 Application Period

01.04.2024 – 10.07.2024

### 咨询 For more Enquiries

☎ 6643 6475

✉ admin@sfcca.sg

🌐 <https://www.sfcca.sg/sfccascholarship>



## 编辑语

文·谭瑞荣

2024年·第1期·总期：167

罗马哲学家西塞罗（Cicero）曾将“文化”定义为“灵魂的耕耘”。而耕耘，往往始于未开垦的“处女地”。因此，少儿这块“处女地”的“灵魂耕耘”、其价值观的启迪和培育，就成为一众有识之士的“英雄所见”。

刘太格博士就在《塑造新加坡华族文化》一文中，这样解读使他终身受益的文化熏陶：“这种优良的家庭教育和中小学教育，现在回顾起来，的确深深地影响了我这一辈子的为人处事、价值观与工作态度。”

无独有偶，《少儿演艺的开拓者——马业仙》一文，其受访者也这样陈述：“无论这新的乐章如何奏起，我们将秉承有教无类的理念，不搞精英主义，让孩童在学习中得到乐趣，继续受到传统华族文化与价值观的熏陶。”

《兔年，狮城〈小白兔〉在南宁骄傲登场》一文的受访者、艺术剧场总裁许崇正也如是说：“这么多年，不论多么艰难，我都要继续坚守，因为新加坡需要这样的华语儿童剧、幼儿需要得到优秀传统文化的培育。我会继续做，就是因为敬畏和热爱我们的传统文化，所以需要坚持、拓展和付出！”

优秀传统文化之“灵魂耕耘”，须从孩子做起，他们不约而同，异口同声。

为了让孩子深刻体会“粒粒皆辛苦”的诗歌内涵，《三代米饭缘》的作者，千里迢迢地带着孩子到海南岛的乡村，目的是让他们亲眼看看务农的实况。尤今说：“他们绝对没有想到，一粒米的诞生，居然复杂如斯！走一寸土地、长一尺智慧，海南岛之行，让我孩子内在的自我迅速地成长。”

人在孩提时代，其“处女地”的开垦，的确会关系到身心的健康成长及人生的道路和方向。本期的专访人物，如何乃强、冯焕好、齐文洋等，无一不是从小就接受到“灵魂耕耘”，进而开垦出肥沃的土壤、培育出丰硕的果实。

因此，要树立健全的人格、要使人生走上康庄大道，其“灵魂耕耘”及优良价值观的培育，的确不可忽视。

### ■ 出版 ■

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  
Singapore Federation of Chinese Clan Associations  
397, Lorong 2 Toa Payoh,  
Singapore 319639  
Tel : (65)6354 4078  
Fax : (65)6354 4095  
网址 : <http://www.sfcca.sg>  
电邮 : [yuanmag@sfcca.sg](mailto:yuanmag@sfcca.sg)

### ■ 编辑顾问 ■

吴绍均 方百成

### ■ 编辑委员会 ■

主任：严孟达 副主任：李叶明  
委员：尹崇明 陈嘉琳 陈煜  
叶舒瑜 王书雅

### ■ 总编辑 ■

谭瑞荣

### ■ 副主编 ■

欧雅丽

### ■ 英文校对 ■

李亦欣

### ■ 总代理兼发行 ■

Chromatic Media Pte Ltd  
47 Kallang Pudding Road  
#08-15, Crescent @ Kallang  
Singapore 349318  
Tel : (65)6296 7228  
Fax : (65)6296 7585  
Email : [chromatic@singnet.com.sg](mailto:chromatic@singnet.com.sg)

### ■ 设计、分色、承印 ■

Chromatic Media Pte Ltd  
47 Kallang Pudding Road  
#08-15, Crescent @ Kallang  
Singapore 349318  
Tel : (65)6296 7228  
Fax : (65)6296 7585  
Email : [chromatic@singnet.com.sg](mailto:chromatic@singnet.com.sg)

支持机构：

National  
Integration  
Council

CULTURAL  
MATCHING  
FUND

新加坡宗乡会馆基金  
SINGAPORE CLAN FOUNDATION

### ■ 出版准证 ■

ISSN 2382-5898  
MCI (P) 034/02/2024

### ■ 出版 ■

2024年2月

# 目录

- p 4 高山仰止 与黄祖耀主席面对面 林文丹
- p 6 吾乡吾厝 游刃于新加坡与砂劳越之间的王有海家族 陈煜
- p 10 文坛掠影 携手为文 比翼双飞 齐亚蓉  
—— 何乃强、冯焕好夫妻专访
- p 14 余音缭绕 对合唱艺术锲而不舍的齐文洋 郭永秀
- p 18 戏如人生 少儿演艺的开拓者——马业仙 章秋燕
- p 22 艺术长廊 烟云无际 散淡成空 赵宏  
—— 画家翁文光
- p 27 狮城艺事 新加坡潮剧：众人共绘新美景 蔡曙鹏
- p 32 新华文化 塑造新加坡华族文化 刘太格
- p 36 文化传灯 兔年 狮城《小白兔》在南宁骄傲登场 亚真





- p 39** 炊烟岁月    三代米饭缘    尤今
- p 42** 旧貌新颜    找不到砖厂的砖厂组屋区    李国樑
- p 47** 最爱书房    文史钩沉可知兴替    张森林  
—— 读杜南发《文史拼图——新加坡华族社会文化史文集》
- p 50**    牛车水：得来不易的幸福    庄永康  
—— 何乃强医生新著发布
- p 52** 南洋纵横    管中窥豹：从《南洋杂志》看南洋研究    符懋谦
- p 56** 艺文脉动    庆德会新书出版 揭秘百年发展历史    欧雅丽
- p 58** 本土文学    家住汤申台    庄永康
- p 61** 仿佛风    兄弟情    李宣进
- p 62**    吸尘器    谢京贤
- p 62**    爱在末日    陈楠
- p 63** 总会专递    春到河畔2024 龙年的盛大狂欢    郭婉婷



# 与黄祖耀主席面对面



图文·林文丹

**黄**祖耀被公认是华社、商界、金融界的巨人、泰斗。不过，在我心目中，主席更像是一位亲近的长辈与导师、关爱下属的领导。他经常脸带笑容，说话不温不火、不急不缓，像个得道高人。他的逝世犹如巨星陨落，引起无数仰慕、崇拜他和关心他的人的怀念与追思……

我第一次见到黄祖耀是在1981年——爱同学校（福建会馆属校之一）宏茂桥新校舍的开幕庆典上。那时我的女儿在爱同就读三年级，被老师安排在庆典上表演节目，我以家长的身份出席了活动。

黄祖耀当年是福建会馆主席，也是爱同学校董事会主席，是庆典的受邀贵宾之一。事隔40余年，我仍清晰记得他在舞台上致辞的场景。他身着

灰色西装，神态潇洒、声音洪亮，先以华语致辞，再以英语简单发言。他对学校表达了极大关心，描绘了学校未来的发展，也谈及新加坡语言环境的变化。他鼓励莘莘学子努力学好华文华语，掌握好双语能力，以便为族群为国家贡献力量。

那个年代，黄主席正在为南洋大学的存亡做努力与抗争。作为南大校友，我早就通过报章报道认识了这位不畏强权、为维护族群语言文化与利益而不轻易妥协的华社领袖。因此，当黄主席站在我眼前的舞台上，再次对新加坡华教的未来做语重心长的讲话时，我不禁对他肃然起敬。他的形象在我心目中顿然显得更加光辉而高大。

没想到六年之后，我又有机会与黄主席面对面共事。

1987年，我很幸运地加入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成为总会成立一年多时的第一名员工。

初次见面，我并没有感觉太大压力，反而有亲切感。或许是因为自总会成立以来，我一直关注它的进展，以及主席的动向；甚至工作委员

会的主要成员也有我在南大的同学和熟悉的媒体人。

从那以后，我在黄主席领导下在总会服务了23年。这期间，主席锲而不舍地为贯彻总会的成立宗旨，带领由秘书长蔡锦淞领导的执行委员会，在凝聚会员团体、弘扬华族语言与文化方面作出不懈的努力。

为资助会员团体及资金不足的文化团体，主席带头设立了宗乡会馆基金、中华语言文化基金；主办华族文化讲座/展览、展开全国节日习俗调查、编写华人礼俗节日手册、出版历史文化书籍/杂志/录像、设立中文系高级学位奖学金、创办华裔馆、接办春到河畔迎新年大型活动、推动华助会的成立等等。为当年逐年式微的语境扮演中流砥柱的重要角色。

当时，我在秘书处的日常工作中，除了协助推动会务活动，向主席提交会务报告，还要为主席草拟庆典献词和演讲稿。总会那时约有200个会员团体，23年下来草拟的庆典献词不计其数。主席不仅仅是华社领导，也是我国社会上举足轻重的人物，我务必认真对待他的每一篇文章稿，除了文字上的严谨，还有内容上的新意。其实，每每接到一封又一封要求献词的来函，我总是倍感压力！尽管绞尽脑汁、搜索枯肠，还是时时深感才尽词穷、力不从心。好在主席对献词并没有太严格的要求，从未拒用我的稿件。

不过，对于演讲稿，主席从不马虎。他演讲向来要求简单扼要，不浮夸，不用美丽词藻，不

咬文嚼字。在讲稿的内容和措词上，我们经常有不同的看法。主席总是非常有耐心地在稿纸上，逐字逐句地用红笔改正，以更贴切地表达他的意思。有时候，他甚至会亲自来电，花时间讨论一篇讲稿。每次讨论都是愉快和谐的，遇到不同看法，我们都能适当地相互妥协，达到共识。老实说，能为胸怀宽大的老板服务，真是一种莫大的荣幸。

记得有一次，为了一篇重要的演讲稿，主席召我到位于大华银行两座大厦之间的六楼办公室。六楼会议室是我常去开会的地点，十分熟悉。主席办公室宽敞、舒适，布置雅致，就在会议室隔邻。他微笑招呼我坐下，亲自递过一杯热茶，说：“这是好茶，很香，你先尝尝。”一杯热茶沁人心脾，化解了我心中无名的焦灼和不安，让接下来的讨论在轻松的气氛中顺利完成。

谈完正事，主席也不忘和我闲聊几句，像长辈一般关心我家人的近况。他的温暖让我倍加感动。

2010年，主席卸下宗乡总会的所有职务，而我也在2014年退休。

退出职场后，我就极少在公共场合露面，也就没有什么机会再见到主席。十几年下来，只能从媒体或报章上对主席的一些近况有一些了解，也知道他尽管年事渐高，仍然每天亲自到大华银行他一手建立起来，令他骄傲的两栋大楼办公。我不时默默地祝福他长命百岁！

再次遇见主席，是在2022年年中。那是一个



2004年，林文丹向黄祖耀主席介绍街戏图片展



2005年，黄祖耀主席颁发长期服务奖给林文丹

非常偶然的的机会。我正和女儿及两个孙女在一家中餐馆用餐，抬头间突然看见主席从我面前走过！“主席！”我很自然地便脱口而出叫了一声。

主席稍稍回头便继续走入餐馆厢房。在厢房内坐定之后，他又不时转头，从半开的门缝往我的方向看过来。我确定主席已经认出我了，赶忙起身推门进去和他打招呼。当时座上还有他的夫人和家人。主席问起了我的近况，我们寒暄了片刻。很幸运地，这珍贵的一刻被我的孙女用手机捕捉了下来。

当时主席已经93岁高龄，他无需搀扶或使用拐杖，自己能够缓慢行走，看起来还精神奕奕。

相隔一年多，2024年2月6日，我最后一次面对面见主席。

我手持白色康乃馨，在庄严肃穆、满布鲜花的灵堂前，看见他在百花丛中安详地睡着了。回忆20多年来这一段难得缘分，终于走到尽头，我不禁潸然泪下。

题图说明：  
2022年中，林文丹（中）在餐馆巧遇黄祖耀主席和夫人庄榕英

（作者为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前执行总秘书）

**王** 有海(1830-1889)是王氏慈善(开闽公司)的三位献山人之一，祖籍福建省同安县白礁(今漳州龙海角美镇白礁村)。1872年5月18日，他与两位同乡同宗——王九河与王沧周，分别捐献500元，集资1500元，购买约221英亩多的地皮，作为福建王氏开垦、居住、墓葬之地，习称“姓王山”，亦称“太原山”。作为早期本地最富盛名的华人家族之一，王有海及两位儿子长顺(1855-1934)和纯智(1871-1946)被宋旺相记录于1922年撰写的《新加坡华人百年史》，有关王有海的内容被译成华文，成为本地闽籍王氏宗亲机构沿用至今的文献。

1928年檳城林博爱等人编纂的《南洋名人集传》第二集下册，收录王长顺及其在古晋的弟弟长水(1864-1950)的事迹。王有海家族的发迹与砂劳越近代发展密切相关，古晋靠近砂劳越河的古街名为“友海街”是为了纪念这位砂劳越华人甲必丹，沿街店屋为其所修建。王有海过世后，长水继承其位成为砂劳越华人甲必丹。1990年Ong Boon Lim出版题为《砂劳越的王长水》，以《砂劳越宪报》所记载的相关报道为主，从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等方面，将祖父对

砂劳越的贡献做出较为完整的梳理。

本文通过梳理新马两地关于王有海家族的文献记录，以及早期华英新闻报道，试图显示这个海峡华人家族在新加坡与砂劳越的传承，探究他们与太原山早期发展的关系。

## 新加坡的砂劳越华人甲必丹

王有海的父亲坤殿是南来新加坡的第一代，不幸在他七岁时逝世，留下母亲独立抚养三子三女。由于家庭困苦，王有海16岁外出谋生，与林英茂结伴前往砂劳越厄尔都拉都，发现当地物产丰富，萌生从事新加坡与砂劳越之间贸易的念头，1846年创办“有海与茂公司”，两人依靠信誉赊账购货，来往两地贸易。宋旺相书中称王有海“相貌堂堂，体格魁梧，敦厚豪爽，脾气温和”。他以诚信经营，擅于结交土著，凭借强壮的体格从事海运，逐步扩展生意，1856年成立“启章与有海公司”，1872年改为独资的“王有海公司”（华文商号名：顺发），同年捐款为宗人购置太原山。

王有海深耕于砂劳越，对当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贡献良多，成为华社领袖，深受白人拉惹信任，被封为砂劳越华人甲必丹。由于常年往来新加坡与古晋，他在两地均建立家庭生育子女，形成家族两大支系——在新加坡的妻子杨氏(1831-1895)为长顺与顺智的母亲；在古晋的妻子为张氏(1840-1929)为长水的母亲。这两房子嗣均不负父亲的期望，合作共进长期确保家族在新加坡与砂劳越之间贸易的主导地位。

王有海晚年定居新加坡，在里峇峇利



# 游刃于新加坡与砂劳越之间的 王有海家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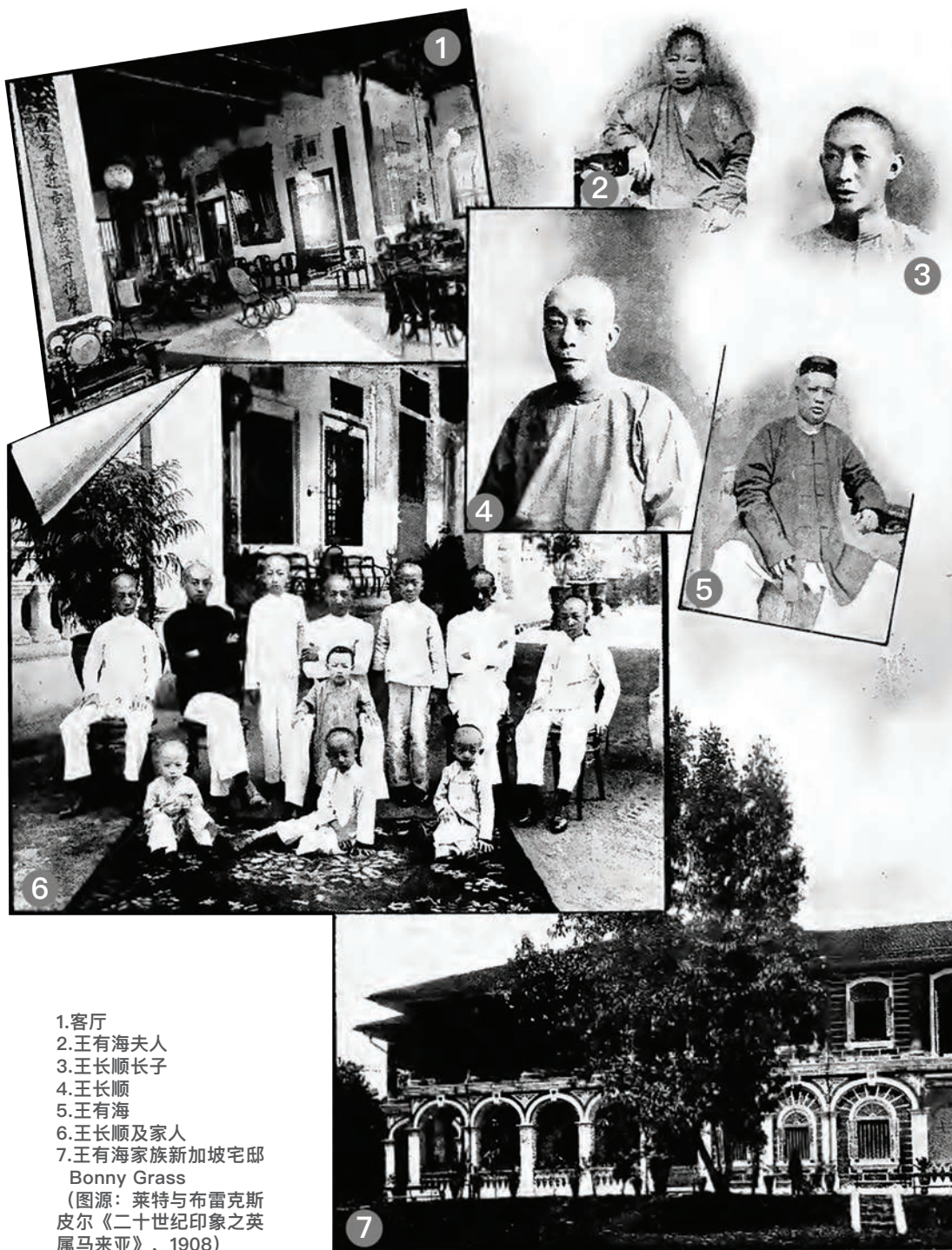
文图 · 陈煜

兴建 Bonny Grass（金炎路12号），建筑设计几经修改，直至其去世时仍未完工，由长顺接手完成这座颇负盛名的宅邸，成为家族在新加坡的聚居之处。1908年出版的《二十世纪印象之英属马来亚》曾有短小文字介绍王长顺，却配置整页有关其家族的插图，包括他与父亲及儿子们的照片，以及这座豪宅的内外景。王有海在古晋亦兴建家族宅邸，坐落于友海街后的小山头上，面向砂劳越河，是家族在古晋的长居之处。

王有海于1889年6月9日在新加坡去世，享寿60岁。尽管是献山人之一，他未安葬于太原山，而是与杨氏合葬于武吉知马路荷兰路火车站后自家产业内，墓碑记录当时在世的七子十女的名字，该墓于1967年2月因土地开发而迁葬于太原山。

## 定居新加坡的 长顺与纯智

王长顺（字者香）1855年出生于新加坡，彼时家境已大有改善。



1. 客厅
2. 王有海夫人
3. 王长顺长子
4. 王长顺
5. 王有海
6. 王长顺及家人
7. 王有海家族新加坡宅邸  
Bonny Grass

（图源：莱特与布雷克斯皮尔《二十世纪印象之英属马来亚》，1908）



王有海 (图源: 宋旺相  
《新加坡华人百年史》, 1922)



王有海家族在古晋的宅邸  
(图源: 互联网)



王长水 (图源: Ong Boon Lim 《砂劳越的王长水》, 1990)

据《南洋名人集传》记载，王长顺曾接受7年中文教育，后进入英校学习4年，精通中英双语，19岁开始参与家族生意，深得父亲嘉许。其父去世后，他与弟弟纯智、姐夫邱宗成（1845-1925）共同经营家族生意，“业以大振，而所置各产业为数尤巨，树胶椰园等凡数千亩，屋宇尤多。”1900年4月10日，邱宗成发表声明脱离王有海家族各商号。1921年7月30日，王有海公司迁址至厦门街113号。

1928年2月王长顺家中接连遭遇不幸。2月21日三子Ghee Chian在马丁巷12号家中去世，年仅43岁，25日葬于太原山；3天后妻子林氏亦在同一地址撒手人寰，迟至4月6日安葬于文德路家族墓地。1934年10月30日王长顺在新加坡家中去世，享寿80，与妻子合葬。两人育有十子五女，因三子早逝，新闻报道九位儿子的名字，由长至幼分别是凌云、绑印、集熙、妙森、集贤、集丰、集裕、裕振、序庆。

王纯智1871年出生于新加坡，正是其父事业辉煌之时，他比大哥长顺小16岁，自幼在英华学校接受教育，是该校最早的学生之一，毕业后加入家族公司跟随大哥经商，曾担任大东方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和联东保险有限公司董事，硕莪商公会主席等职。王纯智热诚支持海峡华人社会与教育改革，与林文庆医生是同时代的人物，作为新加坡女子学校的创办人之一，长期担任义务秘书和财政等职。因其热心社会公共事务，1915年获封为太平局绅。王纯智于1946年2

月10日去世，享年77岁，葬于武吉布朗市政坟场。妻张缵娘于1953年2月23日去世，与其合葬。

## 坐镇砂劳越古晋的长水

王长水1864年8月3日出生于古晋，比大哥长顺小9岁，主掌家族在砂劳越的业务。他先是进入古晋教会学校圣托马斯学校学习，后到新加坡升学两年，1882年加入王有海公司，五年后成为砂劳越船务公司董事，开始活跃于社会活动。王有海公司一直是砂劳越船务公司唯一的新加坡代理商，直到1931年与海峡船务公司并列为新加坡代理商。

1889年王有海去世后，他继承父亲砂劳越华人甲必丹头衔，成为华社的代言人，热心支持慈善教育文化事业，深受各界信赖，晚年被称为“伟大的老人”。王长水一生获得众多嘉奖，最值得称道的是：1928年9月26日成为第一位获得白人拉惹颁发的砂劳越之星勋章，1947年8月16日获得砂劳越总督颁发的大英帝国官佐勋章。

王长水于1950年10月19日在古晋去世，享寿86，砂劳越各界出席其盛大的葬礼，安葬于古晋的家族墓园。王长水在新加坡迎娶的发妻婚后两年早逝，再娶曾氏，育有六位儿子，长子王观兴（1896-1982）于1947年继承其砂劳越华人甲必丹头衔，其子为丹斯里拿督阿马王其辉（1914-2000）。王长水的长女秀英嫁给黄庆昌（1890-1978），助其成为砂劳越杰出的企业家和慈善家，大华银行的创办人，其四子为黄祖耀。

## 结语

王有海家族无疑是早期马来亚华人成功传承的案例。作为南来第二代，王有海通过艰苦创业改变家族的命运，其子嗣得以接受良好的教育，在其有生之年进入家族公司学习经营。他在新加坡和古晋建立起两个家庭，将物产丰富的砂劳越作为商业腹地，将交通便利的新加坡作为与世界贸易的商务枢纽，掌控

新加坡与砂拉越之间的贸易近一个世纪。1955年10月，王长顺后裔将新加坡祖宅中的贵重家具拍卖。1964年王有海古晋后裔自愿解约，所有在世孙辈平分祖产。

王有海的三个儿子都具有强烈的公共意识，活跃于两地社会，特别是海峡华人群体。王有海公司持续为本地各项慈善事业捐款，包括本地学校的兴建，中国与日本的赈灾，以及英国殖民政府纪念活动等。《南洋名人集传》记载王长顺为南洋华侨中学创办捐款2000元，道南学校建筑捐款3000元，资助考获政府学校学医者1500元等。

值得关注的是王有海家族与本地闽籍王氏宗亲机构的关系。作为太原山三位献山人之一，王有海从福州请回闽王画像与祖王祖婆神龛，供奉于1892年设立的“闽王祠”。尽管有后裔安葬于太原山，他与两子长顺、纯智均未将太原山视为安息之地。1919年殖民政府收购太原山部分土地作为武吉布朗市政坟场，显露慈善产业缺乏管理的问题。1924年成立王氏慈善（开闽公司）作为信托机构管理太原山，已是古稀高龄的王长顺被推举为三位信托人之一，1934年去世的第二年，该位由其子裕振所接替，直至1955年去世。王有海的子孙因家族声望担任信托人，却未能促进太原山的发展，20世纪中期王氏慈善（开闽公司）进行改革，打破世袭制度召集闽籍王氏族人以民主投票的方式选出新的信托人。

(作者为ON-LABO创办人兼主持人、本刊编委)

## The Ong Ewe Hai Family in Singapore and Sarawak

Ong Ewe Hai (1830-1889) was one of the three donors who jointly purchased the land for the Hokkien Ong clan in Singapore in 1872. Originating from the Baijiao Village, Tong'an County in Fujian Province, he and his three talented sons, Tiang Soon (1855-1934), Tiang Swee (1864-1950), and Soon Tee (1871-1946), turned the family into one of the most prominent Chinese families in Malaya. The rise of the Ong Ewe Hai family wa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modern development of Sarawak.

Ong Ewe Hai's father, Ong Koon Tian, was the first generation in Singapore. Unfortunately he died when the boy was only seven years old. Ong Ewe Hai started working at the age of 16 and ventured to El Dorado in Sarawak with Lim Eng Moh. They set up the Ewe Hai, Moh & Co. in 1846 to start a small trade business between Singapore and Sarawak. The sole proprietorship of Ewe Hai & Co. was incorporated in 1872. Due to his contributions and leadership, Ong Ewe Hai was appointed by the White Rajahs as the Kapitan Cina of Sarawak. He raised families in both Singapore and Kuching. His wife in Singapore, Yeo Swee Kim, was the mother to Tiang Soon and Soon Tee, while Teo Soo Neo in Kuching was the mother to Tiang Swee. The sons from these two branches lived up to their father's expectations, and their close collaboration ensured the family's dominance in the trade between Singapore and Sarawak for almost a century.

Ong Tiang Soon received Chinese education for seven years before enrolling in an English school for another four-year study. He joined the family business at the age of 19. After his father's death, he and his brothers and in-laws developed the family business extensively. Ong Soon Tee was the first batch of pupils of the Anglo-Chinese School. After graduation, he joined Tiang Soon to work for the family business. Known for his earnest support for social reforms in Singapore, he was one of the founding members of the Singapore Chinese Girls' School. He was awarded the title of Justice of Peace in 1915.

Ong Tiang Swee first attended St. Thomas' School in Kuching and then travelled to Singapore for another two-year studies before taking charge of the family business in Sarawak in 1882. Five years later, he became a director of the Sarawak Steamship Co. Ltd. and had been active in public affairs since then. He was appointed the Kapitan Cina of Sarawak after his father died in 1889 and was widely known as "The Grand Old Man" in his later years.

All three sons of Ong Ewe Hai were active in Singapore and Sarawak. However, they did not consider the Seh Ong Cemetery their last resting place. Even though Ong Tiang Soon was elected as one of the first three trustees for the Seh Ong Charity (Kyban Congsee) in 1924 and his son Joo Chin took over his position one year after his death in 1934, their involvement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Kyban Congsee was limited. Issues in the patriarchal leadership led to the Kyban Congsee's institutional reform in the middle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 携手为文 比翼双飞

## 何乃强 冯焕好夫妻专访



文·齐亚蓉  
图·受访者提供

### 乃强出世

1937年，圣诞的钟声还在耳边回响，一大早，地处马来半岛最南端的热带小岛新加坡即被黑压压的乌云笼罩着，但直至午后也不见一星半点雨丝飘落下来。空气似乎凝滞了，令人感到些许压抑与不安。

跟往常一样，安昌金铺的老板何焯藩（字耀平）安坐柜台前，他微闭着双眼，不知是在打盹还是在默祷。

位于小坡大马路（今桥北路）454号的安昌金铺开业刚满一年，生意也渐入正轨。但自广东顺德南来打拼的焯藩总也忘不了金铺开业初期所面对的困境。那时的他不止一次想要结束营业，回返故里，但却一再遭到妻子的反对。“坚持下去，会好起来的。”她总这么安慰他。

“会好起来的。”虽然时过境迁，但他早已习惯了每天在心底默念一番。就在这时，一阵婴

孩的啼哭传入耳际，他猛然从椅子上跳起，朝二楼住家跑去。

“是个男孩。”接生婆笑吟吟地告诉他。

初为人父的焯藩按族谱字辈为这个男婴取名乃强。

### 来自父亲的启蒙教育

乃强即将四周岁时，安昌金铺迁至大坡大马路（今桥南路）251号，他们一家大小也在该店铺的二楼上安顿下来。

此时的焯藩已是三个孩子的父亲。曾在家乡读过几年私塾的他深知教育的重要，“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是他最常挂在嘴边的“至理名言”。

乃强有关人生的最早记忆，当是来自父亲的启蒙教育。他清楚记得每到工余时间，父亲就会拿出珍藏多年的红皮书，用广府话教他朗读《三字经》《千字文》《神童诗》等传统读本，后来还教他读《明心宝鉴》《成语考》及《明贤集》。这些古书音韵谐美，前后连贯，加上条理清晰，文采斐然，小乃强虽然不大明白其中的含义，但也能感受到那种难以言说的美感。

除了读古书，父亲还利用一切机会增加他的识字量。晚餐后，父亲常带乃强及弟妹们一起出门散步，但凡见到招牌或广告，他一定教他们反复认读上面的每一个字。

后来，父亲还把乃强及小他一岁的妹妹若韵一起送往前清秀才谭恒甫开办的私塾——位于长泰街（今福建街上段）的有恒学校。在那里，除了学习四书五经，乃强还在老师的教导下开始用毛笔临摹起书法来。

整个日治时期，除了逃难波东巴西那几个月，乃强的读书认字从未有过中断。

日本投降后不久，位于乃强住家屋后翠兰岗上的养正学校开课。1945年10月2日那天，乃强穿上校服，成为这所传统华校的一名学子。

## 乃强的中小学教育

虽然很多同时期的家长都因顾及孩子的前途而送他们入读英校，但乃强父亲认为，作为华人的后代理应先学好母语，然后再学英语。他的八个孩子适龄时无一例外先后跨进了养正学校的门槛。

入校三个月后，乃强升入二年级，五年后，这批和平后首批入校的养正学子完成了小学教育。

养正时光于乃强而言无疑是轻松而美好的，学习能力超群的他年年名列前茅，华文作文常常被贴在壁报栏里，深得老师和同学们的喜爱。

1950年，乃强进入文学氛围浓厚的中正总校。中一时，教他华文的胡超球老师鼓励学生多练笔，要求他们行文务必简洁明了，老师的教导乃强至今铭记在心。

中二时，他跟热衷文学创作的叶镜泉及骆明成为同窗，并在他们的影响下尝试投稿。1952年7月12日，他的杂谈《方世玉》在南洋商报《学海版》刊出。

中三那年，曾三次荣获《南方晚报》征文比赛（公开组）冠军的梁增瀛（新谣代表人物梁文福之父）成为乃强的同窗好友，这位后来的报人既是乃强的同路人，也是他学习的好榜样。

此时的乃强也成为四妹若锦的写作启蒙老师，若锦（笔名白金）在中学时曾获“学生周报征文比赛”初中组冠军，成人后的她更三获“新加坡书籍奖”。

伴随创作欲的高涨，乃强的阅读量也大增，除了中外名著，他也迷上了武侠小说。

这一切都为他日后步入华文文坛打下了稳固的基础。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的乃强不仅仅只是中正的学子：每天放学后，在车里换上校服，他即前往一所英校上课；而晚上回到家，他还要背起第三个书包去一位私塾老师家学古文。

初三那年年中，当时的华文中学日趋动荡不安，父亲怕他受到影响，送他去了三伯父所在的檳城，要他报读那里的钟灵中学。几个月后，乃强退学回到新加坡，但他次年开学时并未重返中正，而是成为圣安德烈中学（英校）的一位中一超龄生。

1960年，乃强考获高等剑桥学校证书，进入马来亚大学（两年后更名为新加坡大学），成为该校医学院的一名学子。

需要说明的是，乃强就读英校的那几年里，他的华文教育并未中断。每周三四个晚上，父亲的一位老学究堂兄会来家里为他补习古文。

虽然没能像中正的同窗好友们那样进入南洋大学中文系深造，但日后步入杏林的乃强也成了新华文坛的一份子。

跟他一起驰骋新华文坛的，还有他的另一半冯焕好。

## 焕好的成长岁月

1943年岁杪，牛车水沙莪街，一家店铺楼上分隔出的一间窄小而简陋的住家里，一个女婴呱呱坠地。她是父母的长女，来自广东南海（今佛山）的父亲为她取名焕好。

焕好七岁那年，母亲为她准备了一个新书包，里面除了书本跟文具，还有几根葱跟芹菜。从未进过学堂的母亲解释说葱跟芹菜代表聪明与勤劳，似懂非懂的焕好接受了母亲的诚意与祝福，并跟随她来到离住家大约十家店铺之距的通志学校。拜过孔圣人之后，焕好拿出华文课本，开始了自己的求学生涯。

三年后，父亲接受通志学校一位老师的建议，为焕好申请入读颇具规模的正规学校——养正学校（该老师认为焕好是“可造之材”）。父亲送她入校读书的初衷，是让她认几个字，可以看懂来自唐山的家书。

进入养正不久，焕好家搬至学校附近的安祥山，此时的她身后已有五个弟妹。放学回到家，除了干不完的家务事，弟妹们也需要她帮忙照顾。

但这一切并未对她的学业产生太大的影响，她的各科成绩都相当突出，总成绩更是名列全班之首。

小五那年，她跟同班同学何若锦成为闺中密友，并经常互邀去彼此家里一起做功课。

小学毕业后，她跟若锦一同进入南华女中，中二那年，若锦转去圣尼各拉女校，焕好则一直就读南华女中直至高中毕业。虽然不在同一所中学，但俩人的友谊并未因此而中断。

焕好读高中时，适逢教育体制改革，传统的初、高中各读三年的三三制改为初中四年、高中两年的四二制。高二年终，焕好所在年级提早一年毕业，她的毕业会考成绩名列全校之首。同时，这群读完高二即提早毕业的学生还跟已经读完高三的学生一同参加了当年的高级剑桥学校会考。

拿到高中毕业证的焕好通过了南洋大学的入学考试，她被该校数学系录取，但因中学没读满六年，只能先以旁听生的资格入学（等待剑桥会考成绩）。与此同时，她也收到新加坡大学先修班（该校规定华校生必须读一年先修班）的录取通知书。权衡再三，焕好选择入读新加坡大学。

1963年，刚满19岁的焕好进入新大修读文科，图书馆是她最常出现的地方。在这里，她跟若锦的大哥乃强不期而遇。一年后，志趣相投的他们成为令人称羡的一对。

1966年，乃强与焕好自新大毕业。次年，二人结为夫妻。



1966年，二人身着新加坡大学学士礼袍合影

## 步入文坛

教书育人是焕好一直以来的志向，一拿到大学毕业证书，她即向教育部提出了申请。但那年的华文教职无空缺，她只好去卫生部做了三年行政工作。

1969年，焕好前往德新中学接手黄友吉（作家苗芒）老师的工作。这一时期，华文教育被边缘化的趋势日渐明显，华校数量越来越少，命运堪忧。某日，焕好听到一位同事兴致勃勃地炫耀自己如何漏夜排队给

儿子报进了一所英校，她的内心五味杂陈，慨然挥就一篇长文，以申申（长子国申昵称）为笔名投去《南洋商报》文艺副刊，一投即中。

1974年，焕好调往刚刚创办的华中初级学院担任华文部主任。两年后，乃强获哥伦比亚奖学金赴澳洲受训，焕好暂离工作岗位，携三个年幼的儿子前往陪读。

空闲下来的焕好再次提起了笔，所见所闻所思皆落笔成章，她以何濛（“荷尔蒙”谐音：何从夫姓，乐水之故，蒙加水成濛）为笔名投稿《南洋商报》文艺副刊，每投必中。写作者何濛闪亮登场。

一年后，他们一家五口回返新加坡，重回华初的焕好在百忙之中仍抽空笔耕，继续投稿《南洋商报》。

1983年，她的首部散文集《何濛散文》出版。三年后，她把老舍的名著《骆驼祥子》进行了删减改写，作为本地“中学生辅助读物”出版发行。

这一时期，行医二十余载的乃强也再次提笔为文，并以幼吾为笔名投稿《联合早报》副刊“快乐家庭”版。1987年，他的首部散文集《儿童病房》出版。

乃强为自己取笔名幼吾，这二字自然跟《孟子·梁惠王上》之经典名句“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有关，但同时也包含以下两层意思：其一，幼即小，吾即我，隐含小我成就大我之意；其二，吾字可拆为五与口，代表他们当时的五口之家。

## 专栏作家

1987年，焕好荣升华中初院副院长。为了把行政工作（用英文写报告及与人沟通）做得更加出色，她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以提高英文水平，故此停笔七八年之久。

就在这一年，她整理书架时发现一些旧文稿，当即萌生出版散文集的念头，但后因忙于工作而耽误下来。两年之后（1989年），她的第二部散文集《不凋萎的回忆》出版。

1995年1月，焕好再次重拾旧好，这一次，她开始在《早报周刊》写专栏，每周一篇，取名《时人时语》。1998年5月，她的专栏改去早报副刊《四方八面》版，取名《好为人师》，同样每周一篇。

乃强是她的第一读者，也是她最大的精神支柱。每当她在极度忙累之中意欲偷懒之时，他都会适时加以鼓励与督促，还帮她找灵感，甚或查

资料。

1997年，焕好离开服务二十余年的华中初级学院，调往达善中学任校长。

1999年，她把这些年的一部分作品编缀成册出版，是为她的第三部散文集《校园有爱》。

这年9月，焕好因公务太过繁忙，遂跟编辑商定改早报专栏每周一篇为隔周一篇，并建议跟乃强轮流当值。医者乃强的专栏《父母心》出现在读者眼前。

2001年，焕好调至南洋初院任校长。两年后，她把近年来的专栏作品集结出版，是为她的第四部散文集《春晖遍四方》。

2006年，年届62周岁的焕好办理了退休手续。也就在这一年，他们夫妻二人的散文合集《杏缘》出版。该合集由乃强的“杏林篇”及焕好的“杏坛篇”各38篇组成，这些文章皆出自他们的专栏。

并肩走过40年风雨的他们，携手为自己写下了最为精彩的一笔。

2016年，他们的次子——麻醉师医生何国元也在《联合晚报》写了一年专栏，取名《醉看人生》。子孙们对华语华文的兴趣和爱好，显然离不开父母的言传身教。

## 永不言休

退休后的焕好并没有闲下来，她受邀前往南洋大学教育学院教授硕士班《优质教育管理》课程，并在学校和社区推广传统文化，教导《弟子规》《论语》等国学经典。

2012年，焕好不再写专栏，但她的文章还会不时出现在《联合早报》“四方八面”版。

2016年，她回顾自己为教37周年的力作《育人之旅》出版。

乃强的专栏则持续至今。边工作边写专栏的



何乃强及冯焕好部分作品

同时，乃强还完成了为父亲写传记的夙愿。2011年12月14日，父亲百岁冥寿之际，《父亲平藩的一生》出版。2014年，这部自酝酿至印行历时二十余载的倾情之作荣获“新加坡文学奖”。

两年后，乃强的《医生读史笔记》问世。这部包含59篇替古代君臣诊病的“读史笔记”首载于《联合早报》之“早报星期天”栏目。

2015年，乃强前后花费十年心血完成的《冼星海在新加坡十年1911-1921》问世。该书是对冼星海生平史料的补遗，同时也纠正了一些现有史料及影视作品中出现的谬误。

2023年，乃强近年来的部分专栏作品集结出版，是为兼具文学及史料价值的《牛车水人说牛车水的故事》。

不言休，不言退，虽已双双年过八旬，但这对携手为文的老人仍在比翼双飞。瑰丽的晚霞中，他们的双翅闪耀着梦幻般的色彩。祝福他们！

题图说明：

子孙满堂全家福（前排中为何乃强、冯焕好夫妇）

（作者为本刊特约记者、冰心文学奖首奖得主）

## 后记

得知何乃强、冯焕好夫妻之大名久矣，但对他们的了解实在太过局限。去年三月参加《源》杂志举办的“2022年度优秀文学作品奖”颁奖典礼，首次跟何乃强医生谋面，方知他早已年过八旬，于是连忙要了他的手机号码，想着必须尽快采访他们夫妻。

几个月后发信息联络何医生之时，他们二

人正在澳洲旅游。两个星期后，我如约前往他们家，首次见到了冯焕好校长。对她的第一印象是年轻，无论样貌抑或谈吐，直到现在，我仍不愿在她的姓名前冠以老人二字。大她六岁的何医生也几不见老态，做了大半辈子儿科医生的他，笑起来满眼的纯真，满眼的慈悲。

任何赞美都不为过，任何赞美都显多余。从略。

# 对合唱艺术 锲而不舍的 齐文洋



文图·郭永秀

**新**加坡早期从事音乐活动的人，特别是从事华乐和华语合唱的音乐家，他们默默耕耘，在没有外来支援的条件下，为新加坡的音乐事业做出了无私的奉献。近90高龄的齐文洋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

齐文洋1934年8月5日出生于马来西亚丁加奴州一个名为龙运的小镇。他在当地的光华小学念书时，有一位老师很会唱歌，同学们经常缠着要他唱歌，特别是那首《夜半歌声》。老师就说：“哦，你们要买葡萄给我吃我才唱。”结果同学们真的买了葡萄给他，他就唱了。其实老师并非贪吃葡萄，而是利用这样的机会启发同学们对歌唱的兴趣。

齐文洋就在这样的情况下迷上了歌唱。他觉得老师的歌声很动听，希望自己也能唱得像他一样好。那时候小学也有音乐课，唱的是《西风的话》《茉莉花》《杜鹃花》等类似的歌曲。

1950年齐文洋移居新加坡，在中正中学分校上中学一年级，是个超龄生。当时的中正中学在音乐教学方面有许多名师，比如丁祝三、李豪、姚平、许建吾（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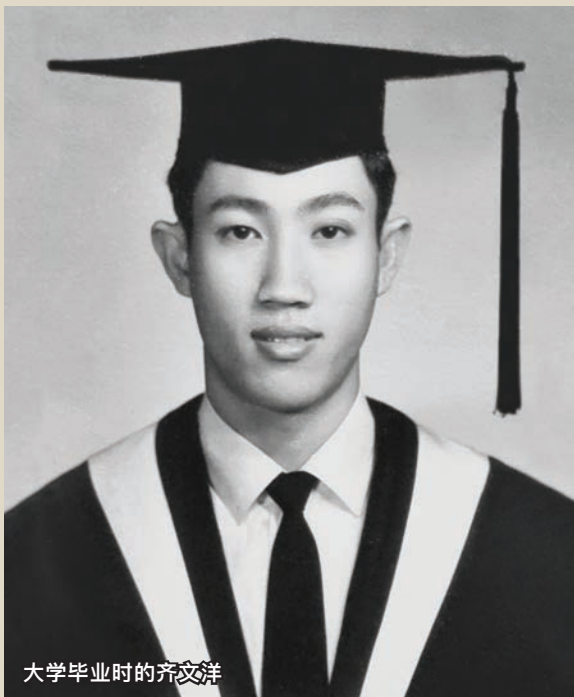
作者），后来还有田鸣恩、陈毓申等。所以齐文洋有更多机会接触这些音乐名师，学习不同的歌曲，特别是当时著名的艺术歌曲。1955年齐文洋参加中正中学合唱团，得到该团指挥田鸣恩的指导，过后继续跟陈毓申学习。

中正中学当时属名校，学生活动非常活跃。在众多老师的指导下，齐文洋更加坚定了走歌唱之路的信心。上世纪50年代成立的新声合唱团，齐文洋也加入了。团员大多数是在职人员，有很多是专业人士，每个星期天都排练。那时候他还小，在团里打杂，老师在团里是义务的教导。除了学习歌唱技巧以外，齐文洋也学到了如何组织和带领合唱团。当时团里也不乏后来在歌唱艺术上颇有建树的歌手如：李三峰、陈仰厚等。

50年代尾60年代初，新加坡经历了一场动乱以后，成立了许多新的学校：如华侨中学、德新中学、德明中学、华义中学等。齐文洋念高三那年，因为政治动乱和学运，他没有参加考试，但爱才的王厚仁校长却推荐他到台湾师范大学音乐系学习。







大学毕业时的齐文洋

## 大学深造后 才华渐施展

齐文洋到了台师大，开始正规地学习声乐、语文（意大利文及其他外文）、教育等。第二年他主修声乐，师承留学意大利的女高音郑秀玲教授，后来又跟随留学日本的张振南教授学习。他4年后毕业，于1962年拿到文学系的文凭，又到新加坡大学进修，1970年荣获新加坡大学教育文凭。

他回到新加坡做了老师，后来又被调到课外活动中心ECAC（Extra Curriculum Activity Centre）当指导员（Instructor），任务是到不同学校指导同学们唱歌，成立学校合唱团。

1988年，齐文洋受时任部长王邦文的邀请，到颐年中心指挥合唱团。该合唱团的前身是时任政务部长陈志成在惹兰勿刹（Jalan Besar）联络所创立的合唱小组，那时候齐文洋刚从英国回来，就在那里教唱歌，他有一个规定：虽然新加坡是个多元种族的国家，他教一些外文的歌曲，但总要腾出时间教唱华文歌。提到现在许多年轻合唱团不唱华语歌，齐文洋对此不敢苟同。他认为做人不能忘本，不管外国艺术歌曲有多好听，华文华语才是我们的根。

齐文洋说：“这一生中最尊敬的人，是已故的前词曲作家版权协会会长曾贵明先生。曾先生是本地文化人，生前为新加坡的乐坛、文化圈做

出许多贡献，深得本地文化界的尊重和敬仰。曾先生早年在野马哈公司任总经理，也曾任国家剧场信托局董事。”

2017年，曾贵明在当词曲版权协会主席的时候，国家剧场俱乐部在主席赵慕华的支持下，由词曲版权协会赞助国家剧场俱乐部创办了一个声乐训练班，地点在蒙巴登联络所的艺术活动中心，邀请王素珊、吴杰和齐文洋三位为歌唱班导师，吸引了许多很有才华的青年才俊参加。这个声乐课程深受喜爱歌唱的人的欢迎，也造就了许多歌唱人才。课程完结后还特地主办音乐会，让歌唱班的学员有机会登台演唱，对整个歌坛起了一定的影响。

2017年8月25日，国家剧场俱乐部为13位青年歌手及国家剧场俱乐部少儿合唱小组在南洋艺术学院李氏基金剧场主办了结业首演，向大家展示这个声乐训练班的成绩。可惜曾贵明先生在同年12月4日逝世以后就停办了。

齐文洋说：“我在歌坛活跃几十年，参加过许多音乐会演出，也经常带合唱团到其它的国家表演，同时坚持唱本地人创作的歌曲。我要感谢李煜传、郭永秀、李伍华、周炯训等作曲家为我们写了许多好听的歌曲，对他们花了很多时间为新加坡乐坛尽心尽力、默默耕耘的精神非常感动；更要感谢曾贵明先生在歌唱方面和主办音乐会方面给予我的帮助，他全无私心，对本地音乐工作者能帮就帮，对我们的乐坛的贡献有目共睹。”

## 担任多间中学指导 成立青声合唱团

齐文洋曾受聘担任新加坡社会发展部文化事务处音乐组声乐顾问多年。1983年至1985年受聘担任新加坡广播电台歌唱训练班导师，多次受邀担任马来西亚全国文艺歌曲独唱及合唱训练班导师，以及任马来西亚全国文艺歌曲独唱及合唱比赛评审。齐文洋也曾负责指导及指挥华中初级学院、南洋初级学院、安德逊初级学院等合唱团多年。

在所有齐文洋指导过的团体中，必须特别提一下青声合唱团。1973年底五校联合合唱团演出成功，掀起同学们对合唱的浓厚兴趣，因此成立了校际合唱团，由当年新加坡的中学合唱团中唱得比较好的学生精选而成。当年校际合唱团有相当高的演唱水平，本来歌唱艺术与教育挂



齐文洋到台湾演出，与时任总统马英九合影



2023年10月21日青声合唱团纪念成立50周年的演唱，特邀齐文洋客卿指挥《去到那百合盛开处》，接受现任指挥陈铭孝献花

钩是很好的事，可惜后来教育部决定放弃校际合唱团，不再让他们继续隶属教育部。团员们不甘就此解散，到校外自己注册成立了一个新的合唱团——青声合唱团，那是1976年9月的事。

青声合唱团由一群热诚的年轻人组成，邀请齐文洋为导师及指挥。他们为本地慈善机构、文艺场所、电视节目等演出，受邀到香港、台湾、泰国、菲律宾、中国等地演唱，深获好评。这些年来青声合唱团经历风风雨雨，一路走过几十年，也换了指挥。他们曾邀请中国著名合唱指挥曹丁、杨鸿年等来客卿指挥，仍然保持活跃，每年继续举行音乐会。近日我受邀在新加坡艺术学校（SOTA）音乐厅聆听青声合唱团的演唱，激越的歌声、爱乐的初心，大家仍然是宝刀未老，而且又招募了一批新团员，演唱也具有自己独特的风格。齐文洋当年在校际合唱团解散后，能够与团员共同组织这样的一个合唱团，这也是对新加坡乐坛的一个贡献。

### 青声合唱团培养出许多优秀歌手

青声合唱团培养了相当多的歌唱能手，如游吟四重唱中的4位男生：叶顺云、陈铭孝、丁友岩和张振兴。还有我特别欣赏的钢琴伴奏曾培双，几十年如一日免费为青声合唱团伴奏，现任指挥陈铭孝也是当年青声的团员之一。

2023年10月21日，我受邀在新加坡艺术学校（SOTA）聆听青声合唱团纪念成立50周年的演唱。他们特别请齐文洋来客卿指挥其中的一首曲《去到那百合盛开处》。由于齐文洋不良于行，只能坐着轮椅指挥。早期的人都特别有情有义，这群“老学生”很多都到了“知天命”或“耳顺之年”，

却还能不忘师恩，邀请老师来客串，这份情怀现代人恐怕已经少有了。

不管是指挥校际合唱团、青声合唱团或颐年中心合唱团，齐文洋没有拿过一分钱，都是义务担任指导，这在现代人看来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显示出那个时代的人，为了文化艺术的传承，为了心中的信念，毫不计较个人得失。环视今日的音乐界，有多少人能够做得到呢？

齐文洋告诉我：当年新马之间的合唱团经常有交流、联系，而且互相拜访，联合主办音乐会。马来西亚经常会邀请新加坡的合唱团到马来西亚各地演出，新加坡的合唱团也会邀请马来西亚的合唱团来这里演唱。当时的新马合唱界，非常活跃。大家一心一意为了推广合唱艺术以及华语合唱的传承，从不计较个人利益。齐文洋感叹地说：“现在不一样了，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很少有交流，是因为观念已经不同，即使是业余的团体，大家都注重个人得失，不赚钱的事不干，所以很多事都干不了。”

齐文洋祖籍河南，他的太太龚彩鸾祖籍是河北，他俩在马来西亚丁加奴出世，后来又移居到居銮。年轻时他们都在新加坡中正中学受教育。毕业后龚彩鸾回到居鸾，在中华小学担任音乐老师，齐文洋在那里遇见了她，两个人就结婚了。婚后齐文洋到新加坡当老师，龚彩霞为了能靠近



四回之家（左起：太太龚彩霞、大女儿齐念慈、二女儿齐念恩、齐文洋）

新加坡，就在新加坡对岸的宽柔中华小学教音乐。她也爱唱歌，后来颐年中心合唱团成立，她也成为团员。他俩可说是夫唱妇随，一起浸淫在音乐的海洋中。可惜龚彩霞在2010年7月22日仙逝了。

齐文洋和龚彩霞膝下育有二女：大女儿齐念慈，二女儿齐念恩。两个女儿深受父母亲的影响，从小学音乐。齐念慈的钢琴、歌唱及乐理都考到英国皇家音乐学院八级文凭。早年许多音乐会中，我经常看到齐念慈在台上为合唱团、独唱者伴奏，有时候也听到她独唱。小女儿念恩则远在英国工作。

### 获颁杰出贡献奖及公共服务奖章

四年前齐文洋的脊椎骨旁的血管爆裂，这条血管影响了两只脚的正常功能，只能坐轮椅。还好双手与常人无异，热爱合唱艺术的他，仍然坚持每个星期到颐年中心与合唱团排练。

近年来齐文洋也在家教唱歌。他一向提倡艺术歌曲流行化，流行歌曲艺术化，所以教艺术歌曲也教流行歌曲。每三个月他就为学生举办一次交流会，大家一起互相切磋交流。有时也带他们到马来西亚吉隆坡，与爱唱歌的朋友交流

歌艺。

由于齐文洋对本地歌唱事业的贡献，新加坡词曲版权协会于2016年颁发给他“音乐杰出贡献奖”。现在他是新加坡颐年中心合唱团指挥，也是新加坡留台大专校友会会长。

齐文洋指挥合唱团超过百场以上，包括国内和国外的音乐会。其中令他难忘的一场是：1996年由大众学佛研究会主办、光明山普觉寺及新加坡佛教居士林赞助的“佛韵交响之夜”音乐会。120人气势磅礴的合唱团，由弦乐团伴奏，分别由李煜传与齐文洋指挥。

1994年齐文洋荣获新加坡共和国总统所颁发的公共长期服务奖章（PBS）。几十年来他指挥过许多学校合唱团，培育了不少音乐人才。他曾担任过新加坡十一合唱团工委主席及合唱协会会务顾问多年，并曾受委为新加坡文化部声乐组顾问。回顾这几十年来走过的路，齐文洋和许多早年从事合唱艺术的音乐家一样，可说是孜孜不倦、无怨无悔。也因为他们这一代的音乐家一路走来，呕心沥血，不计得失的付出，才有了今天新加坡音乐的盛况。

（作者为本地诗人兼作曲家）



2016年，齐文洋荣获“音乐杰出贡献奖”，与颐年中心合唱团全体团员合影

# 少儿演艺的开拓者 马业仙



文·章秋燕  
图·受访者提供

**星** 期五傍晚，我赶完了最后一堂课后，急匆匆地赶往滑铁卢街。巴士在拥挤的马路上慢条斯理地行驶着，我的心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巴士好不容易到站，我立即向设在滑铁卢街的青少儿广播演艺组（简称“少儿组”）总部飞奔。看到马业仙老师站在门口，笑容可掬的样子，令我稍觉心安。接着，她亲切地递上特地为我准备的糕点与茶水，我紧绷的心在她的殷勤招待下才慢慢放松下来。心想：她的这份真诚与热情，亦是创作的动力、生活的动力吧！

## 音乐飞扬的童年时光

现年65岁的马业仙，从小就对艺术有梦想，

这与她的成长环境脱不了关系。父亲马大珍原籍海南省琼海市，是一名理发师，喜爱在家中朗诵富有音律的海南古诗。他也写得一手好字，对家中子女写字的姿势等都很有要求，马家子女个个都写得一手好字。大哥马波浩自幼酷爱书法美术，后师从已故知名书法家崔大地，习篆隶草书长达八年。他也曾任南洋大学美术学会会长。

马业仙虽然不是出生在音乐世家，但是三名哥哥懂得很多乐器，让她有幸在音乐的熏陶下成长。由于三名哥哥都是口琴高手，所以马家每一天都飞扬着悦耳的音乐。每当哥哥们吹起口琴，清脆嘹亮的琴声，优美的旋律便在她耳边萦绕。在耳濡目染下，她也能无师自通，开始吹奏口琴。另外，大哥马波浩是圣约翰铜乐队的重要成员，曾获得英女皇颁发的勋章，表扬他对圣约翰的贡献和服务，后来加入SIA铜乐队；二哥也在圣约翰铜乐队负责打鼓；三哥则是华乐团成员，他不仅会拉二胡，也擅长

弹琵琶和吹笛子。潜移默化的影响下，马业仙从小就对多首华乐名曲，如《赛马》《霸王别姬》《十面埋伏》等耳熟能详。至于乐器，马老师则对钢琴特别迷恋，甚至到疯狂的地步。她每年都要求父母让她学琴，在12岁那年，她终于凭着优异的学业成绩获得父母的应允，成全了她的心愿。翌年，她考进南洋女中，并在同学周君蓉的邀约下，一起到新加坡表演艺术学院（现在的实践剧场）学琴，成为表演艺术学院第一届钢琴班的学员。

“实践剧场给我的熏陶对我的艺术追求影响很大。当年，我除了学琴外，还要负责后台工作，被分配到音响组。记得第一次负责舞台效果，就是在郭宝崑先生导演的戏里负责‘打雷’。虽然只是一声雷，但他要求严谨。他要求每次排戏时，所有的工作人员，无论是道具组、灯光组或音响组，都须坐在旁边看戏。他要每一个工作人员都参与作品创作，不是只负责自己工作范围里的事。从他那里，我学到了那一声雷要准确，不只是时间要对，而是要使整个戏浑然一体。或者这么说吧，你是负责服装的，你通过剧场排演对戏里角色的情感思维和背景若有所了解的话，你设计出来的服装肯定是很贴切的，跟戏是一体的。观众最后看到的不是你的服装很美，或你的灯光很美，而是所有细节融汇而成的整体美。”

在实践的那段日子，无疑影响了马业仙对美学的看法乃至对生活的看法，也形成了她对工作的严格要求。马老师笑着说，为此，很多舞台监督很受不了她。她感叹现今一些艺术工作者已经失去了这种严谨：“他们只顾得把技术上的工作做好，忽略了对‘艺术’融会贯通的整体追求。其实‘艺’和‘术’两者是不可分开的。”

俄国文艺理论家车尔尼雪夫斯基说过：“艺术来源于生活，却又高于生活。”确实，没有生活就没有艺术创作的源头和灵感，生活中的所有点滴小事都可以是艺术素材。马业仙在中四毕业的那一年，就实实在在地进入实境去体验生活。毕业后，她没有立即上初级学院，反倒在实际的安排下，到纺织厂当女工，与其他女工一同生活在宿舍里。“那一次的真实体验让我后来在创作音乐时有满满的信心，因生活给了我很多资源，让我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所以，我从来没有遇到写不出旋律的状况，我的信心来自生活。”

## 青年时期的留学生活

高中毕业后，年仅18岁的马业仙毅然决定远赴英国伦敦Guildhall戏剧与音乐学院留学，学习古典音乐。在那里，她不仅学习音乐创作、配乐等，学院里的老师甚至带着学生去看画和建筑物，因而让她对建筑物背后的文化与历史产生浓厚的兴趣。这后来影响了她在带领“少儿组”的孩子们时，一旦有机会在维多利亚剧院演出，她第一件事就是带他们欣赏维多利亚剧院，告诉他们罗马时期的建筑以及其特点。“我要让孩子们知道这些建筑物是有灵魂的，要他们带着敬仰的心进去剧院。”

从Guildhall毕业后，马老师回返新加坡开始教钢琴。一次机缘巧合下，她认识了电台少年儿童广播研究组的监制梁佩冰女士，当时，梁女士知道她在英国名校接受过严格训练，就邀请她担任儿童合唱指挥，为当年的儿童广播节目录制儿童合唱曲。就这样，她和少年儿童广播研究组挂上关系，于1989年受聘担任儿童合唱指挥。1992年，电台转型重组，打算朝商业发展，便决定解散少儿组。然而，马业仙因为爱上广播员们那一口漂亮的标准华语，认为就这样解散少儿组太过可惜，便决定另起炉灶，后来发展成今日的青少儿广播演艺组。

马业仙说，少儿组能够走到今天，靠的是很多支持艺术的人如梁佩冰、潘耀田和唐嘉猷等人的鼎力协助。潘耀田曾是新加坡南洋艺术学院（简称“南艺”）音乐系主任（1993-1996），那年少儿组离开电台时，他和当时

马业仙将沈谨仁的英语短剧作品《醉虾》翻译成中文版并担任导演，于2016年4月22至23日假戏剧中心剧院演出



南艺的院长吴从干热情欢迎他们加入。接着，少儿组开始开办语言班、创意写作班、戏剧班等。唐嘉猷以独特的眼光和治学理念帮少儿组开启了一条充满创意的艺术教育之路。他把西方的创意戏剧、儿童艺术教育理念带到少儿组，并在艺术创作上、教学经营或舞台管理上认真地推动少儿组成长。“我们坚信每个小孩都需要艺术教育去释放他的个性，赋予他自信心，所以我们探索的是儿童创意教育理念。这与在电台时的少儿组是不相同的，这个理念在当时的电台是不存在的。换句话说，今天的少儿组与当初在电台的少儿组是风格完全不同的组织。”

### 黄金岁月对少儿组的真诚陪伴

可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少儿组附属南艺长达7年后，离开了南艺。1999年，南艺选择追求天才儿童艺术，这与少儿组一直以来追求的创意艺术教育的理念背道而驰，于是少儿组选择心平气和地离开南艺。同一年，少儿组注册为非牟利艺术团，也成立了“剧本创作工作坊”，并在12月15和16日在维多利亚剧院呈现了新加坡首部采用华乐伴奏的华语儿童原创音乐剧《送件礼物给清朝的小皇帝》。此剧深受好评，吸引了4000多名观众观看，后来应观众要求，翌年4月22日至23日假维多利亚剧院再次重演。

少儿组离开了南艺的怀抱，在马老师的带领下继续勇敢地自创天下，竭力发展新加坡独特的相声艺术。“我当时就找了杨世彬，请他帮少儿组建设新加坡第一个相声教学系统。从他那里，也让我第一次接触相声，认识了李立山与耿殿生等著名中国相声大师。”2001年，少儿组不仅邀请李立山为少儿组授课，也特邀他参与演出新加坡首部儿童相声剧《相声大师收徒弟》。之后，少儿组陆续推出一系列以大师为题的儿童相声剧——《相声大师，您在哪儿？》《相声大师，我们来了！》《请问，您是相声大师吗？》和《相声大师找徒弟》，推动了本地相声和快板艺术的发展，也培养了一批年轻的相声演员，如刘智彬、蓝云舟、龙籍健和陈姿含等。

相声这门艺术本来就属于民间，属于生

活，而它既然是属于生活，就不应该把它当成古董，放在高架上。“因此，我们少儿组尽心竭力追求的是把相声这传统的民间曲艺从‘高架’上取下，让小朋友们参与与玩赏。”秉持这个理念，少儿组不怕艰辛，持之以恒，尽力推广儿童相声，开拓儿童相声的新园地。自2008年开始，少儿组开创了相声专场《哄堂》，呈献了许多富有本地色彩、诙谐又引人深思的作品，如《新加坡“拉”语》《谈孝》《废话》和《攀比》等。从无到至今的《哄堂16》，这16年来走来不易，当中少不了贵人相助。她说：“特别要提的是我们很尊敬的耿殿生大师，耿大师从2008年开始就为少儿组的相声演出《哄堂》的发展提供教学和辅导，他也无私地为我们培养了多名年轻的相声演员和编剧人才。这位老师父前年去世了，但他对新加坡的华族传统艺术特别是相声表演艺术的传承和发展做出了举足轻重的贡献，他的付出将被我们深深地珍视和铭记。”

2015年，少儿组力求上进，首次于4月17至18日在戏剧中心剧院推出相声剧《小茶馆》，当时的观众反应和票房都很不错。“我犹记得当时有一名家长带着年仅12岁的儿子前去看《小茶馆》，他们看着演员们穿梭在古色古香的茶馆自信地说着相声时，都被震撼了。从此以后，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她的儿子都不会错过任何一场少儿组的演出。”相声剧《小茶馆》落幕后，马业仙有感于现代青少年跟茶文化疏离，认为有必要继续把相声和茶文化推广开来。于是，在2017年至2019年间，少儿组创立并制作《相声茶座》，让观众边喝茶边观赏相声。这个大胆的尝试，深获好评，场场爆满。

除了与著名中国相声大师合作过，少儿组在2007年也曾邀请著名中国指挥家杨鸿年教授传授合唱技巧，并于隔年连同九个本地合唱团和450名孩童在滨海艺术中心呈献“七彩歌声”音乐会。少儿组也走出国门，参加海外艺术节的跨文化项目。在2012年、2015年和2018年，少儿组就受邀参加了天津国际儿童文化与艺术节，把新加坡相声与儿童合唱带到曲艺的故乡天津。首演的群口相声《音符大战》及《群鼓相声》更是突破了相声的语

言局限，独具一格，其大胆创意在天津深获好评。2017年在唐嘉猷的领导下与中美青少年联手，呈献了舞台剧《木兰先生》，隔年荣获《海峡时报》“生活！戏剧奖”最佳青少年制作奖。

创立至今31年，少儿组不断推陈出新，制作出意义深远的作品，努力发展深具本地特色的相声表演艺术。它不仅为学童提供一个学习标准华语和接触儒家文化的平台和环境，也栽培了一群能说一口漂亮华语、品德兼优的青少年演员。少儿组于2022年，荣获第五届新加坡华族文化贡献奖的团体奖。“这个奖项对我们

来说也是精神上的奖项，让我们在未来的路上不感到孤单，脚步更加轻快。”

少儿组未来走向何方？马业仙透露，少儿组接下来会有一些策略上的变动，目前需要考虑新的年轻领导班子的的问题。“但无论这新的乐章如何奏起，我们将秉承有教无类的理念，不搞精英主义，让孩童在学习中得到乐趣，继续受到传统华族文化与价值观的熏陶。”

(作者为本刊特约记者)



2015年4月17至18日，《小茶馆》在戏剧中心剧院演出



2018年，少儿组受邀参加天津国际儿童文化与艺术节（最右为马业仙）



青少儿广播演艺组荣获第五届华族文化贡献奖团体奖。左起：华族文化贡献奖评委会主席郭振羽教授，华族文化中心主席蔡天宝，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部长唐振辉，青少儿广播演艺组总监马业仙，青少儿广播演艺组成员陈伟德及刘智彬

# 烟云无际 散淡成空

## 画家翁文光



文图·赵宏

**在**新加坡，有一位已经过世的画家翁文光（Ong Boon Kong, 1948-2022），生前他是那样的草根与平常，每日肩背一提布袋，行走于白沙浮（Bugis Street）、书城（Bras Basah Complex）和“小泰国”

（黄金坊 Golden Mile Complex）一带的街肆闹市之间，就像大家所熟悉的邻里街坊安哥，但他异于常人的敏锐目光，以及毫不顾忌、随时聚精会神地观察小动物的身影却让人诧异：他到底是谁？当人们称赞一位颇有成就的画家时，往

《老牛车水》纸上彩墨 52X68cm (2015)







《亲情》纸上水墨 59X16.5cm (2001)

往会说：你看，他是画松鼠的、是画葡萄的。或者说：他是画金鱼的、是画驴子的……而翁文光最为本地人熟知和称道的是——画虎，号称老虎画家。他大笔如椽，挥挥洒洒，于宣纸之上，干湿浓淡之间，百兽王顿时凛凛自现。

新加坡号称狮城，但黑色狮子似乎只存在于传说，在有影像记录的历史中，常出现的是老虎的身影。1831年9月8日，“英文《新加坡纪年报》（Singapore Chronicle）刊登了相信是本地第一则虎患的报道”<sup>[1]</sup>，传闻在1860年代，仅一年之内就有约300人被老虎咬死，狮城几乎就是“虎城”。新加坡国家美术馆展出过一幅创作于1865年的画作，描绘了1835年殖民地时期新加坡公共工程主管乔治·哥里门（George Coleman）与印度籍囚犯劳工在丛林探险时被马来虎袭击的情景。

在本地民间，普通百姓有农历二月初三拜虎爷的习俗，破解身边小人，免去口舌是非。不过，在家中悬挂老虎图画，却并不是很多人都敢做的，据说只有从事特殊行业的人，比如身涉黑道的才敢如此，普通人怕自己被老虎的凶恶煞气所冲，不到万不得已不挂老虎。当然，翁文光的画虎之名多流于街谈巷议，名声更大的似乎还另有其人，比如“每逢虎年，媒体会找上画家陈悟迟，他是本地唯一精于画虎，并以虎画闻名，人称‘猛虎画家’。从大小写意到工笔画，他的虎画风格融合西洋画和中国水墨，艺坛先辈刘抗大赞‘天南独步’。”<sup>[2]</sup>

翁文光大隐于市，鲜有引起过主流媒体的关注，他自己应该也是毫不在意这种名头上的差别待遇。他热爱绘画，以水彩、油画、水墨为主，善画各种动物，也钟情于新加坡的街市景象，常画旧时结霜桥一带街景、新加坡河、牛车水以及红头巾（三水婆）、邻里街坊等市井小民形象，

感情真挚，充满对生活的热爱。他的画没有文人画的忸怩，通俗浅白，不遮不掩。

翁文光1948年生于中国福建莆田，1958年随父南来新加坡。他父亲文化不高，是一位三轮车夫，家境贫寒，因穷困而过早形成的极度节俭几乎贯穿了翁文光的一生。据说，翁文光虽然因为画画日后境遇改变，也结交了不少各路朋友，但他却很少主动请人吃饭，哪怕只是喝一杯咖啡。与翁文光相熟多年的80多岁本地老画家张得顺曾经提醒他这不是待人待友之道，他因而在晚年时曾破例请得顺喝过一次咖啡。

翁文光初来时住惹兰勿剎（Jalan Besar）一带，读宏文小学时已显露出特别的绘画天分。据新加坡盆景与赏石协会会长、国际郑和学会秘书林朝华先生讲述，当年他姐姐与翁文光是同班同学，他本人也在宏文学校读书，曾亲眼目睹少年翁文光以蜡笔彩绘画过一幅猛虎擒鹿的画，惟妙惟肖，叹为神品，几十年过去仍萦绕心头，念念不忘。后来，翁文光入读华侨中学，有机会向新加坡先驱艺术家、水墨大师陈文希学习，期间也得到过大师陈宗瑞和陈子权等美术老师的指导。当年陈文希在华中有一间小型休息室兼画室，翁文光一下课就跑过去向陈文希求教，据说日后看到翁文光画作墨韵生动，出奇传神，陈文希也曾禁不住赞叹青出于蓝，略有艳羡之意。翁文光一生感念陈文希，一次在美伦镜框（画廊）老板郭嘉宝处目睹陈文希旧迹时，不禁当场泪洒，令众人错愕唏嘘。

1965年，翁文光偶遇画家黄明宗，拜为老师，学习素描和炭笔画。自1976年起，他毅然决定当个全职画家，从此浪迹新加坡画坛45年，作品散播至东南亚、法国、美国、英国、意大利、澳大利亚等地，偶尔见诸报章宣传。他的画虽然一直被人津津乐道，但终因其草根习性和

未受正规美术教育之故，至死也未获本地主流美术圈承认应有之地位。不过，翁文光去世后，笔者曾在藏家手中看过他的全套私印，其中有新加坡啸涛篆刻书画会创始人之一的陈建坡为他专治的私印，以及第一届新加坡文化奖得主黄明宗1974年正月为他所刻精致小印，印文与石质俱佳，可堪上品，似乎也从侧面暗示部分主流学院派画家对翁文光在一定程度上的另类欣赏。

翁文光年幼时在家乡因拾柴而被松针刺破左眼，视力受损，仅可凭一目略观天下，他自嘲是更为精准细致，聚“睛”（精）会神。虽视力有限，但多年来他一直勤学苦练，尤其注意观察，熟记于心，练就了一手的默写好功夫，作画时全凭记忆，一气呵成，尤擅现场演示，挥挥洒洒，活灵活现。因为一度经济拮据，翁文光很少花钱购买各种专业画册，一般是在书店或画廊看画册，甚至是连环画，都如饥似渴地阅读并牢记。不过，对一些难得一见的西方经典美术书籍，他也舍得下本钱收藏，因为他知道凭他的财力，几乎是无法有机会到国外去欣赏原作的。当然，最简单的就是在生活中直接观察。

翁文光喜爱画各种动物，为了更好地表现各种翎毛走兽，他一有空就去动物园，随身携带一架望远镜，一包饭和一瓶白开水，为的是省钱省时。至于街景，“欣赏他作品的陈子强（55岁，金融业）提议画结霜桥保存历史。翁文光这才提起他是在结霜桥长大的。陈子强说：‘现在想拍照留念也没办法了。刚巧和他（翁文光）提

起时，才知道他是在那里长大的。’翁文光自11岁起就住在结霜桥一所庙里，聊起当年他可是滔滔不绝。‘那是个龙蛇混杂的地方，有赌徒、有吸鸦片的、还有商人、外国人等，是个反映人生百态的地方。’他花了三四个月时间，回结霜桥一带观察、回想、抓角度，热闹街道仿佛又浮现在眼前。‘我画这幅画时，似乎找到老朋友一般，一起回味往事’，结霜桥逐渐走入历史，画家不惜艰难，靠着模糊的视力作画，借助放大镜描绘细节，为的是保留逐渐被遗忘的历史。”<sup>[3]</sup>翁文光在另一幅题为《家园》的水墨纸本立轴上曾题款：狮城处处有惊喜，足见他对家园的真爱。

纵观翁文光的绘画成就，大约可以得出以下两个结论。

第一，出色的岭南派画家。

翁文光生于福建，在新加坡接受美术熏陶。新加坡是文化汇聚之地，四通八达，各种艺术流派兼而有之，独占地利之优，令他收益颇多。因为喜爱动物题材，他特别看重中国画家刘奎龄的画作，常常细细临摹。南洋一带多有人追随岭南派。岭南以高剑父、高奇峰兄弟肇起，后有赵少昂等优秀画家继之，日后还有杨善深等人。翁文光吸收众法，以岭南派的没骨画法和画面整体渲染技巧布局，其所画树木参差辗转，曲折蜿蜒，藤蔓牵扯，颇具古意；翎毛走兽造型准确，纤毫毕现，情趣盎然；至于人物勾画，亦十分生动朴实。无论是用墨还是敷色，他的画都是灵活而有

《狮子》布面油画 219X96cm (2008)





《牛车水》水彩画 28X38cm (2010)



《驳船码头》水彩画 76X56cm (1977)

生命力，趣味真切。

翁文光写实和写生功底深厚，通常是采用湿画法，作画之前已成竹在胸，不起稿，面对画纸略一思忖，即先以淡墨或清水勾勒基本轮廓，趁水气未散，半干不干之际，分阶段使用不同色调的墨色和颜料，自然地形成明暗清晰的结构关系。由于墨汁会沿着潮湿的宣纸实现一定程度的自然扩张和延伸，此法巧妙地解决了动物皮毛上细微绒毛的处理问题，不必再费力收拾和拘泥于细节，位于美芝路的宣和文物画廊东主俞精忠即藏有不少此类精品。自1979年开始，翁文光希冀有所突破，尝试用硬笔与毛笔结合的方式，强化动物的皮毛质感，所画豹、虎、熊猫、松鼠，皆异于同辈中人，被视为首创。不过在笔者看来，此法虽然是其独创而又有新意，但似乎有用力过度之嫌——本来已经轻舟飞渡，此时却返回来一杆一杆地奋力撑船，大可不必矣。

翁文光曾以兼具西洋风格的水墨技法画过一批本地名人肖像，如以帮助穷人打官司出名的刑辩律师苏峇士（Subhas Anandan）、建国总理李光耀，以及一套14张国会议员肖像等，风格写实，呼之欲出。这些人物肖像创作似乎可以在某种意义上把翁文光的草根性提升至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范畴，但可惜他终究是一介以世俗之面示人的朴素画家，难以过多解读。

第二，小有成就的中国风油画家。

翁文光与本地传统水墨画家最大的不同是，他注重西洋画法的学习和训练，并付诸实践创作，在水彩、碳粉、油画等诸领域均有斩获。他并非科班出身，没有接受过正规西洋美术体系教

育，但他通过各种渠道和自学，基本掌握了西洋画的表现技巧。位于书城的Serenity Gallery画廊曾展出过翁文光1977年创作的一幅以驳船码头（Boat Quay）为主题的水彩画：画面结构繁复而条理清晰，光影与色调准确、优雅，是卓见功力的佳作。

尤其特别的是，在画动物题材的油画时，他以中国卷轴画的散点透视法进行布局和构图，在创建主要动物时借鉴西洋焦点透视法则和光影变化规律，按照解剖结构，以写实手法描绘，有一种东西结合、东方情调的异域风格，令人赏心悦目。

事实上，几乎是同一个历史时期，在中国大陆的特殊政治形态与国际环境影响下，中国的体制内专业画家一直在尝试西洋油画的民族化之路。翁文光勇气可嘉，也可以说是英雄所见略同，殊途同归。当然，西洋油画的中国风或中国化在更早的时代就已经初现端倪，在中国国内，徐悲鸿是著名的代表人物，他早年留学法国，1949年之后受委组建中国美术教育的最高学府——中央美术学院，又引进与欧洲传统绘画有所不同的现代苏联画派，并大力改革传统中国水墨画的教学课程，引起不少议论，至今仍有人质疑。

在海外，没有政治压力，完全在正规西洋美术体系下培养出来的印尼画家李曼峰，以及他在本地的艺术衣钵继承者朱庆光，也以历史的巧合，尝试了同样的做法——有中国画元素的西洋油画创作，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与市场认可。李曼峰从印尼出发，在荷兰海牙学习美术，是迄

今东南亚画家群体中少有的几个作品拍卖价格超过3000万元人民币的画家之一。他的画作有浓郁的中国水墨画情结，也有高超的西洋油画表现技巧，是极具东方特色的大师级绘画，在西方世界亦得到很高评价。这与欧洲殖民者初到东南亚时所欣赏的“美印地式”的、具有异国情调的绘画已经有了本质的不同，与印尼画家拉丹·萨利赫（Raden Saleh）创作《森林之火》时把西方的雄狮改为东方的老虎，把高耸的冷杉树变成热带的蕉林椰林的试探性的迎合态度已经截然不同。此时，本区域画家已经有文化的自信和追求。在这一点上，翁文光似乎以布衣草根的卑微之躯，承担了新加坡正统学院派画家应该承担的力量，是值得敬重的。

人不可貌相。翁文光虽有目疾，但却凭一管毛笔养家、买屋、娶妻、生子，孩子也读大学，人生圆满。他太太康海英是本地旅法画家康雄安、康松如的妹妹，早年入南洋美专学习，在淡彩硬笔画方面颇有成绩，可惜后来罹患心理疾病和其他病痛，闭门不出，亦停止作画，在翁文光去世不久后也驾鹤西归。翁文光早年每日行走于新加坡的街巷闹市之中，择机卖画换钱，如无人问津，则以画换饭，无论贵贱，不耻于人，因此很多小贩手中都有他的画作。

斯人已逝，笔者遥想当日翁文光作画时情景，依然历历在目，不禁叹之曰：

噫吁兮，  
大隐隐于市，  
可惜君未识。

#### 注释：

- [1] 侯佩瑜，《新加坡曾闹近百年虎患》，《红蚂蚁》网页，2021年9月23日。
- [2] 黄向京，《画家陈悟迟画虎迎虎年》，《联合早报》，2022年1月31日。
- [3] 佚名，《半盲画家为保存历史，借助放大镜重现结霜桥》，《联合晚报》，2015年1月27日。

（作者为本刊特约撰稿、水墨画家、独立策展人兼国家美术馆艺术论文翻译）

## Ong Boon Kong A Painter Like Hermit

The deceased painter Ong Boon Kong (1948-2021) was simple and low-key. He would carry a cloth bag with pen brushes and ink inside, on his shoulders and walk down Bugis Street, Bras Basah Complex, "Little Thailand" (Golden Mile Complex), and the bustling streets of Chinatown every day, looking like a familiar neighbour, but his sharp eyesight was spectacular and different from any other ordinary people beside him. He would have no scruples and concentrated on observing small animals such as sparrows and squirrels anytime and anywhere without caring about other things happening around them. People might be surprised and would ask: "Who is he?"

When people praise an accomplished painter, they may say: "Look, he paints squirrels, he paints grapes, or he paints goldfish, and that one paints donkeys....." However for Ong Boon Kong, the local people would call him a Tiger painter. Indeed, he was well-known and praised for painting tigers. With a big brush in hand, he would draw freely on the rice paper, or with oil on canvas sometimes, with complete confidence. Between dry and wet strokes and shades, the King of Animals would appear instantly.

Singapore is known as the Lion City, but the Black Lion seems to exist only in legends. Instead, in the real history recorded by images, tigers often appeared. On September 8, 1831, the English newspapers Singapore Chronicle published what is believed to be the first local report of tiger infestation. Rumour has it that in the 1860s, in just one year, there were about 300 people killed by tigers, and the Lion City was almost a Tiger City then. The National Gallery Singapore had once exhibited a painting created in 1865, depicting a scene of George Coleman, the director of public works in colonial Singapore, accompanied by Indian convict labourers who were attacked by a Malayan tiger during a jungle expedition in 1835. Among the local folks, ordinary people have the tradition of worshipping the Lord Tiger on the third day of the second lunar month to deceive the villains around them and avoid vicious comments from them.

It seems that Ong Boon Kong did not attract very much attention from the mainstream media during his lifetime but he actually did not care about it. He loves to paint and focuses on watercolours, oil paintings, and Chinese ink paintings the most. He was good at drawing various animals. He was also fond of the local street scenes. Often, he would paint the views of the stalls around the old Sungei Road, the Singapore River, Chinatown, and the Samsui women (Samsui Po, the red headscarf), his neighbours, or other ordinary people, with sincere and deep love for life.

我是

# 桃花过渡

Tao Hua Crossing the River

徐诗涵 饰【桃花甲】 薛澄淇 饰【渡伯甲】

(7岁)

(6岁)

陈子潼 饰【桃花乙】 陈睿渊 饰【渡伯乙】

(5岁)

(6岁)

陈宇萱 饰【桃花丙】

(6岁)

吕菲 饰【桃花丁】

(7岁)



## 新加坡潮剧

## 众人共绘新美景



文·蔡曙鹏

图·受访者提供

**潮**剧是文化底蕴深厚的古老剧种。吴国钦教授在他和林淳钧先生合著的50万字的《潮剧史》里，以明宣德六年（1431年）戏文写本《刘希必金钗记》为据，推定潮剧应产生于宣德（1426-1435年）年间。这样算来，潮剧有近600年历史，比500多年的婺剧、200多年的京剧、120多年的越剧及歌仔戏历史要久远。古代留下来的剧本又有多少呢？林淳钧与陈历明合著的《潮剧剧目汇考》，列出了今存而能考其由来，叙其演变的潮剧剧目多达2400个。潮剧有如此“殷实家底”，因而经得起岁月的考验，在远离发源地的许多地域，也能像沙漠里的百岁兰一样，以顽强的生命力，在干燥高温的恶劣环境里，绽放生命的精彩。

新加坡潮剧的传播、传承，可以说是由中国

南来的戏班、本地戏班、业余剧团和受过潮剧专业训练的新移民共同建构的一部戏曲历史。本地戏班，曾有万人空巷的热闹，也经历过戏棚下无人问津的冷清。但潮剧，毕竟是覆盖范围广、表演系统精致、具有代表性的艺术品种。因此，尽管生存与持续发展步履艰难，潮剧文化积淀着高尚精神追求与积累着强大艺术魅力，依然会吸引一定数量的现代都市人。传播与传承的重任，于今落在砥砺前行的潮人社群、社团和剧社的身上。

戏班作为传播潮剧的主力，哪个戏班最早到新加坡？已故老赛桃园班主黄茸尼、潮乐名家杨秀钦、詹秀音（《新加坡的潮剧》）、陈韩星（《潮剧百年史稿》）、陈星南（《新加坡潮剧百年回顾》）稍有不同看法。有史料确定的是，到了二十世纪初，老玉楼春、老赛宝丰、老赛

荣丰、老万梨春、中赛桃源、老三正顺等在新加坡都有可观的观众群。鼎盛时期，百人戏班阵容强大、服装布景美轮美奂、剧目包罗万象，演出二、三十集的连台本戏，观众热烈追捧。我的童年时代，就曾跟着祖母在戏园、寺庙看过大戏班如老赛桃源的精彩演绎。当年从晚上7点半到午夜，大锣大鼓的紧张场面或委婉优雅的弦诗，引人入胜的情节，观众无不痴如醉。

## 潮剧演出团队多种推广模式

回顾2023年的潮剧，社区潮剧团、业余潮剧团、戏班与专业潮剧团的演出比去年更为频繁，演出场地更为多样化：录制视频、线上学习、海外展演、进入校园推广等。此外，也有3个海外南来演出的剧团、中国名伶与新加坡剧团的合作演出。他们的到访，给喜爱潮剧的观众带来观赏优质演出的机会。

今年21岁的如切潮剧团，老中青少四代团员，积极在社区和寺庙展演。先后在牛车水民众俱乐部、勿洛民众联络所、如切民众俱乐部和凤山宫演出。如切潮剧团团长洪志庆说：“我们今年演出的剧目包括两出全本大戏《火烧临江楼》和《四郎探母》。折子戏则有《三哭殿》《龙女情》《洗马桥》《龙井渡头》《汉文皇后》的选段。观众喜爱的《梅亭雪》和小戏《串戏订亲》。其中最特别的是受凤山宫萧建南邀请，参加该庙庆祝九皇大帝圣诞的庙会演出。庙会从9月10日至24日举办，受邀戏班有新怡梨兴、新新荣和、老赛桃园和我们。在香火缭绕的氛围里，更深切体会人们对未来风调雨顺、平安健康的美好

期许。庙会承载了华族传统民俗文化，世代延续，在时间的长河中不断发展，内涵着民间的信仰追求。对业余潮剧演员来说，这是一个很宝贵的艺术与社会经验。这种民俗活动，让团员增加了对戏曲和民间信仰之间关系的理解。”如切潮剧团凝聚力强，以演出传统剧目为主，成为鲜明特点。

文化的传承和传播是文明延续的重要基础。我想，带着历史印痕的潮剧文化火种，总会有后来人。果然，在2021年2月15日，林楚强创办的华族戏曲工作室，破土而出，令人惊喜。工作室努力的目标明确，锁定为凝聚潮剧爱好群体，目标对象可为戏班伶人，或有、无舞台经验的潮剧票友。林楚强认为：“我国早在2017年就开始进入到“老龄化”阶段，但新加坡的人均预期寿命平均为83-85岁。工作室为这个群体提供活动空间，纪录他们的表演，为新加坡潮剧史留下影像资料。”若能进一步以文字讲述剧目特色、演员从艺历程等资料，更能提升档案价值。

工作室在阿里哇艺术中心租赁的空间虽然不大，善于变通的林楚强，将它变身成多功能摄影棚。两年多来，录制了29集《潮曲云唱》，成为乐龄潮剧人的乐园。2023年录制的《蔡瑞芳潮剧艺术专辑》和《陈巧鸾潮剧艺术之生旦净丑》，前者回顾了蔡瑞芳自走入潮剧园地四十多年来演剧的精彩片段，后者展现了新荣和兴班班主陈巧鸾的表演功力。工作室的脸书也发布其他戏曲剧种的演出信息，并时常无偿借出场地、服装、头盔等戏曲用品给需要的团体。

面对筹集资金不易，演出成本大幅度增加，成立于1931年的陶融儒乐社，决定今后两年推

演奏潮乐、汉乐的陶融儒乐社乐队



出公演项目。不过，去年共推出了三个演出，内容形式各异。首场在麦波申民众俱乐部，推出《陈三五娘》之《暮春三月》《益春留伞》和喜剧色彩浓厚的《泼水成亲》及潮曲两首。第二个演出是主办中国普宁潮剧团在黄金剧院的商演，四个剧目是《杨门女将》《三婿贺寿》《状元平冤》和新编剧目《如是传》。林舜香社长说：“普宁潮剧团的访问演出，提供了我们了解当下中国潮剧发展现状的一个例子。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陶融的第三场演出是为庆祝成立92周年而举办的潮剧潮曲晚会《重现苏六娘·潮乐展风采》，精选了《苏六娘》四场戏，邀请该社艺术顾问、中国国家一级演员方展荣和两位青年演出客串。

拥有111年历史的余娱儒乐社，2023年在三个场地呈献了四个演出。首场演出是参加戏曲学院主办的《2023年戏曲大舞台》。作为协办单位，余娱呈献了《京城会》《武松杀嫂》《穆桂英招亲》和《双玉婵》选段，以及《火烧临江楼》的名段《端阳一去已三朝》。余娱的第二、三、四场是非盈利机构天猛公基金会特邀的演出。8月中旬，庆祝中元节的两场在基金会总部场地的演出。第四场是为祝贺天猛公艺术基金会与潮州八邑会馆在10月底签署谅解备忘录的特别演出。演了《京城会》《苏六娘》之《杨子良讨亲》和《红鬃烈马》之《堂前敞心扉》，总统夫人珍一藤木是特别嘉宾、签署仪式的见证人。潮州八邑会馆会长拿督斯里吴木兴博士说：“我们将充分利用天猛公的潮汕文化和创意，以及八邑会馆在国内外建立的广泛人脉关系，强强联手，更好地传播

具有本地特色的潮州文化和艺术。”天猛公创始人陈克湛说：“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后，将开展以潮州传统为主的活动，加入跨文化与领域的元素，以南洋华裔视角来推广潮州文化。”

余娱儒乐社的2023年度大戏《春江月》，移植自包朝赞1983年的越剧剧本。1988年余娱儒乐社曾在维多利亚剧院演出三晚，座无虚席。这次时隔35年重演两晚。来自福建省郑陈森导演说：“疫情改变了大家的生活形态，而这批从年轻时就在余娱儒乐社学戏、演戏的演员，对他们热爱的艺术数十年如一日，守护潮剧家园，令我肃然起敬。他们有一心要演好戏的进取心和各自发挥所长的凝聚力，才能保持不断进步的业绩。祝福余娱继续稳步前行。”

## 南华潮剧社转型的成果与走向

去年欢庆成立一个甲子的南华潮剧社，是新加坡团队转型成功的杰出范例。在卓林茂BBM(L)的领导下，成立于1963年的业余潮剧社团，成功转型。从2017年开始，成为国家艺术理事会主要拨款的收益团体之一，2020年至2023年共获得54万元。转型后的南华潮剧社是包括了推动潮剧、潮乐和潮州文化研究三个内容的艺术大团。有鉴于1999年我在南洋艺术学院表演艺术学校主持工作时，与上海戏剧学院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优化了课程内容的经验。去年3月，我向卓林茂社长建议到上海戏剧学院访问，探讨如何借助其优秀师资及教研条件，引进教育模式、授课方式、课程体系、学术研究等，提升南华潮剧社培养人才优势。卓社长



洪志庆（右）和陈韵智（左）合演如切潮剧团的《四郎探母》



华族戏曲工作室的《包公会李后》（右林楚强、中陈巧鸾）



余娱儒乐社《柳明月》（左林婵卿、中林秀凤、右陈爱伦）



泰国赛荣丰潮剧团在荳菜芭城隍庙演出，观众踊跃

认可这个建议，很快组团到上戏。张伟令副院长等领导热情接待，经讨论后，双方本着精诚合作、平等互利的原则，很快签订一系列合作备忘录和举行授牌仪式，南华成了上戏旗下戏曲学院在中国以外的首个“中华戏曲文化传承中心”。此外，上戏的继续教育学院则在南华设立“社会艺术水平考级新加坡中心”和“非学历培训项目新加坡教学基地”。

卓社长说：“面对科技迅速发展，未来社会充满未知数，我们必须坚守信念，面对各种时代的挑战。我们要培训优秀演员、编创团队、革新表演方式，吸引更多年轻人和支持者；在工作中拥抱数字化、弘扬潮剧潮曲，并积极寻找有能力的人才来执行我们的传承计划。”2023年，南华剧团的新举措、外展计划、新作品制作和潮剧经典重演等工作都取得了进展。南华还举办了与粤语、闽南语、黄梅戏合作呈献多剧种演出，吸引跨方言群观众。除了《万紫千红》，南华潮团近年推出的一系列音乐会为舞台带来了引人注目的新气象：举办了八场潮乐实体与视频音乐会。辛勤的拼搏得到认可，荣获了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颁发的2023年新加坡华族文化贡献奖。

南华潮剧社的成果凸显了优质艺术管理、培养少儿表演人才、组建乐队、开展研究的重要性。其所计划开发的南华应用程序（APP）和二维码，必将对潮州文化、潮剧潮曲的传承与传播，发挥积极的作用。

### 来访剧团异彩纷呈的启示

戏曲演出拓展了民俗活动的内容，民俗活动也成为戏曲生成与发展的沃土。新加坡潮州总会

与义安文化中心联合主办的“潮州文化美食节2023”邀请广东潮剧院二团助兴，让观众在享受潮州美食菜脯粿条、糕烧芋头、鼠壳粿、紫淮山粿、蚝烙、鸭母捻、糖葱薄饼等之余，观看名家张怡凰、林初发、王锐光、陈立君、蔡财旺、黄丹娜等演出。“潮州文化美食节2023”在欢乐节庆气氛中共享并传承方言、乡俗、俚语，欣赏潮剧潮曲的优美演绎。

荳菜芭城隍庙去年的135场庙会演出，其中有24天演潮剧。泰国曼谷名团赛荣丰潮剧团的18场演出，有三方面的意义。一是让观众亲睹泰国戏班的草根性和亲和力。厦门大学张长虹在《移民族群艺术及其身份：泰国潮剧研究》的论述，可以从观戏经验中得到印证。二是感悟与思索潮剧在异文化空间以坚韧生命力的传承与创造的智慧。三是认识与学习团长奉献精神 and 演员演奏员整个团队的拼搏精神。团里一个幼年被卖到戏班的泰国人Tatchai Obtong成为潮剧出色花脸，更是一则励志的好故事。

综观潮剧2023年的发展态势，专业剧团不断精进、业余剧团努力不懈，各自发射能量，织绚丽美景。潮剧的起飞，要靠文学的力量、学术的营养、评论的导航、财力的支持、院校的培养、媒体的助力，愿能给力的各方给力。文化路远，同路者众，相互支持路更宽，潮剧在新加坡，大有可为！

题图说明：

南华潮剧社《我是传承人》之《桃花过渡》

（作者为新加坡戏曲学院创院院长、民族音乐学博士）



# Teochew Opera in Singapore: Present and Prospects

Teochew opera in Singapore is a musical/theatrical tradition brought in by visiting groups from almost 200 years ago. The art form has been sustained by their local successors, Teochew speaking community, amateur groups, and enriched by new immigrants who were professionally trained from China. As a regional opera form in South-Eastern China that has a long history of over 600 years, Teochew opera is a sophisticated art form with rich repertoire and exquisite performing convention. Although it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s facing challenges in a highly westernised cosmopolitan city, it is nevertheless attracting a good number of people who treasure its artistry and cultural value. The important task of heritage and promotion now falls on the Teochew speaking communities, temples, professional groups and the passionate amateur groups.

Evolved as a genre with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mid-Ming Dynasty, Teochew opera has a repertoire that can be traced to the classics of the Nan Xi (Southern drama), a regional opera that was popular during the 1230s and 1460s in Southern China. Teochew opera was brought to Singapore as part of the religious festivals and performed at temples or open space in mid-19th century. According to the survey conducted in 1881, 26.1 % of the total 84,484 Chinese immigrants were Teochew. The first group that came to Singapore was Lao Sai Yong Feng, a big group that had over 100 members, according to Chen Han Xing, a well-known researcher of Teochew opera in China.

In the 1950s, some of the big groups with such scale and artistry that attracted a large number of followers still existed. I had followed my grandmother and neighbours to attend performances of those groups staged at amusement parks, temples, and open spaces called Jiexi (street theatre) and the Chui Huay Lim Club. However, by the 1970s, due to rapid urbanisation and industrialisation in Singapore, Teochew opera groups, like other Chinese traditional theatre groups, faced a great challenge of retaining their popularity. Changes in lifestyles and the banning of dialects on radio and television in the 1970s meant changes in people's choices of entertainment. The decline of audiences and the subsequent disappearance of opera groups have been discussed by local and overseas scholars and are often reported in the media.

However, since Teochew opera is a legacy of intangible attributes of the Teochew speaking community inherited from past generations, practised in present, and helps individuals and communities understand their own cultures, history, and traditions, it has never been completely forgotten by the Teochew descendants. The art form provides a sense of belonging and demonstrates values of the community and continuity with the past. Thus, amateur Teochew opera groups have a sense of mission and the passion to practise and promote the exquisite art form. It is for this reason that the 111-year-old Er Woo Amateur Musical & Dramatic Association and the 92-year-old Thau Yong Amateur Musical Association continue to carry the torch of Teochew opera. Many groups affiliated to community centres under the umbrella of the People's Association are promoting Teochew opera at the grassroots level too. Among these groups, the Joo Chiat Community Centre Teochew opera group of 21 years is the most active, each presenting as many as six public performances at the Peoples' Theatre, community centres, and temple. A new group called the Chinese Opera Studio, formed in 2022, actively documents veteran actors and actresses on video and shares them on its Facebook account.

The most exceptional development of Teochew opera in Singapore is the transformation of an amateur group called the Nam Hwa Amateur Music and Drama Association. Set up in 1963, it grew into a professional group that offers vocal, performing, and makeup classes, a variety of workshops on Teochew, as well as new production and classics for public performances actively.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President Toh Lim Mok, BBM(L), the Nam Hwa Opera set up a Yeo Khee Lim Teochew Culture Research Centre and Nam Hwa Teochew Music Ensemble. It now partners the Shanghai Drama Academy and the Guangdong Chao Ju Yuan to develop syllabus for Chinese opera. They also look at teaching secondment, enrichment classes for child performers and create new productions. President Toh said, "Looking ahead, we shall embrace digitalisation in our work to promote heritage and proactively search for capable talents to execute our succession plans." In 2023, Nam Hwa Opera's new initiatives, outreach programmes, new productions, and the restaging of Teochew opera classics successfully broadened its audience base. It also partnered Cantonese, Hokkien, and Huangmei opera in "One Opera Singapore" to attract audiences across genres. Coached by Nam Hwa's teachers, a well-established quarterly "Nam Hwa Blazes" has been providing young and old performers opportunities to showcase and improve their skills. A noticeable new contribution to the scene is the concert series presented by the Nam Hwa Teochew Music Ensemble in recent years. Eight concerts and online videos of Teochew music were played by young musicians. They are a source of education and cultural pride that attracts new audiences. Nam Hwa Opera's efforts were awarded the Singapore Chinese Cultural Contribution Award (SCCCA) presented by the Singapore Chinese Cultural Centre in 2023 for its extraordinary contributions to the promotion, enrichment,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ingapore Teochew opera, music, and culture.

Review of the Teochew opera scene indicates that groups of varied scale are working to the best of their abilities to revitalise this heritage. It is perhaps time to consider new ways of mutual support and collaborations for the common goal of making Teochew opera a dynamic component of our multicultural society.



# 塑造新加坡华族文化

文·刘太格

## 前言

新加坡是个多元民族的小国，曾经是英国殖民地，所以我们当代的华族文化难免跟中国大陆的文化有所差异，而同时在全球化的世界趋势下，今天的新加坡华族文化何去何从也是令人关心的事。一方面，新加坡华人得面对现实，接受我们的华族文化不可能和中國大陸完全相同；另一方面，华族文化是我们祖先父辈传授给我们的生命根脉，能让我们在世界人类文化群中有一个立足点。这种传承，不仅能对我们的子孙后代有一个好交代，还能让我们跟在中国的亲友们保持深厚的感情。有鉴于此，我很欣赏并感谢《源》杂志把这当作一个专题，请各界人士撰文提供意见。

我不是相关领域的学者，只是一个专业人士，做城市规划与建筑设计的工作。在工作范畴内，我不断感受到：了解华族文化，与工作有紧密关系。这篇文章，我就以一个专业人士的感受，谈谈新加坡华族文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 过去： 我与华族文化之缘

我和华族文化的缘分，从小就开始。这是85年前的事，现在的年轻人根本无法想象当年与现今情况的巨大差别。首先，我的父母出生在中国，少年时代受到中国文化艺术的熏陶，然后移民到马来西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再移居到新加坡。所以，我的家庭教育是相当正宗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后来，我上小学、中学时，刚好是在中国解放前夕，许多中国的文人和大学教授移居来新马。因此，当时的老师们，有许多都是大学教授。他们除了教导我们课本，还能讲述和课本相关的中国社会境况和历史故事。同时，我父母的会客厅经常有文人墨客来聊天，我能有幸旁听，所以对中国的历史、人物、成语、诗词、书画、艺术都有相当的认识。

这种优良的家庭教育和中小学教育，现在回顾起来，的确深深地影响了我这一辈子的为人处

事、价值观与工作态度。历史故事、英雄人物给我带来远大的人生目标、使命感和爱国、爱民族、珍惜传统文化的情怀。处身为新加坡和世界公民，将中国话讲述书写得好，能充分表达心意，也大大地提升了我的思考能力。我与毕业69年的高中同班同学还不断在联系，不仅聚餐、叙旧，也发表我们对现今时事的看法和意见。这种情谊，也跟我们的教育背景有密切关系。

后来我到悉尼新南威尔士读大学时，我告诉自己：即使是个华校生，但为了要在当时的世界环境中提升尊严，必须把英语讲写得跟澳洲人一样好，把我的学习成绩跟他们看齐。有了这种动力，我的确得到全班最佳的学分和一等荣誉学位。与此同时，为了能对中国建筑有所认识，我的毕业论文主题是“中国传统建筑的特色”。通过阅读许多中国出版的书籍，及家父老友傅雷先生的点拨，这篇论文对我今生的建筑设计理念，带来很大的影响。比如说，从城市景观设计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四合院，即使是在北京的冬天，走进院子里也能享受美好的阳光，不受寒冷北风的影响，这是一种人性化、生态化、科学化的设计理念。有鉴于此，中国许多古城虽有中轴线的理念，但没有西方的高深度的透视感觉，而是有许多院落叠加的层次感、神秘感。这也影响了我后来在中国做城市景观设计和建筑设计的处理方式。

## **现在： 中华文化的深远影响与文化共存**

本着深爱中国文化多方面的特色和优点，也影响我后来在1969-1992年为新加坡政府做规划工作的手法。我不允许自己追求欧式建筑，而要求自己了解热带气候的建筑需求和特色，同时对多元民族的城市环境文化的尊重和考量。比如说，我们不仅仅保留华人的牛车水街区和老建筑区，也保留马来人的甘榜格南、印度人的小印度以及欧美人的欧洲城。值得强调的是，加东区的娘惹老建筑，我觉得十分精彩。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娘惹文化应该是我们

这两个邻国在全球最具独特性的文化。这是一种早期华人和马来人结合的艺术结晶，包括服装、首饰、餐饮、建筑设计，都有它们独特的审美观，富有精致、细腻、粉彩的情调。我现在想要提问的是：身处在这这么丰富的、各种非常有特色的多元传统民族文化的环境中，我们应该如何以新加坡公民的立场去看待问题？首先，如何把这些多元文化融入我们的生活和思维方式中？我们需要在这种大环境中来叩问何为新加坡华族文化。再者，华族文化和其他文化要如何融合？是否需要融合？

新加坡很明显是国家小、文化多元。虽然说许多大国有少数民族，但经过千百年的共存，他们都有一定的共同点。新加坡历史短暂，华、巫、印、欧四种文化，都在世界上有崇高的地位，不宜勉强融合。但娘惹文化却证明，在相互尊重的前提下，其融合后的文化，的确既有特点，也很有令人赏心悦目的文化景观。反过来说，如果新加坡人民诚心寻觅各民族的文化及其历史渊源，与各民族的宗祖国家保持紧密的关系，不但能提升我们新加坡人文化艺术发展的丰富性和多元性，同时也能带来许多外交、经济、科技、文化的优势。其实，新加坡华人是需要重视我们的传统文化，知道我们在世界上的文化价值，以确保和确立我们的自信心与自尊心。同时，我们华人也必须认真维护和加深认知其他民族的传统文化。这不但能保证各民族之间的和谐相处，同时也能提升新加坡人民的价值观、思维方式及文化的多元性、丰富性和明确性。我认为新加坡华人有必要，也有可能在这美好的基础上来研讨何为新加坡华族文化？有鉴于此，我在1996-2005年任新加坡国家艺术理事会主席时，积极支持各族文化的挖掘和发展。每当举办新加坡艺术节时，要求同事们除了欢迎世界各地的演出，也必须提供适当数量的华、巫、印文化活动，与世人共享并展示新加坡多元文化的特点和风采。

## **提升多元文化的认知水平有利于融合**

要探讨何为新加坡华族文化？还有一个考量

因素。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华人大多数是从福建和广东移民来的，所以我们的价值观、风俗习惯跟中原文化仍略有差异。从艺术的角度来看，二战前后许多资深的大陆学者和艺术家都从中国移居南洋，就产生了所谓的南洋画派，给新加坡艺术创作带来既有中国特色而又独树一帜的标记。这段历史和其产生的现象提升了我的信心，有可能在新加坡文化的大环境下，能够融合新加坡国内华族及其他民族的文化。

回过头看，新加坡华人也可按年代分成数种文化类别。从语言的角度来看，老一辈的华人在英殖民时代，不是读英校，就是读华校。英校学生不必学华文，华校学生都略兼学英语。建国后的国民学双语，但水平有必要提升。还有中国来的移民，当然对中国文化与语言深有造诣，而同时他们也努力学习英语。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塑造新加坡华族文化？该课题就颇具挑战。

首先，从人民尊严和经济效益的角度来考量。我希望新加坡今后的华人，有必要把中英文的对话与写作能力提升到世界水平，而同时对中国文化、历史、英雄人物、成语都有相当深度的认识。这对我们的人生观及事业的发展会带来巨大的好处。因为提高语言水平有助于深度的思考能力。认识历史英雄人物可以带来灵感与动力；历史传承下来的人生观会带来高水平的为人准则、个人意志和成就。比如：成语不但有助于语言表达，更时时刻刻提供诸多为人处世的原则、志愿和价值观，有助于行为、思维、工作和人生态度的塑造。

再者，我从生活和专业人士的角度来讨论。新加坡华族文化的确应该要以中华文化为主轴，而同时融入新加坡本地的有特色的文化。要做好这件事，我担心两个问题：其一，我们华人的语言水平，以及对中华文化历史的认知不够；其二，新加坡华人的价值观，其倾向还是以西方文化为主。虽然我们已经独立自主了59年，我经常自问，新加坡要到什么时候才能真正走出殖民时代的思维和价值观念？我的直觉加上个人体会，如果新加坡政府能刻意提升中、巫、印、欧

民族的传统语言和文化水平，我们不但会成为一个文化十分踏实和丰富的国家，也有望真正走出殖民时代的思维和价值观念。所以，何为新加坡华族文化？即使这课题很复杂，还是更有必要全力策划和积极推进。

## 跨文化的熏陶能让人高瞻远瞩

值得一提的是，按目前的趋势来看，中国肯定会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世界经济大国。对中国语言、历史、文化的了解大大有助于新加坡人士在业务上的沟通和相互理解。这肯定是有经济价值的，也是我个人的经验。我的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项目大部分是在中国。一方面是因为中国政府有力度、大幅度推进城市发展及应对农民入城的需求。另一方面，我能对中国各城市的风俗、历史背景，很快地抓到要点；对各地方政府所期望的城市发展愿景，也能相当清晰地理解。所以沟通起来，就比较能顺畅地达到共识。这种优势我认为应该对其它行业也有相同的作用。

今年正值李光耀先生的百年诞辰，我很有幸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政府工作时能跟他多次交谈。虽然说他家庭语文背景属英语，但通过媒体的报导，我得知他当总理后不但精益求精地努力学习华文，也经常提问关于中华文化的问题、认真学习和体会儒家思想。这些因素再加上他个人英语水平非常高，思维能力超强，所以他在任时推出了许多很合理但与西方价值观不同的治国政策。比如说，当时先进国家的专家都反对高层公共住宅，而他为了要全方位实施新加坡居者有其屋的政策，推动高层公共住宅的政策；也推动鼓励人民购买而非仅租用公共住宅；还敲定各民族在公共住宅各单元的合理人口比例。李总理的政策是高瞻远瞩的，执行手法也是务实和及时的。这些措施都不被当时先进国家认可，但他本着“明晰=勇气”这一原则，推动这些政策，数十年后成为世界人士关注和学习的课题。

在李光耀跨时代眼界的引导下，我有幸在政府部门，为规划工作了二十三年，我个人也觉得

中华语言文化、历史，加上欧美的现代技术对我的工作有着巨大影响。即使刚开始的新加坡非常落后，我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要求既要节俭，又要保持世界水平。数十年后许多人问我如何做好规划？我提出三要诀：人文家的心，为人和地服务；科学家的脑，设计生活机器；艺术家的眼，与土地谈恋爱。能把很繁杂的规划问题用三句话总结，其背后还得归功于中华文化的熏陶和明晰思考及语言表达的能力。在工作过程中，我仍然高度尊重新加坡多元民族的生活要求和他们建筑文化的体现。

## 未来： 尊重民族特性、融汇灿烂文化

最近三十年来，自从我离开政府岗位之后，在世界各地70来个城市做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每到一个地方，我都要求自己必须尊重当地的山水、古迹和民族建筑文化的基因，为各个城市或建筑方案体现各地的特色，而同时照顾到各地的人民与土地的可持续功能需求。

我认为好的城市规划是城市文明的象征，做好规划与城市发展也会为各个城市的人民赢取世界各地人民对他们的敬仰。这些思维的背后，我认为都是跟小时候吸取中华文化及各种其他文化因素分不开的。

总而言之，今天新加坡华人即使身处全球化经济发展与高科技时代，仍有必要深入了解中华文化和学好中华语言。生活在新加坡，也有必要学好英语和深入了解巫、印、欧的文化。有了这些能力，不但能提升每个人的思考能力和自信心，也较有可能走出殖民时代的思维、在提升我们的经济与科技成就的同时融汇出灿烂的新加坡华族文化。

未来，我国应该本着全方位的教育政策，让科技与多元文化并重。国家虽小，新加坡应该能立足于世界大国群中，并彰显出自己的文化特色。这种成就的达成，应该是所有爱国的新加坡国民所期望的。

## 作者简介

刘太格博士为墨睿设计事务所的创始人兼董事长，应邀在全球50多个城市提供城市规划服务，对新加坡住房和城市景观贡献巨大，被喻为“新加坡规划之父”。

他曾担任新加坡建屋发展局首席建筑师和执行官、宜居城市中心（CLC）咨询委员会创会主席、新加坡公共事务对外合作局董事会成员、国家艺术理事会主席、新加坡国立大学建筑学院咨询委员会主席、新加坡国立大学及南洋理工大学客座教授。

刘太格博士曾荣获澳大利亚颁发的格雷厄姆·米契尔奖（2018年）、东盟建筑杰出贡献成就奖（1993年）、新加坡国庆日奖章、卓越服务勋章、新加坡设计委员会、金禧大奖以及新加坡规划师学会的杰出终身成就奖。





# 兔年 狮城《小白兔》

## 在南宁骄傲登场



文图·亚真

2023年末，新加坡艺术剧场（以下简称“艺术剧场”）再次受邀，参与了首届中国——东盟（南宁）文化月暨第十届中国——东盟（南宁）戏剧周。剧场成员从12月6日到12月10日在中国广西南宁开展了为期一周的学习观摩、表演交流体验。

艺术剧场首席执行官许崇正在受访中回顾：“2014年10月，艺术剧场受邀参加第一届中国——东盟（南宁）戏剧周，呈献了经典儿童剧《王子与乞丐》，受到热烈欢迎。演出当日，场外一票难求，场内座无虚席。在历时一个半小时的演出过程中，大小观众们深深地被剧中人物命运所打动，演出结束后久久不愿离去，争相与各自喜爱的剧中人物拥抱并照相留念，场面温馨感人。广西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李慧这样评论：‘新加坡艺术剧场展演的儿童剧《王

子与乞丐》情节曲折、悬念叠生；演员们深情的表演，不仅博得满堂掌声，也为中国——新加坡之间的文化艺术交流写下华丽篇章。’这让我们对‘走出去请进来’计划增强了信心，让我们有机会每年借用这平台与各国艺术工作者交流、学习，也让更多国外艺术工作者近距离了解新加坡文化和华语儿童剧。”

### 探讨本土儿童戏剧的发展方向

此行第一站，由艺术剧场首席执行官许崇正和主席谭瑞荣参与“中国——东盟（南宁）戏剧周十周年交流座谈会”。该座谈会于2023年12月6日在南宁市金紫荆国际大酒店24楼会议室举行。共有23个国际、国内合作交流机制成员单位参加，主持人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毛小雨教授。艺术剧场



艺术剧场主席谭瑞荣以《新华文化语境下的新华戏剧》为主题，在研讨会上阐述了新加坡艺术剧场的理念和方向



《小娘惹》舞者在闭幕式结束后与剧组全体成员合影

主席谭瑞荣以《新华文化语境下的新华戏剧》为主题，在研讨会上解释了新加坡艺术剧场的理念和方向：“由于华语观众少，新加坡艺术剧场为了培养未来观众和弘扬华族文化，采取以‘标准华语’、‘树立优良价值观’为主导的发展方向，没有急于求成地追求新加坡本土元素。”

笔者也顺藤摸瓜，就此行为什么带《骄傲的小白兔》这出无本土元素的儿童剧到南宁，采访了艺术总监艾佳琪：“《骄傲的小白兔》改编自俄罗斯的经典童话故事，这个故事在1954年也曾由中国导演孙维世女士（周恩来总理的养女）改编成电影上映。它虽然没有新加坡的本土特点，但胜在教育意义明确，故事紧张有趣，人物造型可爱，与观众的互动性也很强。这个戏在新加坡演出非常受欢迎，得到了很好的评价。所以几经思考，最后还是决定带这个戏来参加这次的东盟戏剧周。”

2023年时值兔年，在岁末做如此安排，笔者其实感觉应景又点题。作为初入团队的一

员，我有幸见证了整个台前幕后的制作与剧场工作者们的向心力！大家一呼百应，成员们如同训练有素的小蚂蚁般：协作、行动、迅速解决问题。仅仅用了早晨几小时就完成了舞台道具布景的搭建。默默地看着这一切，心中赞叹：这是一个友爱、团结、高效的好组织！

## 艺术剧场在南宁的骄傲时刻

正式演出在12月9日下午3点，演出地点是广西文化艺术中心的黑箱剧场。现场来了好多家长 and 小朋友，全场爆满！一个多小时的表演，台上的演员与台下的小观众互动不断：不论是狡猾狐狸的问话，还是骄傲兔哥哥的提问，现场小观众都能积极参与，开动脑筋，帮助解决角色所碰到的各种问题。众所周知，舞台上和观众席的联系越紧密，互动越良好，越能体现演员精湛的表演技巧与观众全情投入的双向奔赴。这样的“寓教于乐”、这么“优美标准的台词”、这种“正能量的价值取向”，无疑是深得小观众及家长喜爱的！

12月10日晚上8点，第十届中国——东盟（南宁）戏剧周闭幕式于广西民族剧院隆重举行。艺术剧场呈现了独具新加坡特色的《小娘惹》舞蹈作品。名字虽娇小柔和，但舞蹈内涵却柔中带刚：该作品融合了传统马来舞、印度舞、华族武术，表现了新加坡的种族和谐和独特的娘惹风情。舞蹈背景图案是娘惹服装卡峇雅裙子的布料图案，受马来族影响，具有峇迪蜡染传统艺术风格。

说起《小娘惹》，由于笔者是主创人员，因此有些感触。该舞蹈排练时间非常紧，舞者里有毫无经验的舞蹈小白、有会武术而不谙舞蹈的戏剧人、也有资深舞蹈员。这个程度参差不齐的阵容，其创作和排练的难度可想而知！好在艺术剧场的每位成员态度谦和且认真专注，使得排练越来越顺利，并渐入佳境！经过二排、三排，舞蹈逐渐立体、丰满，呈现出“活的雕塑，动的绘画”的一些舞蹈语汇和意象。

艺术剧场凭着儿童剧《骄傲的小白兔》、舞蹈《小娘惹》与中国及东盟各国的艺术团体同台献艺、切磋交流，收获了鲜花、掌声和友

谊！并且荣获了组委会颁发的“朱槿花·优秀剧目”荣誉证书。演员顾芝绮和时子惠双双荣获“朱槿花·优秀演员”荣誉证书。新加坡艺术剧场在中国南宁·东盟（南宁）戏剧周为剧场添了誉，为国家争了光！《小白兔》在南宁

的确骄傲了一把！

面对着值得骄傲的荣誉，笔者采访了获奖演员兼舞者顾芝绮，她谦逊地说：“这是我第三次跟随新加坡艺术剧场来中国南宁参与中国（东盟）南宁戏剧周优秀剧目的展演。在此次展演的剧目《骄傲的小白兔》中，我饰演了那只活泼且骄傲的小白兔。儿童剧中的角色往往需要用到细腻的情感配合夸张外放的表演方式来演绎，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非常荣幸在此荣获‘朱槿花·优秀演员’称号，感谢观众们的认可！我不会像‘小白兔’那样骄傲，会再接再厉塑造更多形象生动鲜明的角色！”



艺术剧场总裁许崇正（右六）代表艺术剧场上台领取“朱槿花·优秀剧目”荣誉证书

### 向艺海无涯苦作舟的人致敬

戏剧周期间，团员们还于12月6日晚上8点受邀观赏了《中外优秀折子戏专场》，演出地点在南宁人民大会堂。各国艺术团体的文艺节目百花齐放，为东盟艺术周拉开了响亮的序幕。其间，缅甸舞蹈热情欢畅、柬埔寨舞蹈婀娜温婉、越南的舞蹈清新秀丽……但真正让笔者印象深刻的还数中国几出精彩的折子戏。有豫剧、晋剧、梨园戏、传统折子戏，这让我们大开眼界，现场的喝彩声连连。两个多小时的精彩表演让人忘记了旅途的疲劳。最后，由太原市晋剧艺术研究院，名家武凌云表演的晋剧折子戏《千秋关圣》，把整场晚会推向了高潮！



顾芝绮代表艺术剧场获奖者（右五）上台领取“朱槿花·优秀演员”荣誉证书

那一声声的叫“好！”是真正献给那些用生命在敬畏、在坚守、在拓展并在无涯艺海苦作舟的艺匠们，向他们致敬的！

作为艺术剧场总裁，许崇正这样总结：“这么多年，不论多么艰难，我都要继续坚守，因为新加坡需要这样的华语儿童剧、幼儿需要得到优秀传统文化的培育。我会继续做，就是因为敬畏和热爱我们的传统文化，所以需要坚持、拓展和付出！”

题图说明：

《骄傲的小白兔》剧组成员在后台留影（便装者为艺术剧场艺术总监艾佳琪）

（作者为本地专业舞蹈员、写作爱好者）



时子惠（右一）在闭幕式上代表艺术剧场接受献花



## 三代米饭缘



文·尤今

由于政治风云和个人际遇，母亲和米饭之间，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含着银匙的母亲在马来亚群山环绕的怡保出世，风和雨，俯首听命。童年时期，每天三餐都有食之不尽的山珍海错。白米饭，不是主粮，仅仅只是点缀。有时，就着碗沿扒几口，便搁置不吃了，反正嘛，饿了，只要开口，厨娘随时便会端上千变万化的精致点心。可以这么说，在成长期中的母亲，是全然不把白米饭放在眼里的，在她认为，这是膳食里可有可无的东西。

婚前婚后生活一贯优渥的外祖母，挥霍惯了，对于孩子糟蹋粮食的坏习惯，一向是视若无睹的，而这，也就更加剧了孩子的任性。有时，满桌都是配搭米饭的菜肴，一大碗热腾腾香喷喷的米饭搁在眼前，她只敷衍性地动了一两筷，便使性子，要厨娘另外给她准备抹上厚厚黄油的柔软面包、煮得软硬适中而嵌入火腿熏肉的马铃薯……

原本以为生活就是一床天长地久的绚丽玫瑰花，万万没有想到，在猝不及防间，花瓣竟然全都凋谢了，留下了又尖又冷又扎手的荆棘，在一夕之间，生活无情地露出了狰狞的面貌。

1941年12月8日凌晨，横蛮跋扈的日本军队雷霆万钧地占领了马来亚。风声鹤唳，人心惶惶，家家户户都像惊了枪的兔子，把大门锁得死紧。然而，国土沦陷，一扇薄薄的门扉，又如何阻挡得了分分秒秒觊觎在外的死神呢？

那一年，母亲14岁，仓促退学。她感觉天花板好像突然掉了下来，把地上砸出了一个个大大小小的坑；她的心，满满地装着的，都是无所适从的惶恐。生活全都乱了套，佣妇、厨娘、车夫，领着外祖父发放的遣散费，回返偏僻的乡下避难。有人不舍得在这种兵荒马乱

的情况下离开善待他们的东主，外祖父却板着脸，说：“走吧，走吧，都走吧！”

一家人住在宽敞的豪宅里，日子像是一潭无波无澜的死水，然而，虚假的宁静下面，却潜伏着令人心悸的惊涛骇浪、埋藏着无可逃避的动荡不安。日军沿家挨户搜捕抗日分子，奸淫和抢劫的事件层出不穷。大家就好像被一个黑色的巨型玻璃罩子罩盖住了，不知道什么时候罩子会突然被掀开而遭致杀身之祸。大家盲目地在罩子里走来走去，有时不小心撞到罩子，发出了突兀的声响，无端端地把自己吓得魂飞魄散。生活里，全是斑斑驳驳的恐惧，而这恐惧还不断地在发酵……

就在这种草木皆兵的情况下，有一天晚上，外祖母把母亲唤到身边，解开了她那两条乌黑油亮的辫子，拿起了锋利的剪刀，卡嚓卡嚓地剪，剪、剪、剪。看着一绺一绺头发委委屈屈地掉落在地，她的眼泪再也没能忍住，她用拳头堵着嘴，呜呜地哭，外祖母烦躁地说：“哭，哭哭哭，哭什么！你要保住头发，还是要保住性命！”母亲不明白，为什么无关紧要的头发和至关重要的性命之间，会有一个“等号”？只是，当镜子里出现了那个酷似男孩的映像时，她正式向自己的幸福时光告别了。外祖母把母亲所有漂亮的裙子都藏在箱底，只让她穿宽大的上衣和松垮垮的长裤，偶尔出门时，还用炭灰把她的脸颊涂得邋里邋遢的。不久之后，她惊骇万分地听到一个宛若惊雷的消息——邻里一名相识的少女被日军奸杀，她心里的疑虑在这一刻全都得到了解答。自此之后，只要头发稍长，不待外祖母动手，她使用剪刀对着镜子“咔嚓咔嚓”地剪，就算剪得参参差差的，她也毫不在乎。年少的她，只能用这种卑微的方式来“保障”自己的“安全”。

长袖善舞的外祖父不愿意和日军有任何合作关系，当机立断地结束了庞大的生意，过着赋闲于家的低调生活。

日常生活里，首当其冲的，当然是膳食。在“要啥有啥”的太平时期，大家注重的是味蕾的享受；而在粮食受严苛管制的日据时期，大家考虑的仅仅是活命的问题。

起初，家底丰厚的外祖父还能以高昂的价格在黑市买到肉食、鱼虾、鸡蛋、面粉和白米，油盐酱醋茶也供应充足；渐渐地，新鲜食物的供应链被切断了，九曲十八弯地托人帮忙，也只能买到一些罐头食品和白米。外祖母量入为出，在掌勺时锱铢必较地使用有限的食材；有时，开一个罐头，配搭白饭，一家子便因陋就简地吃上两餐。

处于发育期的母亲，老是觉得饥肠辘辘，因此，当饭锅里冒出诱人的香气时，她肚子上的馋虫便一串一串地爬出来了，她把一碗结结实实的白米饭捧着在手里，双手不自觉地颤抖着，到了这一刻，她这才明白，饥饿原来也是一种病。把米饭一口一口地扒进口里时，味蕾被激活了：她尝到了深深地潜藏在饭粒里那丝丝缕缕的甜味；她根本不舍得大口吞咽，慢慢地咀嚼着时，赫然发现，那是一种凝集了阳光和雨露的美好滋味，是一整个宇宙的味道。只是，当时，她还不知道，这样一种简单的幸福，却也维持不了多久。

米粮的价格在黑市抬得比天还要高，而且，货源日益短缺，吃白米饭已经变成了一种难以企及的奢侈。大家只能勒紧肚皮吃粥，渗进米粒里的水越来越多，寡淡的粥变得比空气还要稀薄。

米粮匮乏，在乡下地方，几乎每一寸土地都用来种植易于生长的木薯。许多人纷纷以木薯为主粮。长期吃这高淀粉、低脂肪、低蛋白质的木薯，严重缺乏维生素B，左邻右舍都有人患上了脚气病。患者脚部浮肿，用手指一按，肌肉便会凹陷下去，许久难以恢复原状。接着，其他症状也陆续出现，包括体重下降、感官功能衰退，体质虚弱，间歇性心律失常、精神萎靡不堪，母亲瞧在眼里，自是惊心动魄。然而，为了活命，母亲和家人也别无选择地吃了不少木薯。得天庇佑，家里没有人罹患可怕

的脚气病。

1945年8月，日本投降，三年零八个月的苦难日子终于画上了句号。

含金的矿石经过高温的淬炼，露出了金灿灿的本貌；同样的，母亲经过了战火的锤炼，也露出了她朴素平实的真性情。

自我诞生起，母亲在我眼中便是一个惜粮如金的人，对于米饭，她尤其疼惜。

被母亲奉为圭臬的“光盘行动”，自小便是我们在餐桌上耳熟能详的家训。母亲从来不像其他妈妈一样，老是恐吓孩子碗有剩饭脸上会长麻子，她不。她会不惮其烦地告诉我们在日本铁蹄蹂躏下粮食匮乏的惨况，我们一遍一遍地听，入耳、入心、入脑，惜粮的好习惯，便在潜移默化中养成了。

在我的成长历程中，母亲的鸡蛋饭和砂锅饭，就像是记忆里不灭的炉火，时时温暖着已逝的岁月。

鸡蛋饭是母亲应付经济困窘时期的“灵丹妙药”。

婚后有一段长时期，父亲在创业时屡战屡败，捉襟见肘。四个孩子，嗷嗷待哺。为了让发育期间的孩子能够在贫穷的夹缝里健康地成长，睿智的母亲天天煮鸡蛋饭——廉宜的米饭耐饱，便宜的鸡蛋营养丰富，两者是天作之合。每天中午，当米饭在锅里“咕噜咕噜”地唱歌时，母亲手脚利落地把几个鸡蛋敲开，击打均匀，再加入少许胡椒粉和酱油，快速倒入将熟未熟的米饭里，用勺子搅个天翻地覆；加盖焖煮一会儿，氤氲的香气层层叠叠地包围着我们，犹如温香软玉满怀抱，那真是一种非常幸福的感觉啊！米饭大熟后，母亲一掀开锅盖，金光倏地闪出，双眸子被照得金碧辉煌。肥胖的米粒蛋香四溅，把这样一碗璀璨的米饭吃下肚，立马让人感到精神抖擞、生机蓬勃。

家里经济好转时，内容丰富的砂锅饭便成了母亲犒赏味蕾的绝技。

她煮砂锅饭，坚持只用炭炉，她认为只有用炭炉，饭锅底层才能完美地形成令人销魂的香脆饭焦。

我站在旁边看她煮砂锅饭，觉得那简直就是一种变魔术的神奇过程。

鸡腿肉去骨切块，用蚝油、酱青、绍兴

酒、胡椒粉、麻油和粟米粉腌制，咸鱼切片煎香、冬菇泡软，搁置待用。米倒入砂锅，加水，以中低火慢煮，米饭冒出泡泡时，把鸡肉、腊肠、冬菇和小鲍鱼铺在饭面上，焖煮一会儿；最后加入青菜和咸鱼片，再淋上特制的酱料，大功告成。

砂锅饭端上桌，活脱脱就是一块斑斓的调色板，让人目迷五色呵！润而不腻的饭粒，吸收了所有食材的精华，一粒粒饱满生动。当那一层薄薄脆脆而百味麇集的锅巴被母亲小心翼翼地刮出来时，大家都迫不及待地抢着吃，哎哟，真是味蕾的极致享受呵！迄今为止，我仍然很少在餐馆点食砂锅饭——曾经沧海难为水啊！

结婚而为人母之后，我理所当然地把惜粮当成家训。

唐代诗人李绅脍炙人口的那首诗作《悯农》，曾经感动了万千读者：“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孩子年幼时，我曾千里迢迢地带着他们飞赴他们祖父母的故乡——海南岛，让他们亲眼看看务农的实况。

在80年代初期，海南岛农耕靠的全是人力。我们入住农村时，正是稻禾成熟期，尽管孩子们没有看到“锄禾”与“下土”的艰苦情况，但却看到了家家户户打谷、晾晒、脱壳这种种繁琐的程序，而这，着实让他们大开眼界。在他们单纯的意念里，金灿灿的稻谷生长在田地里，大熟之后，随随便使用手一掰，晶莹洁白的米粒便会轻轻松松地落满于掌心里；他们绝对没有想到，一粒米的诞生，居然复杂如斯！走一寸土地、长一尺智慧，海南岛之行，让我孩子内在的自我迅速地成长。

婆母是海南人，精于制作海南饭团。过去，由于饭团耐饱，便于携带，因而为劳动阶层普遍接受。公公早年从海南岛远下南洋打工，生活安定下来后，把婆母接到怡保去，繁衍枝叶，落地生根。

婆母缅怀昔日常做的海南饭团，因而手把手地教我做。和过去那种粗糙的饭团相比，婆母把海南饭团精致化了。她将平底锅加热，把成块的鸡油融化，再把剁碎的姜和蒜爆香，加入米和盐，不断翻炒；接着，在饭锅里倒入熬好的鸡汤和炒香的米。煮熟后，用勺子把米饭弄松，搓揉成团。做好的饭团一粒粒浑圆浑圆的，宛若一个个实心的雪球。它香气浓郁、口感细腻，吃进嘴里，粒粒分明，油腴脂润，香气直透五脏六腑。

孩子们都对海南饭团着迷了，不时央求我做。我曾经尝试“破旧立新”，在饭团里塞入肉松，然而，味道浓浊的肉松却大大地破坏了原味的芳馥。新不如故，盲目的创新，有时对传统是一种亵渎。

著名诗人周梦蝶有桩轶事，深深地触动了我的心。他惯常以蜗牛般的速度吃饭，有时吃一顿饭要耗上两个多小时。有一次，作家林清玄问他：“你吃饭为什么那么慢呢？”他好整以暇地答道：“如果我不这样吃，怎么知道这一粒米与下一粒米的滋味有什么不同呢？”

每一粒强韧的米，都蕴藏着丰富的记忆，它记得土壤的包容、阳光的恩泽、雨露的滋润；它也记得农夫手心的温暖和季节的祝福。它感恩图报地长出了肥头胖耳的样子、长出了独树一帜的个性，我们又岂能辜负它呢？唯有细嚼慢咽，才能让一粒粒米有机会把醉人的风情全面释放出来啊！

**(作者为本地作家、新加坡文化奖得主)**





# 找不到砖厂的砖厂组屋区



文图·李国樑

**砖**厂组屋区位于惹兰红山（Jalan Bukit Merah）与亚历山大路（Alexandra Road）交界，于上世纪70年代初重新发展，跟惹兰鲁马丁宜（Jalan Rumah Tinggi）合共20座组屋。以两个历史地标命名的ABC砖厂（ABC Brickworks）小贩中心是这里的标志。

关于这个地区的一些名称来源：“红山”出自古代新加坡国王恩将仇报，杀死为他消除剑鱼祸害的小孩的传奇故事；“亚历山大”命名自英国爱德华七世的亚历山大王妃。亚历山大王妃出身望族，是位跟英国王室门当户对的丹麦公主。她的兄弟分别坐上丹麦和希腊王位，妹妹嫁给沙皇成为俄罗斯皇后，可谓誉满天下。

“ABC”指的是这一带最大的啤酒制造商 Archipelago Brewery Company，俗称ABC酿酒厂；至于砖厂（Brickworks），上世纪50年代初，殖民地政府在“福山砖窑村”（简称砖厂）地段兴建信托局房屋，因此福山砖窑村得名自坐落在原址的福山砖厂和土矿场。

## 亚历山大路的砖厂

那个年代具规模的造砖业者包括德光岛的泽光砖厂、裕廊的裕廊砖厂、后港4条半石的鼎山砖厂、亚历山大路的福山砖厂等。最财雄势大的是英国人投资的亚历山大砖厂，鼎盛时期柔佛、怡保和北海都有分行。亚历山大路和西班牙让路交界处的Mapletree Business City，就是从前的厂址。战后两年兴建的麦唐纳大厦，使用的是亚历山大砖厂制造的新式饰面砖。

上世纪50年代，建筑公司以价廉的混凝土建材替代砖块，此外政府实施新条例，新的建筑项目安装水电供应之前，必须缴付几千元押金，公务员大幅减薪等，使到发展商静观其变。虽然殖民地政府报告指出，多个木屋区和店屋存在着严重火患和传染病风险，但没有进一步行动，多方因素造成建筑业陷入低潮，砖块生产停滞，福山砖厂结束营业。70年代初，新加坡港务局买下亚历山大砖厂的产业，亚历山大一带最后的窑火熄灭。

## 亚历山大军营见证印度军团兵变

十多年前的园艺园林（Hort Park）一片荒芜，开发后跟南部山脊衔接起来。游人漫步于花柏山、直落布兰雅山、园艺园林和肯特岗，有



砖厂地形图  
(根据2023年谷歌地图绘制)

- 1.前ABC酿酒厂的酿酒师之家 (366 Alexandra Road)
- 2.立兴 (Lea Hin) 生产的蝴蝶牌煤油灯和火水炉走入寻常百姓家
- 3.ABC砖厂 (ABC Brickworks) 小贩中心
- 4.亚历山大村 (Alexandra Village), 从前的双口鼎
- 5.吉门营房 (Gillman Barracks)
- 6.亚历山大坊 (Alexandra Point), 从前的马来亚酿酒厂 (Malayan Breweries Limited)
- 7.从前的亚历山大砖厂 (Alexandra Brickworks), 现在的Mapletree Business City所在地
- 8.园艺园林 (Hort Park)
- 9.亚历山大园 (Alexandra Park), 前亚历山大军营 (Alexandra Barracks)
- 10.失落的方舟 (The Deak)
- 11.亚历山大医院 (Alexandra Hospital), 从前的英军医院 (British Military Hospital)
- 12.汉惹拔回教堂 (Masjid Hang Jebat)

“悠然见南山”之趣。

园艺园林的近邻亚历山大园 (Alexandra Park), 曾经是亚历山大军营 (Alexandra Barracks) 所在地, 这里最古老的黑白屋建于1905年左右, 其他房子多数于30年代落成, 让在英军医院 (亚历山大医院) 工作的医疗团队住宿。有些黑白屋就像大庄园, 门前绿草如茵。由于黑白屋年代已久, 又属于受保留建筑, 材料必须遵照原来的规格, 翻修工程浩大。加上过于清幽, 吸引野猪、蛇虫等“不速之客”, 住客在光鲜门面背后, 必须学会跟自然界共生。

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驻扎本地的英国步兵团受命前往法国前线, 印度第五轻步兵团800人入住亚历山大军营, 负责看守被囚禁在东陵营房的德国战俘。这些印度军人都是孟加拉回教徒, 分化为左翼和右翼两派阵营。

印度兵来到新加坡后发现落差很大。例如在老家有羊肉羊奶供应, 这里只分配到鸡肉和少量鲜奶, 只好自掏腰包加菜, 久而久之的累积许多负面情绪。英国军官意识到他们有叛乱的可能性, 决定将整支军队转调到香港。谁知道谣言传播开来, 说他们将到中东跟土耳其回教兄弟打仗。动身前一天下午, 右翼阵营夺取军火后兵分数路, 第一批留在亚历山大军营袭击英国军官; 第二批前往岌巴港, 见到洋人便杀; 第三批冲到东陵军

营释放德国俘虏, 不过多数战俘不认同印度军的做法, 留下来照顾死伤者。

1915年2月15日兵变当天是农历年初二, 许多军人都在休假。锡克警察、新加坡志愿军、柔佛武装部队 (苏丹亲自指挥) 和英国海军参与支援, 本地的日本领事招募300多名日本特警和路过的海军, 跟法国和俄罗斯军人联手搜捕叛军。

日本记者塚田记述事件发生后, “在人行道上, 各民族毫无例外地给日本人让路……我们当时在军事上占领了一部分英国领土……确实只有一个很短时期, 但太阳旗在新加坡中心升起, 意义何在? 亚历山大军营是在新加坡岛中心, 而新加坡是南洋的心脏。”这段话似乎成为20多年后新加坡沦陷的预言。



亚历山大园是前亚历山大军营, 保留的黑白屋供英军医院 (亚历山大医院) 医护人员住宿



园艺园林南部山脊可见昔日英军庄园



吉门营房改造成当代艺术画廊和绿色商业区

## 吉门营房

1936年完工的吉门营房（Gillman Barracks）跟亚历山大军营隔条马路。当时英国觉察到东北亚战云密布，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于是调派更多军人到新加坡进行防御。70年代英军撤退后，新加坡武装部队接手吉门营房，30年前改成商业用途，汇聚众多国际画廊和餐馆来打造当代艺术空间。例如来自法国的海伦（Helene Le Chatelier）在新加坡定居多年，多数作品非黑即白，灵感来自这一带的黑白屋。她希望通过最原始的颜色找到集体回忆，就像黑白照保留昔日记忆一样。

吉门营房的第二阶段发展，引进多元的商业元素来提升活力，餐饮业者计划腾出空间，改造成亲脚踏车骑士的咖啡馆，同时设立脚踏车维修站。生活品牌公司 Didi Lifestyle 准备朝绿色能源进军，结合太阳能板块业者和电动车充电供应商。新的现代城市绿色生态，正逐步从黑与白中脱颖而出。

## 亚历山大医院

亚历山大园山脚下的亚历山大医院，就是为



亚历山大医院是受保留古迹，有一段血的记忆

了准备二战而建的英军医院（British Military Hospital）。

1942年2月14日，驻守鸦片山的马来军团发射完最后一颗子弹，日军沿着巴西班让朝市区扑来，计划封锁炭巴港来切断联军的物资供应。日军至亚历山大砖厂一带遭到埋伏，马上改变计划，攻打亚历山大军营和吉门营房，并占领ABC酿酒厂和福山砖厂。一些撤退的联军在亚历山大医院范围向敌人开枪，日军恼羞成怒，两度冲进医院，把怨恨发泄在医务人员及伤重的英军身上，超过200人罹难，成为红十字下的血腥记忆。

战后医院继续用作军事用途，治疗马来亚紧急状态时期跟马共交战的伤兵。亚历山大医院主楼列为国家古迹，依然保留着二战前的风貌。

## 汉惹拔回教堂与失落的方舟

亚历山大医院附近有座汉惹拔回教堂（Masjid Hang Jebat），1952年初创的小祷告室如今可容纳600名教徒，仍然保留着甘榜锌板屋风格。

回教堂取名自马来民间传说中匡扶正义的民族英雄汉惹拔。根据《汉都亚传》（Hikayat Hang Tuah），汉都亚、汉惹拔和另外三人情同手足，一同投效马六甲王朝苏丹。苏丹听信谗言，下令杀死汉都亚，宰相暗中帮助汉都亚躲藏起来。汉惹拔自恃武艺高强，迫使苏丹逃离宫廷。宰相要求苏丹赦免汉都亚，让他与汉惹拔决战，汉惹拔向汉都亚解释，是为了帮他复仇才跟苏丹对抗的。汉惹拔临死前对汉都亚说：对苏丹盲目忠诚，实在是愚昧无知。

回教堂300米外隐秘的树林，有艘“失落的方舟”（The Deck），那是附近居民用倒下的树干搭建而成的“甲板”。方舟在徒步群体中知名度飙升，游人爬上甲板拍照时对其造成损坏。



汉惹拔回教堂(Masjid Hang Jebat)



失落的方舟(The Deck)

小隐于野的古朴趣味令人兴奋，但是唯有公德心才可能让“方舟”存活。

## 亚历山大工业化

过去的岁月里，你可曾深夜路过砖厂一带，醉倒在微风掠过的酒花香中？30多年前这阵令人怀念的气味已飘到大士。ABC酿酒厂原地兴建艾格坊商场(Anchor Point)，金锭园公寓(The Anchorage)和宜家(IKEA)，大路旁的酿酒师之家是仅存的遗迹。

亚历山大于90年前出现工业雏形，1932年投入生产的马来亚酿酒厂(Malayan Breweries Limited)是本地最早的现代啤酒厂(现址为亚历山大坊Alexandra Point)，主打虎牌啤酒。一年后德国人投资的ABC酿酒厂也在亚历山大路设厂，主打酒精量较低的锚标啤酒。投资者选择亚历山大作为啤酒产地，主要瞄准附近的军人和医护人员。这里靠近铁路，产品输出到马、泰也很方便。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殖民地政府根据《1939年对敌贸易法》，接管敌人(德国)的资产。日据时期，军政府命令生产朝日啤酒(Asahi Beer)的大日本酿酒厂来本地启动生产线，战争结束后归还给马来亚酿酒厂。

立兴(Lea Hin)的外墙由蓝色、白色小星星和大红星组成，外观特别抢眼。立兴生产的蝴蝶牌大光灯(煤油灯)和火水炉走入寻常百姓家。电力不足的年代，大光灯照明千家万户，户外活动、摆档口、家里做功课都少不了它。火水炉的燃料是煤油，煮食后锅底积上厚厚的油层，必须使用火炭灰来洗刷。80年代火水炉被煤气和电炉全面取代，立兴就像蜕变的蝴蝶，转型生产组屋铁花窗，闯出一条新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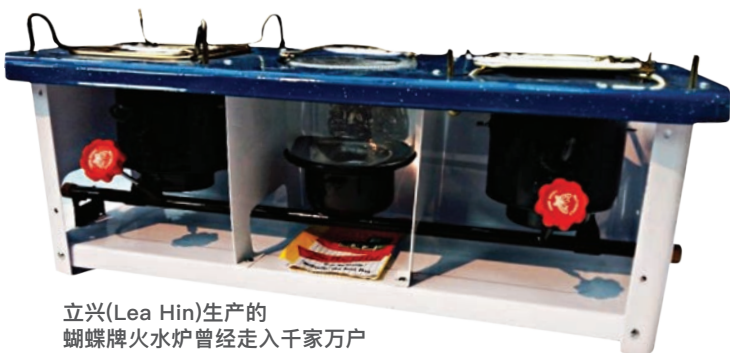
## 亚历山大村与双口鼎

亚历山大村是驾车人士熟悉的汽车维修村，这里有座以原址命名的亚历山大村熟食中心。19世纪原为余有进的甘蜜胡椒种植园，20世纪开辟成俗称双口鼎的村落，取自熬制甘蜜的两口大鼎。老地方改头换面，双口鼎逐渐消失在记忆中。

双口鼎附近工厂林立，先后出现过振南、鼎美、鼎英和大华学校。二战后，5000多居民在两间亚答屋安身，土地司以卫生与安全为由，命令其中五分之一非法搭建的亚答屋居民拆屋。双口鼎居民请求马华公会会长陈祯禄代为求情，可见新加坡自治前马华公会在本地华社的雄厚势力。

在张挥《双口鼎一村那些年那些事》文中，50年代的双口鼎已深受当下文化影响，流行歌曲、时髦打扮，紧身花衫裤渗透到纯朴的小村落。年轻人喜欢，“较为保守的老人家却不喜欢这样的装扮，都说像包肉粽一般难看死了。”小村建在大路旁，村民外出工作便利，难免受到外界的影响。

拖拉机开到双口鼎的时候，已经进入ABBA瑞典流行乐团风靡全球的年代。ABBA的《我有一个梦想》(I have a dream)唱道：“我相信天使，我看到的一切都有好的一面；我相信天使，



立兴(Lea Hin)生产的蝴蝶牌火水炉曾经走入千家万户

时机成熟时，我将穿过小河，追逐我的梦想。”时代在变迁，昔日被一些人视为颓废的流行音乐有其乐观向上的一面，这是固有的想象与现实形成的落差，就像在砖厂组屋区找不到砖厂一样。

#### 参考文献：

- [1] Hang Jebat Mosque, <https://www.roots.gov.sg/en/places/places-landing/Places/landmarks/my-queenstown-heritage-trail/hang-jebat-mosque> accessed 7 June 2023.
- [2] Hello! My Alexandra Village, <https://my-communityfestival.sg/hello-my-alexandra-village/> accessed 21 May 2023.
- [3] Malcolm H. Murfett et. al., *Between two oceans: a military history of Singapore from 1275 to 1971*, Marshall Cavendish Editions, 2011.
- [4] My Alexandra Heritage Tour, <https://mycommunity.org.sg/guided-tours/my-alexandra-heritage-tour/> accessed 6 June 2023.
- [5] Peter Elphick, *Singapore: the Pregnable Fortress: A Study in Deception, Discord and Desertion*, Coronet, 1995, ISBN 9780340649909.
- [6] Stephanie Ho, "Alexandra", [https://eresources.nlb.gov.sg/infopedia/articles/SIP\\_2016-06-21\\_114707.html](https://eresources.nlb.gov.sg/infopedia/articles/SIP_2016-06-21_114707.html) accessed 21 May 2023.
- [7] The beer train from the Anchor Brewery, <https://thelongwindingroad.wordpress.com/2017/10/30/the-beer-train-from-the-anchor-brewery/> accessed 21 May 2023.
- [8] The Singapore Free Press and Mercantile Advertiser.
- [9] <The Straits Times>
- [10] 《南洋商报》
- [11] 《星洲日报》
- [12] 张挥, 《双口鼎一村 那些年那些事》, 玲子传媒私人有限公司, 2015.

#### 题图说明：

ABC砖厂小贩中心的命名保留重要的地标性记忆

(作者为英国皇家造船师学会会员、自由文史工作者)

## The Brickworks Estate where Brickworks No Longer Exist

The junction of Jalan Bukit Merah and Alexandra Road is where the Brickworks estate and the adjacent Jalan Rumah Tinggi are situated. In the early 1970s, the estate underwent redevelopment and 20 HDB flats were eventually built. The name of the ABC Brickworks Market and Food Centre serves as a reminder of the estate's past.

The term "ABC" refers to the Archipelago Brewery Company commonly known as ABC Brewery. "Brickworks" refers to the former Hock San Brickworks and Hock San Village, which were part of the estate.

The Alexandra Brickworks was the most prominent brickworks factory in Alexandra. It had branches in Johor, Ipoh, and Butterworth during its peak. The Mapletree Business City located near the junction of Alexandra Road and Pasir Panjang Road used to be the site of the factory. After World War II, the factory supplied Orchard Road's McDonald House with its new R&D product-the veneer bricks.

In the 1950s, new regulations required substantial deposits for utility supplies in new construction projects. Coupled with pay cuts for civil servants during that time, developers chose a wait-and-see approach, leading to a slump in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Hock San Brickworks was severely affected and closed down. The Alexandra Brickworks property was acquired by the Port of Singapore Authority, marking the end of kiln fires in the Alexandra area in the early 1970s.

Located near HortPark, Alexandra Park was previously known as Alexandra Barracks. The oldest house in the area was constructed in 1905, although most of the black and white houses were completed in the 1930s. These houses provided accommodation for the medical teams working at the British Army Hospital.

Gillman Barracks, which was completed in 1936, was just across the road from Alexandra Barracks. At that time, the British anticipated the possibility of war spreading from the Northeast to Southeast Asia. Consequently, they deployed more soldiers to defend the Singapore fortress. After the British withdrawal in the early 1970s, Gillman Barracks came under the control of the Singapore Armed Forces. The barracks underwent conversion some years later, bringing together international galleries to create a space for contemporary art.

Alexandra Hospital at the base of Alexandra Park, served as the former British Military Hospital. On 14 February 1942, following a fierce battle at Bukit Chandu, the Japanese encountered another ambush near Alexandra Brickworks. Consequently, they launched an attack on Alexandra and Gillman Barracks. The ABC Brewery and Hock San Brickworks also fell into the hands of the Japanese. As some retreating allied troops fired upon the enemy within the vicinity of Alexandra Hospital, the Japanese soldiers became infuriated. They stormed the hospital twice, resulting in tragic deaths of over 200 medical staff and severely wounded British soldiers. This event remains a haunting memory under the Red Cross.

Post war, the hospital continued to provide treatment to wounded soldiers who fought against the communists during the Malayan Emergency. The main building of Alexandra Hospital has been designated as a national monument and still maintains its appearance from before World War II.

The present-day Alexandra Village Food Centre and its neighbourhood occupy the original site of Seah Eu Chin's 19th-century gambier plantation. In the 20th century, the plantation was transformed into Alexandra Village, which was commonly referred to as "双口鼎" (*shuangkouding*) by the Chinese community. Following the war, the villagers worked in the urban areas and were inevitably influenced by the diverse culture. The older residents struggled to adapt to these changes, leading to the emergence of the "generation gap".

By the time tractors arrived in Alexandra Village, Singapore had already entered the ABBA era. ABBA's song "I Have a Dream" brought a sense of optimism to the new generation. Life underwent significant transformation, just as the brickworks ceased to exist in the Brickworks estate.





文·张森林

曾

在新加坡华文报界服务将近40年的《新明日报》前总编辑杜南发，在2023年5月出版文选集《文史拼图——新加坡华族社会文化史文集》，并在同年8月上旬举行发布会，是为新加坡文教界的一大盛事。

《文史拼图》分为上下两篇，上篇是新加坡华族社会史，下篇是新加坡华族文化史，展现了一位长期观察社会文化的知识分子对于文史考据与探微的不倦精神。虽然杜南发自谦不是学者，《文史拼图》只是一本“杂书”，但从此书所收录篇章的内容来看，恰好验证了杜南发作为一位新加坡文化学者所应具有严谨风格、学术造诣与文化学养。

新闻报道是进行式的、动态的、即时的，而文化历史的冶炼则是过去式的、静态的、沉淀的，但两者之间又有着微妙的关联。杜南发深知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故而积极投入宗乡会馆的会展策划与馆史研究工作中，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用在文史考据上。这种工作性质的转变，让他有机会从另一个视角来回溯社会文化的源头，成了他报人生涯告一段落后文化生命的延伸。

本文试从四个面向来归纳《文史拼图》的文献价值：一、提供后人深入论述新加坡华族文化内涵的纲领框架；二、追溯新加坡华人移民的源头；三、华文报与宗乡会馆的密切关系；四、早期宗乡会馆所扮演的民政角色。

作者在上篇的概论《三波华人移民对新加坡社会的贡献》中，从经济、社会、文化三个层面，阐述华族移民对我国社会的贡献；在“文化”这个层面的阐述，基本上就是下篇的概论《新加坡华族文化的构成》的概括。杜南发认为，虽然《新加坡华族文化的构成》不长，却是他用力最多的篇章。此文是配合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等机构在2016年1月于新加坡大会堂联办的“活力华彩——新加坡华族文化光影展”而作，在那之前，有关新加坡华族文化的论述甚为匮乏，所以他需要根据自己的认知，通过三重结构：中华文化、移民文化、国家文化，勾勒出可供后人继续论述的框架。

杜南发认为，中华文化包含以“和”为核心的价值观、汉字文化、姓氏文化、宗族文化；移民文化包含冒险精神、应变能力、互助精神、重视教育；国家文化包含认同意识、公民信念、教育效应、社会交流、家园观念。

读杜南发《文史拼图——新加坡华族社会文化史文集》

文史钩沉可知兴替



从杜南发这篇提纲挈领的篇章中，我联想起自己在2023年2月所写的《新加坡华族文化的梳理与建构》一文：“新加坡华族文化是衍生自这片土地，以中华文化作为参照数但不全盘照收的一种带有本土特质的文化。这种文化的形塑是新加坡软实力的象征，也必然要以新加坡的整体国族利益为导向和依归。”

杜南发此文与拙文中另一不谋而合的论述，是关于跨族文化的交融。本土性的跨族融合，不仅仅是在新加坡，放眼落地生根的全球华人，也是颠扑不破之道。

关于中华文化的论述，相信类似张岱年、方克立主编的《中国文化概论》的书籍，存世数量应该不少。我辈更重要的是探索新加坡华族移民的源头，确定华族文化的时间范围。在这个前提下，杜南发的《追溯华人移民新加坡的最早年代》，为读者提供了不少宝贵的原始资料。

在此文中，作者综合自己童年和少年时期在龟仔山下石叻路口亲眼看到的墓碑、新加坡南洋方氏总会的记录、武吉布朗咖啡山寻墓人的发现、海峡殖民地政府旧档案的两份报告书、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的学术研究成果、新加坡学者庄钦永在天福宫内的观音殿发现古铜钟上的铭文，最终得出一个结论：早在雍正、乾隆年间，就有华人来到新加坡从事贸易活动、定居甚至安葬的事实。


杜南发的这个结论，与福建人民出版社在1993年出版、林金枝主编的《华侨华人与中国革命和建设》一书中的论述：“早在西方殖民主义者东来之前，古代华侨已在居住国从事开发和贸易，他们与当地民族和睦相处，在海外

生根发展”，遥相呼应。

杜南发此文也激发我进一步了解新加坡华族移民起始阶段的人口的求知欲。根据《华侨华人与中国革命和建设》，1819年6月11日，“开发”新加坡的莱佛士致函森美塞公爵夫人说：“我新辟的殖民地繁荣得太快了。建立不到四个月，人口已增加了五千多人——主要是中国人，他们的人数每天都有增加。”到了1820年8月，莱佛士又说，新加坡的人数已达1万至1.2万之间，大多数是中国人。

由于华人移民越来越多，根据王慷鼎博士的论文《新加坡华文日报社论研究（1945-





1959)》，1837年，新加坡出现第一份华文报章《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杜南发的父亲杜贞奏是1949-1950年新加坡晋江会馆战后复兴第二届副文书，杜南发克绍箕裘，积极投入会馆的会务工作，特别是在退休之后。2020年，福建会馆出版《世纪跨越·新加坡福建会馆180周年报刊史料选汇编》，杜南发担任主编。为了编撰这部新加坡社会史的重要文献，编委团队从1840年以来数以千计的报刊新闻报道，以及国家文物局的历史文献档案中，遴选出具有代表性的报道与特稿编汇成书，历时九个月，工程浩大。

在《从报刊史料看福建会馆180年发展之路》一文中，杜南发间接带出新加坡华文报与宗乡会馆的关系之密切：“自1840年诞生迄今，本地官方文献及中英报刊，均保留许多有关福建会馆的资料，尤其华文报刊每年都有大量的新闻报道，构成绵延逾180年几乎从不间断的一道独特新闻景观，可谓一项罕见的文化记录！”华文报所承载的宗乡会馆信息之多，由此可见一斑。

作者在会馆保存的会议记录之外，从官方文献与华文报刊获取关于会馆的宝贵资料，如果不是另辟蹊径，至少也是别树一帜，且为其他会馆日后编写馆史树立可资借鉴的榜样。

华文报与宗乡会馆关系之密切，不只反映在新闻报道上，也可从会馆刊登在华文报的广告中管中窥豹。2018年，晋江会馆出版百年纪念特刊，杜南发担任编委会顾问。在《晋江会馆的创办经过——新史料的发现与分析》（此文没编进《文史拼图》）一文中，作者写道：“笔者为撰写专文，多方寻找战前及早期的会馆史料，在国家文物局研究员吴庆辉君协助下，终于在早年本地出版的报章里有了重要的新发现。”文

中提及的新发现，就是1925年和1927年《南洋商报》上刊登的三则晋江会馆广告。

从文物入手，考据新加坡华族文化的历史，也是杜南发应用的探微策略之一。在《从二战前后文件看晋江会馆的“半官方”角色》一文中，作者从《1939年晋江会馆旅行证书》《1946-1947年晋江会馆主席签证准入口纸簿》这两份文件中推测，二战前后的英殖民地时代，晋江会馆曾扮演证明本地移民身份及发出新移民入境“签证”的机构之角色。

结合杜南发的这个发现，以及1933年新加坡永春会馆协助永春家乡剿平土匪作乱，1935年新加坡金门会馆协助金门家乡救平海盗侵扰，可见早期宗乡会馆不止于协助移居海外的乡亲安居乐业，也在家乡治安与民政领域发挥积极的协和功能。

在上述发布会上，杜南发坦言自己是抱着“有趣”和“好玩”的心态来看待文史考据，以这种心态切入，在进行严谨求工的文史考据工作时，才会有一定的推动力。

华社、华文教育、华文报、华文文史，是新加坡华族文化紧紧相扣的四个环节，回首过去数十载，杜南发有幸成为这四个环节的文化纽带，并经多方考证，成就了《文史拼图》这样的一卷文化史册。

文史钩沉可知兴替，就如文史研究者林志强所著《尘封轶事——从武吉布朗追溯新华两百年》一书的序文作者乔·布登斯（乔治·亨利·布朗的玄孙女）所说的：“一个国家对历史的记忆将影响他们如何看待自己和国家的未来。新加坡是一个独特非凡的国家，深受关爱，不时得面对锐眼严察，饱受批评，了解其历史渊源对其未来发展至关重要。”

（作者为本地文史研究者）

# 牛车水：得来不易的幸福

## 何乃强医生新著发布



文图·庄永康

**养**正学友前辈何乃强医生最近出版新书，称为《牛车水人说牛车水的故事》。2023年12月10日的星期天，此书在合乐路富丽华河畔酒店发布。当天发言的除何医生本人之外，尚有负责牛车水事务的部长杨莉明（新加坡通讯及新闻部长兼内政部第二部长）、文友王振春和齐亚蓉。

何医生说，他原本希望发布会能在兴建于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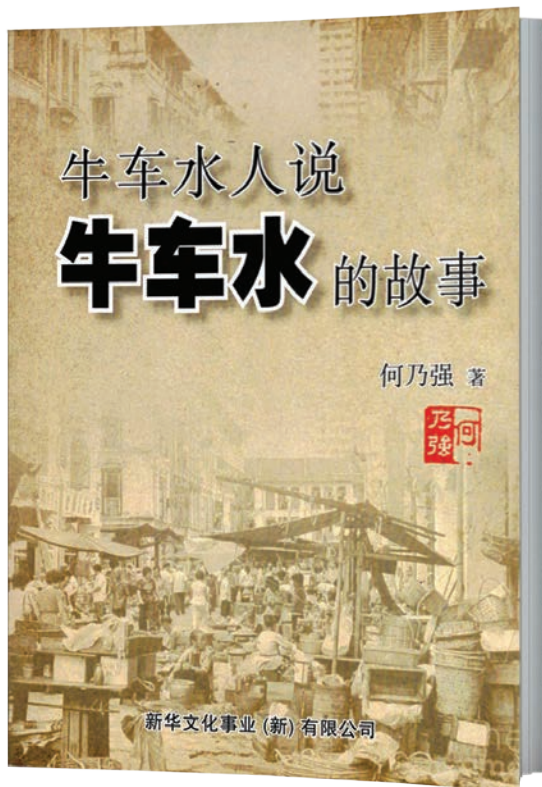
车水内的富丽华酒店举行，但旺季之中该酒店的各个公用场所都已爆满。幸好酒店老板特别照顾，辟出新加坡河畔的富丽华一会堂举行发布。在演说中，对牛车水的人和事，旧雨新知，何医生都津津乐道，“感恩”之情溢于言表。

### 感激建国一代人的付出

有关牛车水，新加坡历来出版过的文图书籍也不少。何医生自称“牛车水人”，主要出于他自己所说的：“我的父母在1941年搬迁到牛车水居住，我在那里长大和上学，度过童年和青少年时期无忧无虑的生活。虽然成年后搬离牛车水，但因那里有我的父业，我还时常定时回去办理。屈指一算，我和牛车水的关系，至今已有80多年了……”

本书的第一个单元为“往事铭记”，何医生在发布会上扼要回溯了当年的主要情景：1942年日军侵略新加坡，战机先大举空袭南部人口密集的牛车水，有炸弹落在刚搬来几个月的家附近。1945年8月日本投降，英军回到新加坡，这名牛车水小孩第一次看到金发碧眼的“红毛人”。就在当年的10月，小孩有幸进入学生剪光头的养正学校就读，打好了华文基础。何医生说他是养正的适龄生，班上个子最小，有些因战争耽误了学业的超龄同学，毕业后不久就结婚了。

到了上中学的1956年，首席部长林有福的政府为了应付“中学联”（新加坡中学学生联合会）的学生暴动，出动警车，发射催泪弹驱散群众，其中一个地点也在牛车水家门前的街道上。何医生说，当时他躲在天台上观看这一幕，百年一遇地尝到催泪弹呛猛的烟熏，毕生难忘。过后便是1963年的自治和1965年的新加坡独立。最后，与他相守了58年的老伴（冯焕好），也出



《牛车水人说牛车水的故事》封面



左为1919年的丁加奴街；右为2023年的丁加奴街，多了商业味道，少了生活气息

身自牛车水。

经过了这一切，作者感受到牛车水给了他“得来不易的幸福”。书写牛车水的历史，是为了感激建国一代人的种种付出，饮水思源。他认为，只有当我们记住过去，我们才有可能创造未来。

## 牛车水故事与新加坡

本书其他单元，包括“各行各业”、“书塾”、“医院 医生 医师”、“人物”、“街道命名”等，可见所涵盖的范畴是很多元的。令笔者最感兴趣的是“街道命名”单元开宗明义第一篇文章《大坡牛车水、大马路、小坡……》。文中引经据典，考究真正的牛车水区到底属于哪个范围。笔者2006年出版的拙著《昙花镜影——牛车水的故事》，也曾探讨过这个课题。

其实今天为旅游局所推崇，大力邀约外来游客前来“打卡”的牛车水，确切来说是指大坡大马路（桥南路）和大坡二马路（新桥路）两条大路，以及夹在两路之间的多条横街。与大马路、二马路形成工字形的垂直大街，就是海山街（今称克罗士街上段）。著名的游客街如丁加奴街等都聚拢在此，而位于史密斯街的熟食中心，今日已正名为牛车水大厦。传统上，牛车水是莱佛士时代所划分的广府籍贯落户区。

牛车水的正式英文/马来文名称是Kreta Ayer。然而，为了西方游客识认上的方便，旅游局把牛车水“英译”为Chinatown。这一来，它的范围就涵盖了本地文史学者柯木林所认为的——北起新加坡河、南至麦士威路等等，“华人聚居甚多”之地，“名符其实的唐人街或中国城”。此“大牛车水”除了上述的广府人区，也包括潮州人为多的马真路、柴船头，福建人为多的Telok Ayer 港湾区。

连带一提，莱佛士等殖民官以方言群划分华人居住区的政策，“脱殖”后的某些新加坡人曾引为诟病，说是“分而治之”，目的是分化华人。但两百年后回望，当时的政策或许也有无奈之处。据目前何著《牛车水的故事》，页196指出新加坡历史上最血腥的一次暴力事件，是1854年5月牵涉了潮闽族群的“五斤米大暴动”。暴动长达十天，死亡四五百人。书中指出，暴动的平定，警察总监汤玛斯·邓曼居功至伟。

维基百科中的Thomas Dunman（1814-1887）条并无收录“五斤米”事件。但记这名英国人1840年以商办助理的身份来到新加坡，三年后加入警界。邓曼热心社交与长老会活动，人缘甚好，1851年任Superintendent of Police（即香港所称的警司），1856年升为Commissioner of Police（警察总监）。1871年从警察部队退休后，邓曼曾在今天称为加东蒙巴登区的地带种植椰园。以他命名的Dunman Road，即德明政府中学原来的创校地点。

何医生大作发布会上，我注意到几位发言人都各有取向。杨部长一心想知道，史密斯街和丁加奴街的命名从何而来。住小坡的海南人王振春先生，常到牛车水去是因一天能看三四部电影：这里的大华、东方和金华戏院都相隔不远。1997年移民新加坡的齐亚蓉女士，则认为牛车水和说牛车水故事的人都很“牛”。“牛”这个北方词笔者不是很理解，或许是广府人说的“威水”吧。

不过，无论你怎么看今天的牛车水，何医生所述故事，筚路蓝缕、披荆斩棘，对新加坡华人来说还是意义深长，值得继续流传下去的。

（作者为本地资深报人）

# 管中窥豹

## 从《南洋杂志》看南洋研究



文图·符懋濂

《南洋杂志》(The Nanyang Miscellany)是二战后出现的一本综合性杂志，由新加坡著名历史学者许云樵(1905-1981)主编，出版于民国三十五年十月(1946年10月)。他在《发刊词》里颇详细陈述该杂志创刊动机与宗旨：马来亚光复后，各地刊物出版如雨后春笋，多达百余种，单是新加坡就有五、六十种。可是不到一年，马来亚各地的许多刊物陆续停刊，最终只剩下不到十种。其原因相当复杂，而许云樵认为大家“不能合作和眼光太短”，动机又不纯，是个关键性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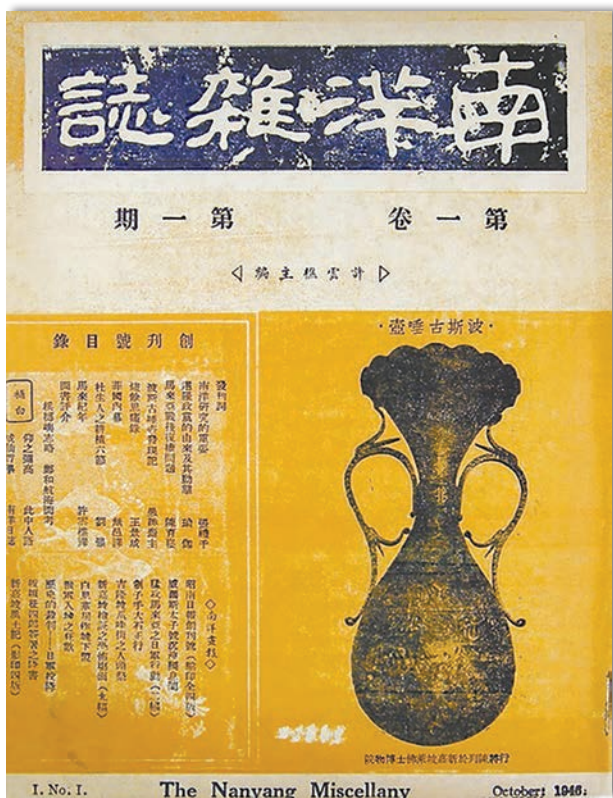
《发刊词》接着指出，《南洋杂志》经过多时筹划才得以问世，目的在于为志同道合者提供一个耕耘园地。既不为了赚钱，也“不谈什么主义”，单纯为了个人兴趣，所以“我们没有色彩”。此外，该杂志的使命是仅“谈南洋，谈华侨”，不谈国际问题与中国课题。如果改用今日的俗话来说，那就是以“立足本土，放眼南洋”，作为该杂志的创刊宗旨。在此所谓“本土”，是指撰稿者所在地，包括中国大陆、台湾在内。它还进一步说明《南洋杂志》不同于《南洋学报》(1940年创刊)：前者要求通俗化、大众化，后者要求专门化、学术化，所以二者并不存在“双胞胎”问题。

在《征稿简约》中，它更加明确阐述对稿件的基本要求：“本志主旨在提倡南洋学术研究，发扬华侨精神，建设本位文化，故凡有关南洋各地或华侨问题之专著或资料，以及富有地方色彩之文艺作品，均所欢迎。文体不拘，

但求通俗，如有征引，请注出处。”

《南洋杂志》表明其园地公开，欢迎各地人士投稿，“来稿一经刊载，概以现金奉酬”。但因当时的投稿者人数毕竟有限，如何确保稿源不会中断、如期出版？该杂志倒有个好办法，先后邀请了二十一位学者文人，作为“特约撰述”者，即张礼千、姚楠、郑子瑜、陈育崧、韩槐准、谢云声、陈序经、任美镠、王景成、朱杰勤、许苏我、刘强、谢松山、谢犹荣、何启拔、卢维基、洪炜堂、叶采真、吴一均、叶衣、林英强等。其中不乏一些著名的南洋研究者，如韩槐准(1892-1970)、张礼千(1900-1955)、陈育崧(1902-1984)、陈序经(1903-1967)、姚楠(1912-1996)、朱杰勤(1913-1990)等。

《南洋杂志》创刊号似乎气势不凡，其中开卷之篇是张礼千《南洋研究的重要》，它指出：中国与南洋关系密切、历史悠久，但如今却没有一个专门研究南洋的官方机构或团体，对于南洋的关注程度，非但远远落后于欧美，也比不上中国古代的隋唐与明清。因此，该文认为，这种漠视南洋研究的价值观念与客观现实，必须尽早改变过来，因为南洋研究对于中国非常重要！另一篇重要文章是王景成《烬余思痛录》，分成三期连载，它详细回顾了日寇席卷南洋后，作者个人流亡印尼的痛苦遭遇，如果配上《南洋画报》插页中的“验证大屠杀”十几帧照片，足以让当年的读者心潮起伏、悲愤不已！至于许云樵翻译的《马来纪年》(Sejarah



《南洋杂志》创刊号封面



杂志内《南洋画报》插页中的“验证大屠杀”照片



杂志内的插图

连载十几期的《马来纪年》

Melayu)，连载多期，且被列为“南洋文献”，无疑应属于该杂志的压轴之作。

综观《南洋杂志》各期的内容，我们不难窥见当年华族的南洋研究之一斑。

先就文章涉及地域而论，虽然是以马来亚（即新马）为核心，但几乎涵盖了整个南洋地区，包括暹罗（泰国）、安南（越南）、缅甸、菲律宾、荷属东印度（印尼）等，甚至超出稿约所规定的南洋范围，远达锡兰（斯里兰卡），如第一卷第10期刊载译作《中国锡兰交通史》一文。我猜想或许是稿源不济所致，过了不久就由月刊改为双月刊。

就文章涉及内容而论，可说是五花八门，过于繁杂，是名副其实的“杂”志。从社会、历史、政治、经济、财政到小说、诗词、书评、掌故、考证、集邮、广告，都包含在其中。唯未知何故，编者对集邮特别感兴趣。同时，几乎每期都有一两篇关于暹罗（泰国）的文章，其比重显然偏高（似乎超过新马），内

容涉及暹罗华侨、政党、金融、邮票、电讯、报业、航运、稻米，乃至暹罗风光、贡头、女郎等诸多领域。这或许因为在南洋殖民地化后，暹罗是唯一的非殖民地或独立国家。

就文章的学术水平而论，可以说是良莠不齐，千差万别。有些言之有物，条理分明，颇有见地，如许钰《昭南时代检举大屠杀案始末记》、吴一均《华侨自办大学议》、无邑译作《马来亚建国论》、陈育崧《清末驻新领事与华民护卫司》、张礼千《美国研究南洋的热烈》等。有些则属于滥竽充数，乏善可陈，似乎为了填充版位空间，不论对当时或后世，都没有什么价值或意义可言，如《五十年前之星洲物价》《莱佛士生日之谜》《热情的暹罗女郎》《新嘉坡市街华名录》等等。

许云樵在发刊词里强调，《南洋杂志》出版经过多时筹划，但是，最终仍然无法避免短命的厄运。它仅仅出版了十六期，即第一卷十二期，第二卷四期，便在1948年7月停刊了，

存在时间前后还不到两年。若究其原因，当然不止一端，撇开客观因素不谈，我个人认为主要是杂志本身的文化定位有点问题。它虽标榜“通俗”化，但所发表的文章，许多并不通俗，并脱离了读者的心理需求。当中居然包含文物考证与大量的统计数字，而且陈述无法做到深入浅出，使得可读性偏低，一般读者难免觉得索然乏味。试想：在一本20多页的单薄杂志里，通俗与学术怎么能够长期“共生”？从哪儿引来“俗学共赏”的广大读者？

尽管如此，《南洋杂志》在南洋华族历史上的贡献，仍然值得我们回眸审视一番。作为一种历史文物，它为我们提供了不少重要的历史信息，至少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关于昭南时代的检举大屠杀。前文提及的《昭南时代检举大屠杀案始末记》，非常详细记载了检举大屠杀的实况，包括检举过程、屠杀地点、涉及刽子手姓名等等。同时，《南洋杂志》前后刊印了几十帧关于检举屠杀的黑白照片，以及《昭南日报》和《新嘉坡检证惨案鸣冤特刊》复印缩小版。这些都是非常难得的第一手原始资料，其可信度极高，成为如今有关历史研究的史料至宝。

第二，关于南洋华文教育发展问题。吴一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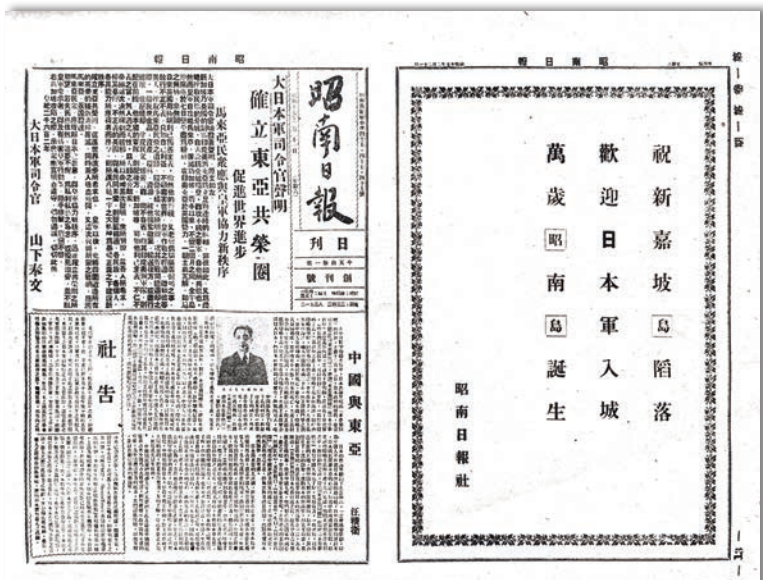
独具慧眼，在《华侨自办大学议》里，主张南洋华侨应该依靠自己的力量，创办一所华侨大学。他所持理由主要有两点：其一是根据官方统计，南洋各地的华文中小学多达3231所，其中马来亚（含新加坡）占了1339所，但却没有一所高等学府供南洋华侨子弟深造。其二是华侨子弟人生地不熟，回国升学相当困难，除了所需费用很大，一般家庭负担不起，而国内大学的学额有限，也无法满足华侨子弟的需求。此外，南洋地理位置适中，华侨大学还应负有“二大使命”：“宣扬中华文化特长”与“促进世界文化合作”。

第三，关于南洋华人的经济状况。在某种意义上说，华人属于“经济动物”，长期以来，华人大多聚居于城镇，在南洋的经济地位举足轻重。《南洋杂志》里的几篇文章，如卢维基《战后暹罗华侨的金融事业》、瑜伽《新加坡经济前途的检讨》、任美锷《南洋的土地利用》、瑜伽《马来亚征收所得税的检讨》、梦飞《荷印之所得税》等，都直接或间接说明了华人对南洋经济发展的高度重视，对各地政府财政收入的巨大贡献。该杂志对所得税制的特别重视，自然不在话下。

第四，关于南洋的其它文化信息。《南洋



关于检证大屠杀的详细记述



不忘“推荐”《昭南日报》





封面人物左秉隆



特地推荐《新加坡风土记》

杂志》的宗旨既然是“谈南洋，谈华侨”，而且一再强调“侨居南洋不可不研究南洋”，在所发表文章中，单纯“谈南洋”的也不少。其中除了连载的《马来纪年》推荐的《北大年史》，还有译作《马来建国论》《昭南时代邮票史》《马来文化的要素》《谈南洋》《大雅克人的神话》《马来亚的真主人》《贡头在暹罗》《吃槟榔研究》等，都可说是南洋研究的成果吧。

第五，关于中国与南洋的密切关系。根据《汉书·地理志》，早在二千多年前的汉代，中国便与南洋地区建立了海上交通、往来，海上丝绸之路随之形成，而且在唐宋时代便为了经商需要而开始“住番”（定居一年以上）。在《南洋杂志》中，除了《中国暹罗关系史》，《近十年来南洋研究在中国》《中暹亲善关系中的毒瘤》，它所简介的几部南洋华侨史，都是中国与南洋关系的组成部分。陈育崧《新嘉坡中国领事设置史》特地介绍了左秉隆、黄遵宪等四位清末驻新加坡领事。

第六，关于书写南洋的重要著作。每期都有相关图书简介，主要的有李钟珪《新加坡风土记》、张礼千《东西洋考中之针路》、黎正甫《中緬关系史》、姚楠《中南半岛华侨史纲要》、张礼千《倭寇侵略中之南洋》、陈正祥《南洋地

理》、姚楠《古代南洋史地丛考》、许云樵《北大年史》、李朴生《华侨问题导论》、陈嘉庚《南侨回忆录》、海上鸥《马来亚人民抗日军》、麦家生等《印尼问题讲话》、洪锦堂《劫后回忆录》、冯自由《华侨革命开国史》、胡铁君《星华义勇军战斗史》、赐思《抗日英雄在柔南》、抗日同志联谊会《血碑》、张礼千《马六甲史》、海上鸥《抗战以来的泰国华侨》、陈序经《暹罗与中国》、温雄飞《南洋华侨通史》、李长傅《南洋华侨史》、姚楠《马来亚华侨史纲要》等。从这些主要著作名目中，不难看出作者都是站在中国立场上，以华侨视角来讲述南洋与华人的故事。

毋庸讳言，我们知道长期以来，多数南洋华人都把南洋当成“第二故乡”，这与中国的“血缘国籍”不谋而合。但是，随着战后殖民地时代的结束，南洋出现一系列新兴国家，以及新中国废除双重国籍，并鼓励华族落地生根，南洋华人的国家认同逐渐改变，最终“把他乡变故乡”。正因为如此，《南洋杂志》所蕴含的历史信息即史料价值，就显得更加重要、更加珍贵，成为研究南洋华人史者必读的参考文献。

（作者为复旦大学博士、资深教育工作者）

# 庆德会新书出版 揭秘百年发展历史



文·欧雅丽  
图·庆德会

1831年，新加坡开埠才短短数年，发展迅速，吸引各地华人移民前来寻找新机会，这其中就包括一批来自马六甲的土生华裔。1831年，36位马六甲土生华裔以中国传统的方式，歃血为盟，结义金兰，创立了新加坡历史上第一个兄弟互助会——庆德会。这个本地历史最悠久的华人互助会至今仍在运作。

两百年来，庆德会从不对外开放，早期仅有36位会员的长子才有资格加入，后期虽扩大范围，允许会员的其他男性后裔加入，但仍是一个闭门组织，外人很难窥探其内部运作。2023年11月23日，庆德会在国家图书馆16楼观景阁发布了新书《义结金兰：庆德会》，为世人揭开了这个神秘组织的面纱。

## 一段缘分促成新书出版

《义结金兰：庆德会》由本地历史学者柯木林、林孝胜和庆德会现任会长陈坤祥共同主编，这本书耗时约三年时间完成，有中英文两个版本。谈到出版本书的原因，陈坤祥会长表示，早在2006年，他就想要为庆德会撰写一部史书。庆德会过去近200年都不对外开放，其所保存的资

料不多，研究的学者也很少，如果这一代人再不撰写有关庆德会的历史，那就后继无人了。但由于缺乏资源和资金问题，一直未能如愿。

2015年6月，庆德会创始人之一陈国朝的第七代后裔在其马六甲的住宅中发现了七卷《庆德会公议部》（简称公议部），并将其交给了陈坤祥会长。这些古老的文献用毛笔书写，用语都是文言文，并且没有任何标点符号。不谙华文的陈会长拿到这些文献后，请教了很多华文教育背景的朋友和一些研究者，希望能将这些文献翻译成通俗易懂的文字，但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翻译人选。

2020年，陈坤祥在出席国家图书馆举办的一个会议上认识了柯木林，与他谈起自己想要出一本有关庆德会历史的书籍的计划。对历史具有敏锐触觉的柯木林对此表示极大的兴趣，他认为这本书能填补有关这个本地最早的华人互助会的历史空白。而与柯木林的相识，也牵出了柯木林和林孝胜两位主编与庆德会的一段往事。

原来，庆德会最初被人发现，并为外人所知，也是因为包括柯木林和林孝胜在内的几位年轻学人。1973年，柯木林、林孝胜、张夏玮、吴华、张清江、李奕志6位年轻学人，利用业余时间，勘察了25处新加坡华族历史古迹，在第一次考察中，他们在直落亚逸街发现了庆德会这个“秘密组织”。吴华撰写了《不被注意的庆德

会》一文，发表在当年《星洲日报》副刊“星云”版。嗣后，连同其他学人撰写的考察报告一起，汇总成《石叻古迹》一书。时隔50年后，柯木林和林孝胜又携手编纂了庆德会的第一本专集，冥冥中似乎有种注定的缘分。

## 第一部有关庆德会的专集

《义结金兰：庆德会》是庆德会成立近200年来第一部专集，全书共有400多页，分为八个章节，四个附录，从多个角度解读庆德会的历史，全书汇集了多位学者的相关研究文章，让读者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庆德会的方方面面。

柯木林的导论提纲挈领地引导读者把握整本书的内容，还对庆德会旧会所庆德楼的修建年代做出了合理的推断。第一章《源远流长》追溯了东南亚土生华人的历史，以及他们对早期新加坡的贡献，将庆德会的成立放置在一个更大的历史背景下思考；第二章《新加坡华人互助会的始祖》在中国慈善精神的理论框架下分析二战前庆德会互助理念的形及其福利和赈恤计划的运作；第三章《创始人生平及其世袭关系》和第四章《杰出会员与重大事件》从整体上简述36位创始人的生平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又具体细谈了几位杰出会员的社交和他们的商业网络；第五章《庆德会会务案例概述》将《公议部》中涉及到会务的内容进行整理综述，让读者了解庆德会的运作方式；第六章《祭祀活动》则是将《公议部》中有关祭祀的文字进行整理，同时也介绍了庆德会仍在进行的年度祭祀仪式。

2010年，对于庆德会来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这一年，使用了百多年的会所庆德楼易主，由新加坡道教协会接管，并对其进行了落架大修。本书的第七章《庆德楼的建筑格局》详细介绍了庆德楼的建筑特色及其蕴涵的文化意义，记录了庆德楼落架大修的过程；第八章《告别直落亚逸 你好樟宜》由陈坤祥会长亲自撰写，讲述了为何要将庆德楼转手的原因，以及搬迁至樟宜路新会所的详细过程。

四个附录收集了创会中文章程、庆德会英文章程、《庆德会公议部》和庆德会资产一览表，并对七卷《公议部》进行翻译，增加标点符号和注释。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教授丁荷生在序言中说：“（收集的这七卷《公议部》）对新加坡和东南亚的研究有重大意义。这份重要的第一手



三位主编，从左依次是林孝胜、柯木林、陈坤祥



庆德会将历史文献捐赠给国家图书馆，从左至右依次是：柯木林、林孝胜、陈坤祥、新加坡国家图书馆处长杨加玲、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教授丁荷生、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管理局总裁黄子鹏、庆德会资深会员李汉阳

资料可丰富我们对早期新加坡生活和主要的社会机关运作模式的认知。”

## 近200年历史文献捐赠国家图书馆

2023年11月23日新书发布会当晚，庆德会也将7卷《公议部》捐赠给国家图书馆，这批19世纪中晚期的历史文献包括庆德会创会章程、内部会议报告、会员往来信函、账簿等，其中以1831年的创会章程历史最悠久。第七卷包含创始人之一陈国朝的族谱，是后代继承会员身份的依据。

陈坤祥会长在捐赠仪式上说：“将这批历史文献捐赠给国家图书馆，有利于这些原始文献的保存。国家图书馆可以将这些文献数字化，这样可以让更多的人能看到这些文献，方便研究者对其进行进一步挖掘研究。另一方面，也可以让更多公众领略19世纪祖辈们用毛笔写下的优美的华文字。”

题图说明：《义结金兰：庆德会》中、英文版

（作者为本刊副主编）



# 家住汤申台

作者·庄永康

一

咬紧牙关买下这栋角头排屋，是女儿刚念完幼儿园上小一的时候。从当时在红山中心的住所搭校车到新建好的名校，要整个钟头。校车颠来抖去，好长的路途啊，小女孩受不了还在车上吐呢。如是一年，决定买房子。

虽然那时楼价跌了，但从五房式组屋“提升”到有地私宅，感觉比爬上珠穆朗玛峰还难。但是太太相中了房子之后，一声令下，从此不回头。尽管房贷已供完多时，但回想起那段胼手砥足的日子，老伴每每自豪地对我说：“要不是娶了我，你永远都住那三房组屋。”——完全同意。

正如《繁花》的作者金宇澄所说，人生的选择就是一秒钟。除了娶妻之外，本人做任何重大决定之前总是粘粘糊糊的。要知买房的时候，银行借贷的利率是六巴仙！能够做那一秒钟选择的太座，难免理直气壮。

什么时候住进汤申台的？那时装修、搬迁，签这签那，乱糟糟的。我凭一份当时留下的月历，判断入伙新宅的日子是一九八七年四月。后来在母亲去世遗留下来的日记中读到，那是一九八七年的一月“康儿搬新屋”，今以文字为准。我是打算在这里颐养天年的，这房子留下的，首先是女儿、妻子、母亲三位女性的记忆。

二

住进汤申台排屋不久，父母就卖掉他们的五房组屋迁来同住。房子距离女儿就读的学校很近，走路十分钟就到了。带孙女上学放学，是父亲当时乐意承担的任务。父亲也喜欢在园子里做“花王”，剪草修枝。割草机好像也曾换了几把。

三十年后的二〇一七年，母亲和父亲在当年的七月和八月间相继离世。当时二老已迁出汤申台自己居住，功德法事在他们的组屋楼下空间举行，而我，则因为右眼的手术须居家养伤，父母的白事由妻与四个弟妹们主持。我是后来通过录像回溯父母的遗体告别仪式，观察到父亲灵前巡礼时女儿特别伤心，眼眶含泪。相信是童稚时候这段爷爷带上学的路，触动了她的心湖。

其实，人对住所的感情，也并非一朝一夕可以培养起来的。就在迁进汤申台一年半后的一九八九年五月中，我应英国广播公司之聘，到伦敦就职，也在中文科同事“宁买勿租”的怂恿下，在伦敦东南半郊区认购了一间连地的公寓。我到英国去的目的，也为了大男孩的求学与音乐教育。父子在伦敦寓所住了五年，儿子当完兵后回到那里继续升学，直到一切完成，儿子也在新加坡娶媳妇之后的二〇〇六年，我们才把伦敦的房子出手卖掉。

不难想象，伦敦的供楼岁月，是蜡烛两头烧，每月付出的英镑按揭，在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都是常来袭击我的梦魇，醒来汗流浹背。不过，汤申台的一年半，与伦敦寓所的五年，在我的记忆中却成为一道拉锯：我会永远活在漂移中吗？哪里才是我的“家”？

### 三

也难怪我对汤申台的住家感到陌生，我只知道这个私宅区有着六百多住户，一头是汤申山路，另一头是三巴旺山路，但从来分不清哪头是哪头。路口的摊贩明明挨着汤申路上段，却命名为三巴旺山熟食中心。新加坡另有一个三巴旺区，在三个地铁站外。

记得一九九四年中从伦敦回新加坡到报馆履新，由于被高涨的车价吓着了，一年没买车。报馆一位善心师姐，有回开车送我回家，我自己也不认得路，车子绕了好多圈。亏得那位师姐十分有耐心。

飘移岁月，让我思前想后探讨着定锚之处。刚回新加坡的日子，梦里不知身是客，每天睡醒之后须凝视天花板十数秒钟，细察那板面的纹理，挂着怎样的灯，才能确认自己的定居点在哪里。伦敦寓所的天花板仍沿用着古老的石棉板，新加坡则是钢骨水泥了。伦敦吊着日式纸糊灯罩，这里则用上了日光灯。

然而，汤申台的房子经过二〇一九年的装修，天花板改变了，电灯换成LED。所以，房子的装潢是一回事，但对于“家”，我须找寻新的定向。

### 四

地理位置，汤申台在汤申路上段，这或许并不是个令华社感到熟悉的地区，但却蕴藏着英治时期的史迹留痕。你可想想，新加坡地铁网是一九八七年启建的，到三十六年后的今天，汤申东海岸线才部分投入服务，剩余的线路仍在施工，你就晓得这是多么“乌鲁”的一个地方。

从家出发，跨过横贯的通衢马路，便是旧时遗留版本的汤申路上段，它曾经是本地著名的一条赛车道。沿着林径走，不一会便行抵贝雅士下段蓄水池，上有石碑刻着工程完竣的年份为一九一〇。贝雅士是沿袭麦里芝蓄水池而建，新加坡第二个蓄水池，分上下两段，以当

时从英国来的新加坡市政局专员工程师命名。

我家周围的步行范围内，也有现政府建立的碧山——宏茂桥公园，更是一座繁花盛草的生态园区。贯穿着这些塘泽地带的一条河流，叫加冷河。冠状病毒之前的一段时日，我常拎了傻瓜机到这些地方捕捉花鸟虫鱼的千姿百态，只见松鼠纵跃在茂枝、巨蜥游翔于浅底。松鼠和猴子，也是不时出没于住宅区的稀客。

我更常为一些自己觉得惬意的照片联想着某些诗句，如“燕燕飞来，问春何在”、“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周梦蝶与，蝶梦周与”等等。蓝翎小鹭踩着水石到处觅食的画面，却充满着“涉江采芙蓉”的意境。游园日久则惊梦，天地与我共生，而万物与我为一。

### 五

汤申山住宅区估计是从英军驻扎时代便开始，从排屋地契所记录的年份推算，应该是七十年代中期翻新建成的。到了目前，许多房子经过了转手再转手，也都改建成不同的模样。在建设局允许的范围内尽量建高，通常都有两层半，有的很夸张，建得像五星酒店，彻夜亮着灯。简朴点的则保留了一两片旧墙，存下住宅区划一设计的花纹，也有钉子户打死都只有一个地面层。浏览这个地区像翻过一段新加坡的建筑史。

更传奇性的是听说有一名英军，当年买了房子就一直没有折回新加坡。数十年后归来，凭着屋契卖掉那原汁原味的古董房子，发了笔小财。这个故事我相信是真的，因为我在伦敦买楼时，那好像是一九二四年的原始屋契还留着，之后谁卖给谁清清楚楚。大英帝国的典章制度，说起来也是个宝。

### 六

由李迪文作曲、陈洁仪演唱的《家》，有诗人木子撰写的华语歌词，歌中唱道：“我的家，收藏，我的欢喜悲伤/只要点燃希望，梦就会自由飞翔”。汤申台的家到底有没有给我希望梦想，很难说，但这里收藏着我大大小小的欢喜悲伤，那是千真万确的。

岁月流金，从新屋入伙时的报馆同事烧烤会，到左邻右舍的红白喜事，都是友谊和温情的印记。说起邻居，右邻的会计师家庭和左方

隔开两栋楼的牙医最熟络，不止主人夫妇谦恭有礼，相信也是教导有方，孩子的一代也十分尊重我们这些老人家。会计师是原华校生，听说是自学成材的，勤奋刻苦，且又是热心居委会事务的一位老好人。前些时候他在疫情浓雾中溘然长逝，没发丧。有一天因我家受到骚扰，我和老伴到居委会投诉，那里的理事看见我们的门牌号码，便问我们认识会计师某某吗，我们说当然认识，很感慨失去了一位好邻居。

住汤申台这条街上的大多是中等专业人士，卖房子给我们的上手屋主，以及斜对面一家的主人，都是医生。对面医生太太十分开朗随和，见面必欢颜问候。他们家信奉耶教，年前医生的寿堂去世了，享年九十二岁，我和老伴送了花前往祭奠，晚上参加了他们的家庭追悼会。老太太去世前一段时日都须坐轮椅，但仍觉得她充满自信和尊严。追悼会的气氛像是喜丧，有位老哥说得神采飞扬，告诉大家阿嬷精力旺盛无处不去，甚至还到过北韩——不是去旅游，而是去传教！

## 七

对于我们庄氏大家庭来说，汤申台是个农历新年团拜的集合点，因为我是长子，父母大人都合居于此。我在伦敦旅居的日子，五妹夫租了一辆小型旅游车，载送父母和兄弟姐妹五家人，一起从汤申台出发，到亲友家沿户拜年。五妹嫁的夫家是新加坡少数族裔中的少数——印族中的马拉雅南人。妹夫是电视台的公务员，操手提录像机颇有专业水平。他的作品已成为庄氏家族的生活纪实档案，包括前面提到的父母丧礼录像。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已经在古稀命途中迈步的我，深深感受到个人的生命无法脱离由亲情友情编织的一张天网。

父母是在二〇〇三年从汤申台搬出，自买一间二手的三房式组屋安居的。那时他俩都已七十八岁。父亲表示，住政府屋会得到多点政府津贴。当时我怕父亲是因有什么不满而迁出，直至他在九十二岁辞世之后，才逐渐看出他生前的运筹帷幄。

父亲其实看到，当时我的一对儿女都长大了，会结婚生子。要是孙辈家庭也入住，就没有足够的空间容纳太公太婆。而他把最后的家

置在汤申台附近，就是让我伸手可及，随时有个照应，其实我也遵照父母心愿让他们最终能在家中养老。

## 八

记忆的保留，虽然即时的刻录很重要，但记忆须经历多年以后的检视与重构，才有可能以一个多层面的状态储存下来。二〇一九年的五月份，是个很值得铭刻的日子：老伴和快婿筹谋一年多，老家翻新了，女儿一家五口搬来同住。当时作为过渡的租赁房子也在汤申台，无疑方便，但已够折腾了，也多亏老伴另一次的一秒钟决定。

今日回顾，最感谢老伴在新房子中给我设置了一个小书斋，两边是柚木书架，中为韩国式古典柜橱。老伴也特别拨款，把二老遗留下来的一个樟木枕修葺一新，内里存放了若干纪念性的遗物，包括母亲出阁时穿的一袭绣花褂衫。樟木枕上的雕花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观音与童子坐像，两旁刻上：“紫竹林中坐，一心见如来”。

房子的翻新固然让我作了一番断舍离，但一切尘埃落定之后，却发现数十年来本地书画名家勉励小辈的贻赠作品都一一留存了下来，像陈文希的“南洋之作”松鼠图、潘受老先生的“小浦闻鱼跃”行书和萧学民兄的水果静物油画。令我感觉意外的是，八十年代李曼峰大师为我背画的年轻肖像竟然没有丢失。同时浮出水面的是蔡逸溪学友惠赠的一幅抽象水墨《乐伎》。

客厅仍然挂起了中国旅美边疆画家李山的水墨之作，赠于癸亥年（一九八三），当时随即装裱起来挂在红山，后来重裱。据扬子晚报网载，二〇一九年北京时间三月廿八日凌晨，李山在美国纽约长岛家中辞世，享年九十三岁。在汤申台寒庐中细览遗作，只见身背重负的两只骆驼一远一近，题款：驼铃风砂路。任重而道远啊，这是长者的叮咛，也是鞭策。

女儿家育有一男二女，嬉笑呼叫充斥门庭，偶亦传来钢琴、空灵鼓、小提琴、优客里里之声。“公公，婆婆，我回来了！”这是一天中最爽朗清脆的童趣。

眨眼间，最小的外孙女也到了进小一的年龄，我重复着当年父亲携女孩上学的任务。

（2024年度优秀文学作品奖入围作品）

# 兄弟情

文·李宣进

转眼间，又到了细雨纷纷的清明时节。

成豪特地请了半天假，到公司附近的一家咖啡店，打包了两盒叉烧饭和两杯无糖咖啡乌，便独自开车来到了万礼的骨灰塔。

离母亲撒手人间，已经一年多了。听长辈们说，亲人过世后第一个清明，扫墓的过程是有讲究的。成豪下了车，望着一排排宛如组屋的骨灰龕，又看手中拿着的食物，不禁觉得那些传统似乎很不合时宜，还不如用自己的方式来缅怀母亲呢。

星期五下午，来祭拜祖先的大家庭，比想象中还要多。成豪注意到两个穿着校服的小学生：成熟稳重的哥哥，从长辈手中接过两支香，再将一支递给活泼乱跳的弟弟，提醒他拿香的时候要小心，不要被香灰烫到。两兄弟恭敬地向高处的骨灰龕鞠躬，让成豪突然想起多年前，母亲教自己和弟弟在家里的神台上香的情景。他停下脚步，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抑制着喉咙的哽咽，再继续往前走。

成豪的父亲在他两岁的时候，死于一场车祸。十多年来，母亲含辛茹苦地将两个儿子带大。在他和弟弟面前，母亲总是故作坚强；但到了深夜，成豪每次都看到母亲站在父亲的遗照前，小声地啜泣。为了不要让母亲操心，成豪从小就非常懂事，学校的考试也总是名列前茅，毕业后找到了一份安稳的工作。可惜，还没来得及好好地孝敬母亲，她就突然被诊断出患上末期肺癌，不到一年间就走了。

往年，一家三口来祭拜父亲的时候，成豪都不太记得龕位在哪里，是母亲引领着两兄弟；如今，成豪却很自然地走到了父母的龕位面前，将迷你折叠桌设置起来，又将两盒饭和咖啡乌整齐地摆放着。当一切都准备好以后，成豪怅然地望着父母亲的照片，视线开始模糊，几滴泪不由自主地流下来。他摘下眼镜，用袖子抹干湿润的双眼，又拿出一张湿纸巾，小心地擦拭着两个龕上的照片和文字。他这才发现，弟弟竟和父亲长得几分相似……

“豪，你弟弟只是一时犯错，你原谅他吧。”

妈妈不希望走了之后，还看到你们这样。”

成豪想起妈妈在病床上，曾喃喃地说道。

不知从何时起，弟弟便无心读书，开始和一些猪朋狗友搞上关系。母亲曾苦口婆心地劝告过弟弟，作为兄长的成豪也曾严厉地训斥他。不料，弟弟反而变本加厉，甚至偷走了母亲毕生储蓄，拿去所谓的“江湖救急”。成豪不顾母亲的哀求，宣布自己要 and 这个弟弟断绝所有关系。母亲去世前不久，弟弟所加入的私会党被政府一网打尽，他也被判坐两年的牢。母亲临终之前，弟弟曾被保释出来，跪在母亲面前失声痛哭。成豪的心里十分纠结，却始终不能原谅弟弟曾经欺骗母亲、欺骗自己。从那天起，他再也没看到弟弟。

此时，成豪突然发觉到灵龕两边的铁环里，插着几朵鲜花。

是谁？成豪暗暗吃惊，猛地回头一看。一个熟悉的身影，从他的眼角处掠过。

“杰？”

“……”

“杰，我知道是你。”

“哥？”

成杰缓缓地转过身，以诧异的眼神看着成豪。和两年前相比，他明显瘦了很多，脸上也多了几分沧桑，反而比哥哥看起来还要老。

四目相对之际，成豪突然一个健步地走向成杰，将他紧紧地拥抱怀中。两兄弟紧偎在彼此的肩膀上，眼泪夺眶而出，久久不能言语。

此时，一道阳光破云而出，照在了母亲的笑容上。

## 林高评语：

弟弟后悔自己的行为对不起母亲，哥哥顾念到母亲临终的嘱咐，也就原谅了弟弟的过错，兄弟俩的行为很可取。兄弟俩和好如初的场景设置在祭拜父母亲的灵龕前面，这个安排给兄弟俩的行为增添了亲情伦理的份量。结束时阳光照见母亲的的笑容，这一笔很好。



## 吸尘器

文·谢京贤

身材小，肚量大  
吸吸吸  
吸走灰尘和头发  
脏的 乱的，都吞下肚

吸吸吸  
吸走悲伤和烦恼  
从不埋怨。不会哭

妈妈  
我的吸尘器  
每天都在储藏室里待

### 林高评语：

以吸尘器为喻写母爱，自然感人。最后一句尤其让人感受到母爱的千般委屈以及难能可贵。文字简洁平易。

## 爱在末日

文·陈楠

上一秒还鲜活温暖的躯体  
怎么已冰冷僵硬，没了气息？  
耳边还荡漾山盟海誓

回想文明的辉煌，观摩其落寞遗迹  
骊歌多唱几次，痴心将史书装饰  
我们相约于末日，颠覆诅咒穿越荆棘  
共赏花开满枝，对月直抒胸臆

为无法消灭的黑暗叹气  
何以不能多一些光的恩赐？  
昔时欢笑有几分是营造的美丽？

带着崖山劫的决绝  
临摹崇祯上吊的意志  
当断即断  
在希望的田野上迎接明日  
夜半笛声几缕苦凄是我最后的致意

下次邂逅将在末日，温馨团聚  
为你立碑立传，让世人感受这份诗意  
一梦万年，花前月下此情再续

### 林高评语：

诗里这份相思由男欢女爱深入到对文明、对人性、对历史文化的审视和思考，婉转幽怨，最后又回到男女之爱情上。爱情，本可放大来看。陈楠显然想在语言的选择上释出此诗在抒情上的对峙，而且使出强大的劲，借以传达一种失望与渴望交织在一起的氛围里仍一往深情的努力。



## 春到河畔2024

## 龙年的盛大狂欢



文·郭姘好  
图·编辑部

**当** 2024年的春风轻拂过滨海湾花园，“春到河畔2024”以一幕幕精彩绝伦的庆典画下圆满的句号。作为新加坡最具标志性的农历新年庆祝活动之一，这一年度盛会不仅给公众带来了丰富多彩的文化体验，还激发了对传统与创新的深刻思考。

活动期间，擎天树丛间那长达140米的巨龙灯饰成为了夜空中最璀璨的明星，与财神爷的灯饰交相辉映，营造出一种既传统又现代的氛围。2月8日晚，主宾副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循财和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长兼律政部第二部长唐振辉受邀点燃鞭炮，为“春到河畔2024”拉开序幕。鞭炮声声更是重现了传统农历新年的喧嚣与热闹，使参与者仿佛穿越时空，回到了古老的春节庆典。

从欢快的音乐、五彩缤纷的灯饰，到孩子们在游乐场上的欢声笑语，无不透露出一种家庭团聚、欢庆共享的温馨气氛。这不仅仅是一个文化庆典，更是一次家庭与朋友间情感交流的美好时刻。宗乡总会奖学金得主陈醇霖在参与活动后也表示：“在活动现场，我看到了很多不同种族和来自不同国家的人，他们的到来为庆祝

活动增添了新年的色彩，也彰显了新加坡多元文化的活力。”

春到河畔中的每个演出都是对华族文化的一次深情致敬。无论是本地艺人的精彩表演，还是海外艺术团队的异域风情，都让观众感受到了文化多样性的魅力。特别是贵州省花灯剧院和国立台湾体育运动大学舞团的表演，为观众呈献了一场视觉与听觉的盛宴。

贵州省花灯剧院表演团艺术指导老师蔡荣惠在受访时提到：“我非常喜欢新加坡，这个地方华人众多，文明先进，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在团队服务了30多年后，我希望有机会能够将我们的团队带到新加坡。花灯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根深蒂固，充满传统韵味，结合唱跳表演，表现力十足，加上苗族服饰、木制乐器等元素，将会给新加坡观众带来全新的体验，展示出丰富的文化内涵。”

从民间舞蹈到传统戏曲，再到现代流行音乐，各种表演形式的融合，展现了新加坡文化的丰富性和包容性。特别是“新谣之夜”和“歌台之夜”，它们不仅吸引了年轻一代，也让年长的观众重温了旧时的回忆。最后两晚，与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联合呈献的“新加坡派”由多位新传媒艺人与本地艺术团体带来精彩的特备节目，演出包括精彩绝伦的舞蹈与音乐演奏，还有潮剧和怀旧金曲等表演。整场演出还于元宵节晚上在8频道播出，让错过



开幕当晚，主宾新加坡副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循财（左二）和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长兼律政部第二部长唐振辉（左一）、宗乡总会会长蔡其生（右二）一起点燃鞭炮，右一为人民协会总执行理事长卓荣能



“满载而归”灯组



贵州省花灯剧院带来精彩的表演



公众与虚拟人物晓河互动

去现场看表演的观众，也有机会欣赏。

另外，在美食街上，人们围坐一起，品尝着各种美味佳肴，从地道的新加坡小吃到异国风味美食，每一口都充满了年节的味道。笑语盈盈之间，美食不仅满足了味蕾，更加深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联结，让人感受到家的温暖和团圆的喜悦。

由晚晴园—孙中山南洋纪念馆策划的年货市场迎新春展览，带领访客穿越时空隧道，一览自1950年以来新加坡年货市场的历史面貌。展览分为四个展区，展品包括主办方收集的旧照、旧时物品，还有本地文史研究者、老一辈摊主的珍贵访谈，现场也设置了许多互动装置，比如模拟烤肉干、写春联、自制红包封套等，让访客沉浸在浓浓的昔日年货市场的氛围中。

今年的春到河畔更加入了元宇宙互动体验，带领访客走进一个全新的虚拟世界。通过开创性虚拟人物——晓河的引领，参与者在虚拟空间中寻找龙珠，享受了一次前所未有的科技探险之旅。另外，人工智能年画艺术比赛更是体现出了将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融为一体的理念。参赛者通过人工智能创作出独具一格的年画作品，不仅

展现了艺术创造力，也为新加坡的文化艺术注入了新的活力。

此外，由新加坡邮政储蓄银行（POSB）赞助的社区活动也颇受好评。活动中，参与者使用特制的社交媒体滤镜捕捉庆祝瞬间，并通过社交平台分享，每一次分享都转化为对低收入家庭儿童的慈善捐助，这不仅传播了节日的欢乐，也为社区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帮助。

值得一提的还有TikTok上的龙年十二生肖运程解析，由本地电台DJ主持，为群众带来了新年的祝福与预测，这种新形式的文化传播为传统习俗增添了现代感。

总体而言，春到河畔2024的成功，不仅在于其丰富多样的活动内容和深入人心的主题，更在于它如何巧妙地将文化传统与现代科技结合，创造一个既温馨又充满活力的新年氛围。同时，也展示了新加坡作为一个多元文化社会的独特魅力。

**题图说明：**  
盘绕在擎天树上的巨龙与五福财神尽显磅礴之势

（作者为宗乡总会奖学金得主。部分图片见封三）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公众在许愿池前许下新年愿望①  
十二生肖灯组③  
精彩的舞台表演⑤

②晚晴园—孙中山南洋纪念馆策划的年货市场展览  
④更生美术研究会的书画家现场作画  
⑥“五路财神”灯组



# 《源》杂志

## 优秀文学作品奖 2024

为了鼓励本土文学创作，本刊按年度征集小说、散文、诗歌三种体裁的文学作品。由本刊委任的评审委员会，将从已发表的入围作品中评选出优胜者，予以奖励。

2024年度“优秀文学作品奖”征集的作品体裁是散文。以下是“优秀文学作品奖”的投稿须知，敬请留意。

资格：新加坡公民或永久居民。

体裁：散文（未发表过的、具有本土色彩的原创作品）。

字数：4000 字左右。

投稿：即日起至2024年10月15日（由于杂志的定期性质，先投稿者将可能获得优先录用。

稿件须注明《本土文学》字样）。

评选：由《源》杂志编委会组织的评审委员会进行评选。

奖金：除稿费之外，优胜者还可获得奖金S\$2000元及获奖证书。

声明：参与者须符合并同意以上条件和规则方能投稿。

### 征稿启事

《源》杂志长期征求关于新加坡历史、时事、本土民俗等相关题材的稿件及图片。

### 征稿要求

- 观点鲜明
- 字数介于2000至4000字。
- 来稿须为有本土元素的原创作品。
- 品，严禁抄袭、套改、拼凑。

### 投稿方式

请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送文稿至《源》杂志邮箱，并请在文末提供作者本人真实姓名以及联系方式，以便邮寄杂志。

### 稿件录用

经刊登，稿费从优。原则遴选稿件。来稿一经公开，公平、公正的《源》杂志编委会将本着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遴选稿件。